

目 次

序.....	赵焕然	2
往事.....	勾振现	7
在三座大山下.....	张玉明	19
龙须沟畔.....	玉德江	30
当我年青的时候.....	陈德琳	46
三个监狱.....	张景和	54
街头.....	戴世鸿	66
苦海深仇.....	杜守库	75
“万人坑”余生记.....	李护国	86
阶级仇 民族恨.....	赵恆义	93
苦难重重的二十年.....	刘景瑞	103
苦与恨.....	李 怀	114
铜人铁马.....	戴振祥	128
我家三兄弟.....	程德贵	142

目 次

序.....	赵焕然	2
往事.....	勾振现	7
在三座大山下.....	张玉明	19
龙须沟畔.....	玉德江	30
当我年青的时候.....	陈德琳	46
三个监狱.....	张景和	54
街头.....	戴世鸿	66
苦海深仇.....	杜守库	75
“万人坑”余生记.....	李护国	86
阶级仇 民族恨.....	赵恒义	93
苦难重重的二十年.....	刘景瑞	103
苦与恨.....	李 怀	114
铜人铁马.....	戴振祥	128
我家三兄弟.....	程德贵	142

序

赵 焕 然

《鋼人鉄馬》是石景山鋼鐵公司十几个老工人的家庭历史。也是中国劳动人民血泪斑斑的历史的一部分。

解放前，中国工人阶级，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榨下，天天挣扎在死亡线上。那时候的石景山，是一个阴森森的大监狱，是一个充满了掠夺、饥饿和死亡的活地獄。

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后，我們石鋼工人也由奴隶变成了主人，从政治上到經濟上，彻底地翻了个身。現在，石鋼一派繁荣景象，白天，数十里內，浓烟升騰；夜晚，金星四射，数万工人，在这绚丽的鋼鐵城里，高歌猛进。十四年来，我們在恢复生产上，在抗美援朝中，在社会主义改造等伟大的政治运动中，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們在党的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指引下，更是意气风发，为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是什么力量促使我們不懈的工作呢？追本溯源，是我們的工人阶级在党的教导下，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无数

老工人亲身经历过旧社会所加給的无穷痛苦，也经历了解放后真正的幸福生活。撫今思昔，忆苦思甜，自然，他們爱憎分明，立場坚定，爱护新社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他們对危害社会主义的一切行为，敢于进行不調和的斗争。我們的青年工人，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由于家庭的薰陶，特别是党不断的政治教育，他們中的絕大多数人衷心的热爱党，热爱新社会，生气勃勃，在生产上、工作上都是先进的。这是我們队伍的基本面貌，也是我們的力量所在。

但是，长时期的幸福生活，容易使人产生安逸思想，过去的痛苦容易被人遺忘，而忘記了过去，就必然会模糊自己的阶级意識，漸漸地从思想上解除武装。

当然，我們的老工人同志，絕大多数是不会忘記过去的。他們不仅自己不会忘記，还要把他們的血泪史告訴下一代，要他們提高警惕，时刻准备着为保卫先烈們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革命果实，付出自己的一切。但是，这种高度的責任心，不是所有的老工人同志都能具有的。有一些人，难免“好了疮疤忘了痛”，或者对旧社会的一切像籠罩着雾靄的远山一样，不大看得清楚了。他們很容易患政治感冒，容易为牛鬼蛇神的“画皮”所迷惑，甚至上敌人的大当。

我們的許多青年工人，对旧社会缺乏感性認識，对旧社会人剝削人、人压迫人的血腥事实，感到不能理解，有的甚至抱着怀疑态度，錯誤地認為《白毛女》是艺术夸张，黄世仁不过是艺术形像罢了。当他們的父兄講述旧社会的苦难经历时，他們有的竟觉得好笑。他們生在福中不知福，不知道老輩人的

辛酸事，也就无法对新旧社会进行对比，因而对新社会之所以可爱，值得为她献出一切，就不可能有深切的理解。

回忆过去，对我们是非常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为了这个目的，石钢党委在完成《钢铁凯歌》——石钢厂史的编辑工作后，又整理了成千篇老工人的家史，作为我们对青年工人进行阶级教育的教材。在整理老工人家史的过程中，我们发动广大的青年工人和老工人座谈，请老工人现身说法，倾诉苦情，大讲阶级压迫史，并且组织有一定文化水平的青年工人，记录整理。这是一次极其深刻的阶级教育，也是一次最广泛的无产阶级家谱的活动。许多青年同志听了老工人亲口讲述的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的真实故事，看了留在老一辈肉体上的残疾和伤疤，看了老工人藏了许多年的卖身文契，讨饭碗，盖了几辈人的破被子后，深深受了感动。许多青年工人一面听，一面看；一面抽泣，一面记录。他们同情老师傅们的遭遇，痛恨旧社会。他们说：我们和老师傅比起来，有的虽然在技术上出了师，但在政治上还远没出师呢！他们表示决心继承老一辈工人阶级的优秀政治品质，努力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继续续写工人阶级的红色家谱。特别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经过这次教育，他们认清了剥削阶级家庭给予他们的阶级偏见，什么旧社会有钱人是勤俭致富，善于经营等等，不过是一些骗人的鬼话。他们表示要彻底清除自己身上的剥削阶级影响，努力把自己改造成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的一员。

我们的老工人，在这次的回忆中，也受了一次生动的阶级

教育，特別是患了政治感冒的同志，一提過去，无不大吃一驚。有的同志感到自己這兩年政治上衰退了，对不起黨，对不起人民；有的同志沉痛地說，“我們在舊社會的時候，什麼也覺得是撿了便宜：起個大早能夠謀得一天的苦活，覺得是便宜；在班上沒有挨打，覺得是便宜；挨了打，沒有被打死，也覺得是便宜。現在却覺得處處吃了虧；沒有得甲等獎，覺得吃了虧；下班後開了兩個鐘頭的會，也覺得吃了虧。真是忘了本，我們怎麼糊塗到了這步田地啊！”

列寧說：忘記過去就等於背叛。我們工人階級絕對不能忘記過去。舊社會對我們太殘酷了，我們應該永遠保持警惕，絕對不能讓舊社會復辟。我們已經埋葬了舊社會的剝削制度，還必須徹底清除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思想毒素。

我們在黨的領導下，推翻了三座大山，打碎了套在我們脖子上的沉重的枷鎖，基本上消滅了剝削制度，完成了一個飛躍。這個突變，激勵了我們的革命熱情，創造出了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所不會有的勞動生產率，完成了兩個五年計劃，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積累了財富。

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還剛剛開始，我們的國家還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距離共產主義的生產水平還很遠。黨和毛主席反復地教導我們：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着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着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在國內，階級鬥爭時起時伏，有時甚至是很

尖銳；在国际範圍內，美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又互相勾結，不斷組織反華大合唱，不斷對我國進行挑釁和顛覆破壞活動，阻撓世界人民革命運動的發展。因此，我們必須提高革命警惕，用我們階級的历史來不斷的激勵我們自己，使我們在保衛祖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認清方向，兢兢業業，用實際行動，推進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徹底挫敗國內外敵人的一切陰謀，使我們的祖國更加繁榮、強大，為世界革命做出更大的國際主義貢獻。

我們從上千篇的老工人家史中，選出十三篇，編成這本《鋼人鐵馬》，它是勞動人民的家譜，也是一本階級教材。不論年老的工人，年青的工人，不同階級出身的知識青年，都應該經常翻翻它，看看它。看了它，我們就能學會和增強階級的愛與憎，幫助我們清除自己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更加珍惜先烈們用熱血為我們換來的新社會。看了它，我們的眼睛會變得更明亮，能夠看穿牛鬼蛇神的真面目，不再上他們的大當，不當他們的俘虜。看了它，我們的力量會變得更加強大，使我們知道在保衛祖國，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該怎樣工作；怎樣貢獻我們的一切。

北京師範大學的師生，利用暑假，深入到車間幫助老工人記錄整理，他們的情緒是可貴的，特在此表示謝意。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二日

（本文作者是中共石景山鋼鐵公司委員會副書記）

往 事

动力总厂 勾振现

家破人亡走他乡

一九三九年，日本鬼子到我們秦庄村(河南延津县)里来抓劳工。他們說，家里去一个人給二十块現洋，不去就得拿出一百五十块現洋。我家七口人，只种四亩沙滩地，父亲在地主家扛长活，嘴也糊不住，哪能拿得出一百五十块現洋？要是父亲去了，家里的生活怎么办呢？我們再穷，一家人死活也要厮守在一起，誰舍得骨肉分离？可是，保长逼得紧，父亲明知这一去凶多吉少，只好說：算了吧，去一年半載看看。

誰料到，父亲刚收拾好行李，保长就匆匆地带了几个狗腿子堵住門口，用繩子把父亲捆起来。我哭着摟住父亲的腿不放，被保长一脚踢开，倒在地上。母亲連哭带拉，向保长求情。可恨的保长凶恶地罵道：“他媽的，你們这些穷鬼，想不去做工？”說着，又指使狗腿子用枪托狠狠地打我母亲。就这样，父亲被拖走了。

这次，我們村里被綁走的共有十六人，他們在东北开山劳

动。我父亲上了年纪，带着病，身上没有穿的，肚里没有饱食，哪能抵得住冰雪和劳累？过了半年，有一个劳工偷跑回来，他告诉我们，父亲去了两个月以后，鬼子看他再不能干活了，便活活地把他打死了……

父亲被鬼子抓走，我们的日子更不好过了。这时候，大姐姐十七岁了，已经有了主，妈就把她送到婆家去了。二姐还只有十四岁，迫不得已，母亲合着眼泪，把她给一个姓赵的地主家当了童养媳。有一次，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跑回家来，倒在母亲怀里，边哭边说：“妈，我死活也要和你在一起，不回赵家门了。”母亲抚摸着她的头，发现一绺一绺的头发被地主拽掉了。揭开衣裳一看，身上红一条紫一条，都是皮鞭抽的。母亲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一连串地掉下来。可怜二姐年岁小，就遭到地主这样的残酷虐待。可是在旧社会里，“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你骑来任你打。”无可奈何，母亲只好忍痛叫她回到婆家去。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二姐回来了。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母亲把三间破草房、四亩沙滩地卖掉，想去投靠舅父任景海。我们乡下有句话，说靠亲戚是：“管你顿饱，不能管你长饥。”何况任景海又是给地主当狗腿子的，家里开了赌场，成天和那些地痞流氓厮混在一起，哪有真心帮助穷亲戚？母亲只好带着弟弟、妹妹和我一路要饭，逃荒到山西去。那时我才十三岁。

到了乔兴县李家沟，我给地主李四爷放羊，母子四人借宿在李四爷的一个破窑洞里。

天冷了，我没有鞋穿，两只脚裂了口子，痛得难忍。可是

豺狼們見我光着脚，還罵我是什么“河南猴”。羊群出了什麼差錯，我就少不了挨罵挨打。

有一次，地主要我去送飯。在路上不小心被石子絆倒了，罐子摔碎了，連飯帶菜全洒在地上。回到地主家里，我正要把這件事向李四爺說明白，李四爺沒听我說完，就指着我的鼻子罵道：

“哼！你們這些窮鬼，吃了人家的飯不算，還把罐子打碎，看你賠不賠！”

他們硬要我承認把飯送給母親吃了，我死也不干。整整一天，地主不給我飯吃，狠狠地毒打我。我實在忍不住氣，就跑回母親住的破窑，不干了。

第二天，母親帶着我去見李四爺算工錢，狼心狗肺的地主，拍桌子罵道：

“啊！還算什麼賬！你們住我的窑洞，吃我的飯，要你还也不够还哪！……”

給地主放羊，挨打受氣，到头一个工錢也沒有掙到。那時候是地主的天下，窮人有什么办法？

走投无路回老窝

母親帶着弟弟、妹妹和我离开李家沟，沿途跟人家要飯吃。山路不好走，母親的两条腿都肿起来了。

走了几天几夜，好容易走到三里庄，找到本家舅舅任景源家。他是从河南逃荒到山西来的，来山西以后，不务正业，专做“中介人”，与那些地痞流氓勾勾搭搭。这个坏家伙覺得还

可以从母亲身上打主意，暂时把我们收留下了。在那里，母亲帮他干点杂活，我和弟弟在山上打些柴禾。

有一天，他蛇心佛面、假惺惺地对母亲说：

“唉！现在年头不好，东奔西跑也不是长远的办法呀！”

母亲坐在一边不言语，心里有些不安，只是叹息。

任景源斜着看了母亲一眼，进一步装出伤心的样子，说：

“我看，把你小闺女嫁出去吧，一来免得她在外头受罪，二来可以换得三五担小米，再给你一间房子，也可以安家落户了。”

母亲心想，现在活命要紧，一狠心，也就听了他的话，忍痛把小妹妹卖给叫馮四的地主，换了一间破草房，三担老玉米。事后才知道，坏蛋任景源欺骗了母亲，从中还捞了一把。母亲气得嘴唇直打颤，眼睛冒金花，半天说不出话来。

那时候，鬼子常到村里来杀人放火，本地人都躲到山洞里去了，我们外地人，人生地不熟，又没有吃的，往哪儿躲呢？有不少从河南逃荒来的人也都走了。母亲看看情景实在不行，再也呆不下去了，也打算回河南去。

临走的时候，母亲领着我和弟弟去看小妹妹。进到馮四家里，一看妹妹干瘪蜡黄的脸，心里就如刀割一样。妹妹知道我们要走了，伏在母亲的怀里，呜呜咽咽地说什么也要跟着母亲走。身上掉下来的肉谁不疼，母亲把小妹抱在怀里，禁不住热泪糊住了眼睛，嗓子梗塞住了。这时候，馮四气呼呼地从屋里跑出来，瞪着两只三角眼，开口就骂：“他妈的，我又不是不给你吃的，哭什么？你们走你们的！”说着便抓住小妹妹的衣

襟，把她从母亲怀里拽出去，还轉手把母亲推出門外，“嘭”的一声，把大門关得严严的。母亲站在門外，只听得妹妹像一只失群的雁似地凄凉地号叫，母亲心里又悔又恨，楞了半晌，才三步一回头地离开了馮家。

后来听人家說，小妹受不了地主的虐待，从馮四那里逃跑了。跑到哪里？到現在也沒有下落。

想当初，我們离开河南时，还以为日子会过得好一些。誰料到，在山西流浪了几年，穷日子沒个完，反而落到卖掉妹妹的下場。这次回河南，只剩下母亲、弟弟和我三人了。

回到了河南，我們住在二大爷的草房里。我和弟弟每天去拾些庄稼，湊合过日子。以后又給恶霸任貫三放羊。羊群多，有时候管不了，羊吃了人家的庄稼，就少不了要挨挨、挨罵。

有一次，弟弟在地头拾了一棵老玉米，被伪保长的儿子秦鬧牛看見了。他赶来不問青紅皂白，呱呱的几个巴掌打在我弟弟脸上，还把他的背筐搶走了。弟弟年紀小，奈何他不得，哭着跑回家。母亲見了，哄他說：“不要紧，一会儿媽去跟他要去……”話还没有說完，秦鬧牛一脚踢开大門，闖进来，劈头就罵：“他媽的，你們穷人要造反了。”一边罵，一边把家里的鍋給揭走了。临走时还往母亲脸上呱呱几个巴掌，打掉了两个門牙，又打了我弟弟几个耳光……

这时候，狗腿子任景海不但不伸手帮助，反而乘人之危，想从母亲身上捞一把。他假惺惺地可怜母亲，說：“妹子，勾家地无一壠房无一間，你守节到死也不見得有人給你立貞节坊，

我看，你另找个主吧！”母亲早就看穿了他的黑心腸，連理都不理。任景海眼看这笔生意落了空，恼羞成怒，翻脸不認亲，出口罵道：

“头頂西瓜皮，受罪也不渴。”

我們心里明白，連自己的家乡也不能久留了。……

不久，听說馬鞍山在招工人，我和母亲合計了一下，全家三口人就流落到馬鞍山。

这是一九四三年七八月間的事，当时我才十五岁。

做牛做馬馬鞍山

去以前，招工的騙子花言巧語地說，到了那里，住的是整齐的工房，吃的是精白面，一月一开支，逢年过节还有賞……可是，到了那里，我們住的是草棚，地下是臭水坑。下雨漏了水，蛆从坑里爬出来，到处鑽，屋里臭气熏人。講到吃的，說是給你二十斤高粱米、十斤大米、二两油、一斤盐。实际上，除了叫人恶心的混合面以外，其他什么也沒有。油更不用說了。我們受騙了！但离开这儿，又上哪儿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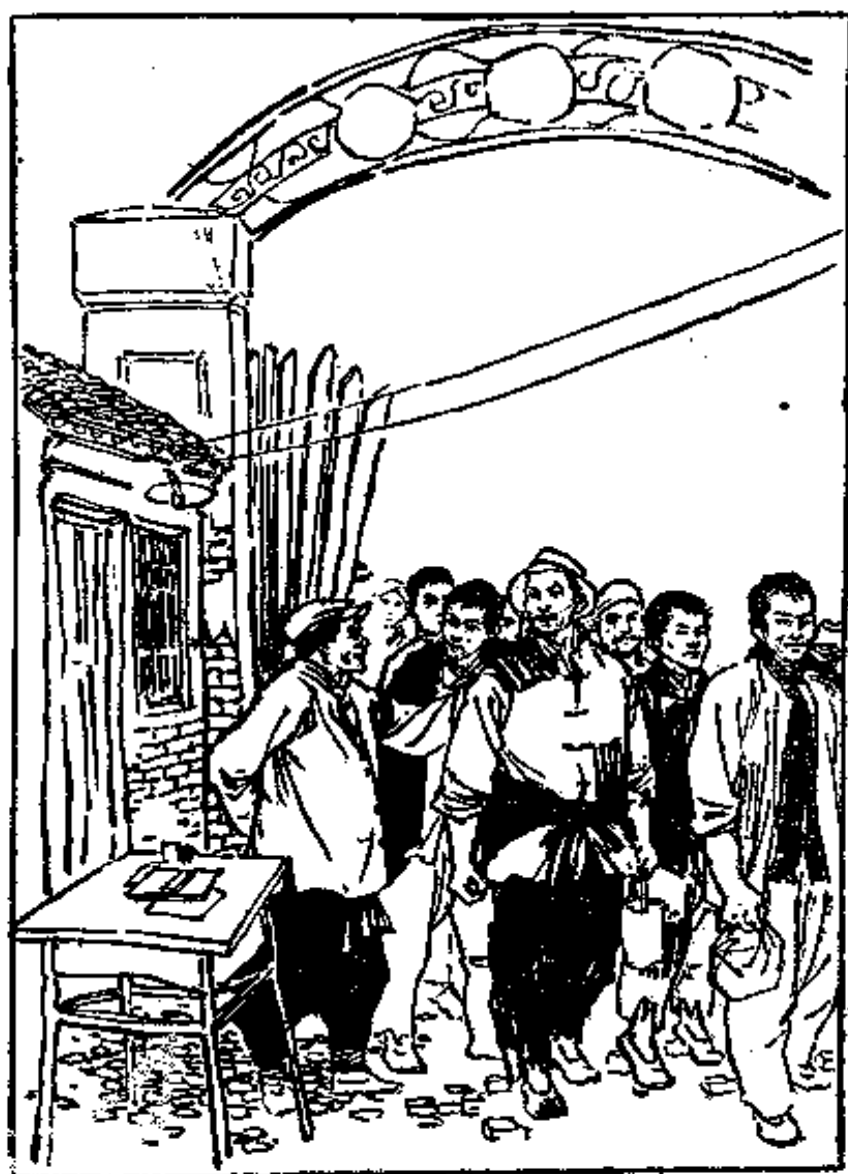
我去上班那天，人家一看我个儿小，又是皮包骨，榨不出油水来，根本就不要我。我和母亲向包工头孙連玉說了不少好話，他才勉强把我留下。那年头，出卖劳力也沒門呀！

第二天我夹在人群中，脚底下垫着块砖，伸长了脖子，好不容易才混了过去，开始“苦力”的生活。

我們住在馬鞍山不久，母亲得了病，上吐下泻。人家說这是“虎列拉”（霍乱），是可怕的传染病。鬼子发现了这种病人，

就要把人扔到石灰坑里，說是“消毒”，其实就是活活地給噲死。

我当然不能叫鬼子知道母亲的病。每天上班的时候，叫弟弟反鎖着家門。鬼子来查問，就說：“我媽上班了，家里沒人。”就这样，把母亲的病遮盖过去了。



母亲的病沒有好，脸色又青又黄，瘦得可怕。有一次，我下班回来，看見她用草垫子当被盖，露出头，脸上一点儿血色也沒有，真是和死人一模一样。我吃了一惊，赶忙跑过去，倒在她身上，伤心地痛哭了一場。

第二天上班，我老是惦记着母亲，放不下心来。还不到下班的时间，再也等不得了，非要去看看母亲不行。可是厂里防

守很严，四周围圈了三道电网。工人们进了厂，就不能随便出去了。没办法，我便偷偷地从电网底下爬出去。不料被伪军看见，一把抓住我的右手，凶神恶煞地瞪着两只白眼，歪着个嘴，大声喝道：

“干什么的？”

“做工的。”

“他妈的，胡说。是小偷。”

“你才胡说，我不是小偷。”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吊起来毒打。鬼子来了，听伪军嘍哩咕噜地说了一阵，又把我拉到厂门口，罚我足足跪了八个小时。地下的铁丝和炉灰渣把我小腿扎得血糊糊的。我咬着牙，忍着痛，两只眼睛直冒花，身子麻木得发软了。我弯了弯腰，一只穿着大皮靴的脚狠狠地往我脊梁上踹了几下，踹开了几个大口子，鲜血直流。腿上、脊梁上的伤疤，到现在还能看到。

晚上，我憋着一肚子气，跑回家去。母亲稍为清醒了一些，看我这模样，知道又是受了鬼子的气，难过地说：“孩子，可不能忘掉这些仇恨呀！”

不屈不挠斗敌人

在敌人压迫下，工人们个个憋着一肚子气，想出种种办法来对付敌人。

高炉出铁时，铁水先流入壠沟里。壠沟是要用干燥的泥沙打的。为了作弄鬼子工头，我们抬泥沙的时候，偷偷地用潮

湿的草垫子垫着。结果泥沙都潮了，出铁的时候，铁水遇到潮湿的泥沙，砰砰地直炸。铁水“放炮”了，鬼子气炸了肚皮，我们在旁边直暗笑。

有一回，铁水又“放炮”了。一个工友不小心，身上着了火。日本工头熊井乘机坑害，用水龙头直往他身上浇。千来度的铁水，烫在身上，再用凉水一浇，烫得他在地上直打滚。过了不多久，他就这样在鬼子的毒手下活活地烫死了。我们大伙儿都很气愤。下班时有个叫王纪山的工人，对大伙说：一定要为咱们的弟兄报仇！

第二天上班，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快出铁了。熊井把着铁钎，顶着出铁口，王纪山在他背后抡起铁锤打钎子，抡了几下，趁熊井没有提防，一锤子重重地砸在他脑袋上，脑瓜子开了花，脑浆喷出来，熊井身子一晃，倒了下去。

我们合计好了，叫王纪山赶紧跑掉。

这件事闹到厂方，全厂发了戒严警报，鬼子把所有的工人集合起来点名。点到王纪山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四周围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鬼子发觉王纪山已经跑了，气得暴跳如雷，一面赶紧派人四处追捕，一面把我们押到宪兵队去审讯。

“王纪山的哪里的有？”几个鬼子坐在大椅子上问道。

我们一伙人都说好了，谁也不许出卖自己的弟兄。

鬼子见我们这样硬，气得直跺脚。他们给几个成年工人灌辣椒水，灌得肚子胀了，又用脚使劲往肚子上踩，血水从嘴里、鼻孔里喷出来。他们把我们几个年纪小的吊起来，用皮鞭子抽。就是这样，也休想从我们口里得到什么。我们被关了

一天半。他們實在也奈何我們不得，才叫我們打上几个手印，把我們放出来了。

又有一次，鬼子調来了一批高射炮，駐在山头上，叫十二个工人每天从山下給他們抬水。山路不好走，鬼子怕我們怠工，派了几个工头在山脚下、山腰上監督我們，不讓我們有喘气的時間。几天下来，累得每个人的腿都肿得像电綫杆子一样粗。

有个叫李六的工人乘鬼子不在时对大伙說：“弟兄們！我們不能老低头受人家摆弄呀，也叫鬼子瞧个厉害吧！”說着他拉开了褲子往水桶里撒尿。

有人带头，大伙儿的胆子也壮了。以后，背着鬼子，大家在桶里尿了尿才把水桶抬上山去。

不料，有个小子叫康小巴的，他吃了鬼子一点甜头，拍鬼子的馬屁，不知怎地知道了这件事，就向鬼子告密去了。說什么“良心大大的坏的，撒尿的有的……”

就这样，鬼子把我們十几个人的手指头用鉄絲捆起来，把我們吊在树上审問，我們死也不肯承認，鬼子們气得直跺脚，瞪着两只大眼，仁丹胡子扭歪了，掄起皮鞭子啪啪地抽在我們身上。

更可恨的是，鬼子把李六捆在树底下，当着大伙儿的面，指使几条狼狗往李六身上扑过去，一口一口地把他活活地咬死了。

一九四四年，鬼子的末日快到了。厂子要解散了。鬼子挑了一部分年輕力壮的工人，轉送到石景山，我是其中的一个。

鬼子临走，欠下了一笔血债。他们把年老的和有病的工人圈起来，撒上汽油，点着火，活活地烧死了。受害的工人在烈火中发出凄厉的叫骂声，惊天动地，到现在还在我耳边迴响着。

来到石景山后，我在焦化厂焦炭窑里干活，不到两个月，鬼子投降了。

虎去狼来重受苦

鬼子投降后，我满以为日子要好过一些，谁知去了一只虎来了一条狼。要想报名上班，就得逢年过节给工头送礼。工人挣的钱养家活口还顾不上，哪有闲钱送礼，再说，我性子硬，火气大，向来就凭力气换饭吃，根本不理他这些。因为这，把头恨死了我。我干一天，他就足足叫我歇六天。没办法，我一面在石钢干活，一面还要到门头沟去走小窑。那些土煤窑浅的有三百多尺，深的一千来尺。在里头，冬天又闷又热，夏天穿了棉衣还觉得冷。什么安全设备也没有，在里头饿死的，崩死的，压死的，电死的，碰死的，数都数不清。我开始干了一天，捏了一把冷汗，说什么也不想干了。可是肚子咕咕叫，说了硬的有什么用呢？到时候还得照样去卖命。

资本家都是黑心狼，他们一鼻孔出气压榨工人。一到发工资的日子，粮食一天要涨三四次价。几十万法币顶多只能买二十来斤棒子面。有一次我领了工资，一大清早就到西天顺粮店去排队。到那里一看，门前早排了一条长龙。因为别的粮店都不卖了，西天顺的老板就乘机把粮价抬得很高；你若

再不下手买，恐怕連这二十斤棒子面也保不住了，大家只好硬着头皮排队。

我远远地排在队伍后头，提心吊胆，一会儿怕粮价又涨了，一会儿又怕不卖了。好不容易排到了跟前，“嘭”的一声，老板把窗口关了起来，說是不卖了。我心里真恼火，一个箭步跳到窗口，人們也立刻乱成一团，往前拥挤，叫嚷起来。我大声喊道，“你們这些吸血鬼，还叫人吃饭不叫人吃饭？”那些端着步枪“維持秩序”的狐群狗党也忙乱起来，拉住我叭叭打了几个巴掌。結果粮食沒有买成，把口袋倒弄丢了。母亲和弟弟在家里餓着肚子等了一天，見我空手回来，母子三人抱头痛哭……

这样的事不是我們一家两家，也不是一次两次。

我們一家子从河南到山西，又从山西到河南。流浪了几年，落得家破人亡；流落馬鞍山，受日本鬼子的蹂躪，投奔石景山来，又受国民党反动派糟踏。我們工人在旧社会里就是这样受地主資本家的压迫剝削，作牛作馬。

这一切，今天的年青人，怕是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吧！但是，他們必須知道！

林冰整理

刘永凱插图

在三座大山下

中小型鑄鋼廠 張玉瑛

兩斗谷子，兩條人命

記得我六歲那年，天津鬧洪水。我們一家十一口人，個個餓得肚皮貼到背脊上，躺在炕上爬不起來。我爺爺跑到地主常萬祥家門，想借點糧食，救一家人的性命。好話說了一千萬，常萬祥才板着脸，冷冰冰地說：“好吧！借你兩斗谷子，可是秋後得還我兩斗四升小米！”那年月向地主借債，就好比一脚踩進稀泥塘，進去就拔不出來了。常萬祥怕我們不還他，還要爺爺找了保人，立下字據，寫明秋後一定還清。

老天爺也盡和窮人作對，洪水過後，地里的莊稼全毀啦，秋後，一粒糧食也沒到手。全家正在發愁，常萬祥帶着兩個打手和管賬的登門要債來了。爺爺哀求說：“常老爺，求您開恩，再寬延些日子吧！現在甭說糧食，連野菜也難弄到啊！”管賬的狗腿子把眼一瞪，惡狠狠地說：“他媽的，白紙上寫黑字，這字據可是你立下的？到期不還，咱們到局子裏說去！”那會兒衙門向着有錢人開，哪有咱窮人的理啊！全家人苦苦哀求，常

万祥才装出一副慈善面相，皮笑肉不笑地说：“粮食么，不还也可以，可是你得给我做一年长工抵债。”

地主带着打手走后，爷爷想想往后的日子，愁得一天没说话，夜里偷偷地吃了“田麻子”，自杀了。临死时只挣扎着说了一句话：“你，你要记住我是怎么死的，要记住……。”

消息很快传到地主耳朵里。他马上带了一群打手闯进我家，一进门就大骂：“真他妈的见鬼，昨天没把他拉走，今天就死了。想赖账吗？没那么便宜，老子死了还有儿子。”说着就叫打手把跪在尸体旁的我大爷拉了出来。全家哭着央告他，让我大爷埋了爷爷再去顶工。常万祥理都不理，几个打手连拉带推，把我大爷拖走了。不到半年时间，我大爷被地主活活地折磨死了。

大爷死后，常万祥还不甘心，想再拉我父亲去顶工。眼看在老家再也呆不下去了，听人说关东地面宽，我父亲就连夜奔了关东。

淪落營口

不久，母亲带着我和妹妹，背上个破被卷走关东，去找我父亲。可是天下这么大，哪有穷人容身之地啊！我父亲在营口给一个资本家当佣人，每年挣三块大洋，连他自己都顾不过来，甭说顾家里了。

我十一岁的时候，给船主王庆和当童工。童工是公尿桶，谁都可以使唤。我整天除了拉纤以外，做饭、扫船、干杂活，啥都得干。

我和两个船工一起，拉着一条大船，逆水行船时挪一步有千斤重，肩胛骨叫絳板磨烂了，鮮血一滴一滴地掉到地上。夏天毒辣辣的太阳烤得身上出了油，口渴得嘴唇裂了口子，沒茶水喝，就趴在地下，捧起那泥湯似的河水，咕咚咕咚地灌一气，泥沙嵌在牙里，一咬牙，嘴里嘎嘎地响。到了冬天，河里結了冰，沒活干了。船主把我叫了去，丢給我一件破上衣，說：“沒活干了，回家吧！”我說：“掌柜的，咱們有言在先，到年底，你得給我做一身新衣，怎么給一件破衣服？”他冷笑着說：“嘿！你沒干滿一年，活又干不好，給你件上衣，已經便宜了你。”明知道和他論理是白日里点灯白費蜡，我只好拿着破衣服回家了。

我家离火車站近。当时营口的大商号恆利德的代理店常在車站上装卸粮食。穷人家的孩子就带着苕帚去扫抛洒在地上的粮食粒。可是资本家沒給你便宜撿，他規定，誰要想扫这些粮食，得先給代理店干半天活。我每天上午先去代理店干活，下午去車站附近扫粮食，一直扫到天黑才回来。扫来的粮食里面杂着煤渣和垃圾，晚上，母亲趴在油灯底下，一粒一粒地从垃圾堆里拣粮食粒，日子久了，母亲的眼睛累坏了，一到天黑，就什么也看不見。

鉄路上的伪警察見我們拣了点粮食，眼睛紅了。不給他点好处，就刁难我們，不讓我們撿。有一天，我扫了五、六斤土粮，天已黑了，正要回家，迎面看見一个路警向我走来，嘴里直喊着什么，我一看不妙，回头就沿着河岸跑，路警紧追着，眼看快追上了，我一急就往河里跳。二、三月天气，河里漂着冰块，冻得我直发抖。我在水里被水冲出了三里多远才上岸。身上

冻得发紫，回到家里連話都說不成句了。第二天就病倒在炕上，家里的生活更沒法子。

海上余生

病好以后，我在恆利德商号里当过杂工，在碼頭上扛过脚行，不管在哪里，总是离不开一个“苦”字。而最令人难忘的要数在网鋪里干活的那些日子。

网鋪的东家叫孙品一，是个刻毒鬼。不管多大的风浪总是逼着我們給他多出海打魚捕虾，工友們的死活，从来不放在他眼里。那天海上刮起了六、七級大风，孙品一还是非叫我們出海不可，一个工友說：“今天风大，出海有危險呀！”孙品一把臉一沉說：“好，你們不出海可以，我今天的損失就由你們包下来。少算每人得扣五块钱的工錢。”我們沒法，只好冒着风暴出海。海面上无风还要掀起三尺浪呢！那天就更甭說了。船一出海，浪头像一座座山似地压过来，船随着浪头上下顛簸着，好不容易才到了起网的地方。我剛一弯腰拉网，一个浪头打来，脚下一个趔趄，就掉进了海里。急浪一下子把我抛出三、四丈远，落下去的时候，人就像掉进山沟里似的，什么也看不見了。等第二浪再起来时，才听见远远的有人在喊：“张玉明！张玉明！你在哪儿啦……”工友們发现了我，急忙把篷升高，前来引救我。我在海中和大浪搏斗了半个多小时后，才被人救上船，这时我只觉得渾身瘫軟无力，眼前金花乱晃，吐了一口鮮血，便人事不省了。回到岸上，舵手孙繼兴把經過向东家学說了一遍。孙品一不管人的死活，却急着問：“网全部起



上来了嗎？”孙繼兴說：“沒有，张玉明掉下海了，为了救他……”东家跺着脚，滿肚子不高兴，說：“以后丢了魚网每人要罰五块钱。”

第二天孙品一非但不讓我們休息，还逼着我們冒雨出海。我們这样累死累活地給东家干活，可是一天只給早晚两餐高粱米稀粥，菜照例是煮虾米的脏咸水，只有过年过节时，才給点发臭的烂虾酱吃。我受不了这种虐待，又不干了。

“劳工”苦

离开了网鋪，我常在河边无目的地蹓躑。总想找个活儿，弄块饅饅吃。一天，伪滿区长张万良看見了，拍拍我的肩膀說：“张玉明啊，看你愁得这个样子，我給你找个工，好嗎？”

我一听有活干，当然非常高兴，忙问：“在哪儿？”“到牡丹江当劳工，那里吃的大米白面，誰去家里还给二十块钱和二百斤粮食作安家费。”我知道当劳工多半是去送死，可是家里能弄到二百斤粮食，至少可以顶一阵。于是答应了下来，约定第二天到营口河南的聚风站集合。

第二天，我到了聚风站。不少出外求生的穷兄弟早等在那儿。我们先被领到一座门口站着岗哨的院子里，人一进去，两扇大铁门就死死地关住了。等到晚上，开来了一列铁闷子车。有人怪声怪气地吆喝：“快上车！快上车！”于是我们就乱哄哄地上了车。一百多个人挤在一个车厢里，根本坐不下去，大家只好站着。车门紧紧地锁上了，里面又闷又热，一阵阵刺鼻的臭气熏得人直噁心。这样熬了七天七夜，才到了牡丹江，从此开始了劳工的生活。

提到当劳工的日子，真叫人辛酸哪！那时我被分在关东军的一个建筑部队里做工，整天跟着汽车拉洋灰、钢筋、砖石。每天干活十八小时以上，不拉满八趟车，不许休息。日本监工提着马棒、皮鞭紧紧地盯在后面，只要谁直一直腰，马上落下一阵皮鞭和棍子。干完一天的活，还要强迫你下操、唱歌。对于这一套，我们压根儿没有一点兴趣。发给我们吃的是：每人每天六勺稀粥和两个大眼窝头，饿得大家两眼发黑，站都站不起来；住的工棚里有半尺多深的水，用木板搭成了大连铺，一个不小心就会掉进水里。住不到半个月，人人身上长满了疥疮。

有一天，我和三个工人跟车去拉喂军马的豆饼。路上我

們掰了半块豆餅，藏在洋灰里，准备下雨天不能弄野菜时吃。誰知道汽車司机討好鬼子，告了密。劳工队长张广太把我們叫了去，恶狠似的眼睛瞪着我們說：“好啊！劣小子也 想吃豆餅了，也不去照照鏡子，你們配嗎？今天老子要叫你尝尝这豆餅的滋味！”說完就命令我們四个人互相打，他在旁边拿着皮鞭，見誰不使劲打，就給誰一鞭子，嘴里还罵着：“他媽的，使劲打！”这口怨气也只好憋在肚子里。过了几天，我們出去拉洋灰，趁車子上坡的机会，我們跳下車，把出卖我們的司机拉出来揍了一頓，才算出了口气。可是这一下事情鬧得更大了。这奴才又报告了张广太。张广太集合了全体劳工，先讓日本人哇啦哇啦地訓了一頓話，随后把我們四个拉了出来，按倒在地，木棒皮鞭雨点一样落在我們身上，直打得皮开肉綻，渾身上下沒有一块整肉。工人弟兄把我們抬回工棚后，张广太又不給我們吃飯喝水，想餓死我們。要不是工友們每天分些野菜給我吃，这条命也許早完蛋了。

又有一天，天气悶热，工人們身上沾滿了洋灰，像个泥人。刚好汽車开到一座桥下，日本监工喊了“米西，米西！”准备吃飯。我趁这功夫，跳到河里去洗个澡。那知，我刚跳下水，還沒游多远，鬼子监工看見了，招手叫我上岸。我知道不好，忙游回来，正要解释，一記耳光打得我站不住脚，接着又是一下。我用手一捂臉，一脚又踢了过来，我一閃，他踢空了，一个趔趄，几乎摔个跤，他更火了，用带着釘子的大皮鞋对准我的小腿一脚，我觉得一陣剧痛，弯腰看时，只見一块二寸来长的肉挂了下来，露出雪白的骨头，鮮血直流。我连忙把那块肉貼了

上去，用手按住。那日本鬼看着我，咧着嘴狞笑道：“嘿嘿！今天算饶了你，下次再偷懒，死啦死啦的！”

干了六个多月，牡丹江闹了洪水，工地上不能再干活了，日本鬼子这才把我们放回家。可是去的时候四百多人，回来时只剩下二百多人了，其中大部分弟兄都是被打死的。

暗无天日

我回得家来，什么门路也没有。这时，父亲在给人扛长活，母亲呢，跟着邻里一起做点小买卖。有一次，母亲从沟帮子背了点粮食回来，在路上被伪满的警察王大巴掌等查到了。他们狐假虎威，给扣上了“经济犯”的大帽子，反手绑着我母亲，棒打脚踢，血流了一地，连老人家的白发都染红了。

我闻讯赶去，只见母亲已经奄奄一息，气得我正想夺下他们手中的木棒，和这些狗杂种拼个你死我活，突然有人拉住我，回头一看，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摇了摇头，眼里含着泪水向我说：“孩子，胳膊是扭不过大腿的呀！赶快回去买点东西送上去就行了。”我强压住心头的怒火，跑到亲戚家找了三十个鸡蛋，送到区长张万良家里。狗区长嫌少。我央求说：“这还是从别人家找来的，小意思，您收下吧！”张万良留下鸡蛋，才跟我一块去了，他对王大巴掌说了两句话，母亲才逃出了虎口。我把母亲背回家里，老人家只剩下一口气，临死时她只留下一句话：“玉明，你要给我报仇……”

可怜，母亲受了一辈子苦，死后落得用一领席子裹着入土。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后，日本鬼子投降了。东北三省人民结束了十四年的亡国奴生活，满以为这下子可以吐口气了，谁知道国民党来了，穷人更遭殃。那时东北有些地方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国民党怕老百姓“串通”八路军，营口四周都围上铁丝网，没有路条谁也不许进出。

为了活命，我二兄弟逃到外面去讨饭，走得不知去向。我和父亲靠着一条破舢板船，在河边上靠给人摆渡为生。

听得有人说，从营口到哈尔滨做点小买卖可以赚点钱。为了生活，我心里活动了一下。没有本钱就把那条小舢板卖了，跟着四个老乡去。搭火车到长春，打算渡过松花江把货物运到八路军根据地去卖，谁知路上遇到了国民党的便衣特务，说我们是八路军的探子。“啪啪”打了一阵耳光，临了，被关进一间黑屋子里，三天三夜不给饭吃。后来又押进了吉林大牢。审问时，一个凶神恶煞的“官儿”，先问了姓名地址，接着就问：“谁派你们来的？”我回答说：“我是做小买卖的……”话没说完，那魔鬼一拍桌子站了起来，瞪着两只狼眼，像要把我吃下去似的说：“别装蒜！八路军驻在哪里？快说！”我回答说：“不知道。”话音刚落，一群打手举着碗口粗的棍子，没头没脑地打下来，打得我昏了过去。第二天继续审问，这回是压杠子，上电刑，灌凉水，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我心里想，任你这些魔鬼折腾吧，总有一天我要报这个仇的。

在大牢里折磨了二十多天，最后，货物被没收了去，人弄得半死半活，回到了家里。唉！旧社会里，穷人到处逢上死胡同。

解放了的日子

一九四七年营口解放了，这下子拨开乌云见了青天。

我又在码头上扛脚行了，每天赚十来斤粮食，吃都吃不完。同年七月七日成立了海运工会，我成了第一批工会会员，从此真正当家作了主人。干起活来乐滋滋的，浑身是劲。

那年冬天，工会号召工人支援鞍钢建设，我头一个报了名。我从来也没见过那么大的工厂，现在竟是我们工人自己的了，即使连着班地干活，我也不觉得累，一心只想把咱们工人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好。在党的关怀下，我学政治，学文化，生产上稍为有点成绩，领导和同志们就鼓励我、表扬我，几次评我为市和公司的先进生产者，还几次让我去休养，这些都是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啊！

谁知还有一件更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工会主席对我说：“张玉明，你有一封信，从朝鲜寄来的。”说着把一封连封皮都磨烂了的信交给我。这事可真教我纳闷：旧社会把我家弄得死的死，散的散，哪有什么亲人在朝鲜？该不会弄错了吧？工会主席说：“甭管它，拆开看看吧！”撕开信封刚一抖，就掉出了一张相片，照片上的人一个高高的个儿，胖胖的脸，一身军装穿得挺威武，原来是个志愿军战士。细细一看，脸盘儿真像我二弟。可是我二弟十几年前就离开了家去要饭，怎么会在朝鲜？我忙问：“信上写的什么？”工会主席给我念了一遍。我高兴得直跳起来，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原来，二弟出門后，路上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了壮丁，不久被八路军解放了，参加了人民的军队，跑遍了全中国。抗美援朝时他参加了志愿军，立了不少功，还当了电话排排长。没想到那时候饿得皮包骨的不懂事的孩子，竟变成了志愿军英雄。接着，工会主席又告诉我：

“这封信原来是寄到营口的，邮递员找不到你，到处打听，才在海运工会打听到你调到了鞍山。把信寄到鞍山后，他们又在鞍钢寻找了好久，先到耐火砖厂，没有，接着找遍了鞍山所有的轧钢厂，最后才在咱们粗轧厂找到了。这封信能到你手里也是不容易的呀！”

我听了心里更加激动。无数心酸的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党啊！我该怎么报答你的恩情呢？……

吴慧珠 宫霞堂整理

平原插图

龙须沟畔

机修总厂 玉德江

穷苦人家万事难

“旧社会里人吃人，妻离子散骨肉分。”在解放前黑暗的岁月里，穷人的苦比黄连还要苦！

俺家住在北京的郊区，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妈生了六个孩子：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和我。有钱的人家添了孩子是大喜；穷人家孩子多了就愁得没办法。爹进城里拉洋车，妈给人家纳鞋底。有活干还能混上个吃糠咽菜半饥不饱，活少了就得吊起锅来当钟打。孩子们饿得大哭大闹，大人瘦得只剩下骨架架。爹饿得没有一点力气还得硬撑着去拉车。妈看见爹走路时两腿战战慄慄的，劝他歇上半天，爹叹了口气，摇摇头说：“嘴是无底洞，不去拉车，八张嘴不能用线缝上呀！”说着就揣上两个野菜团子，蹒跚地走了……

有一天，妈在纳鞋底，我和哥哥们玩了一会，肚子饿了，我就嚎啕大哭起来，直嚷着向妈要饭吃。妈塞给我半个菜团子，我不吃，还是闹，气得她打了我两巴掌，接着自己也哭了。

媽哭着還給我擦眼淚，哄着我說：“好孩子，別哭，爹拉車回來稱一大袋子面，媽給你蒸饅，讓你吃得飽飽的。”我不哭了，乖乖地等着。爹剛進門，我就跑過去抱住他的腿，不住地喊肚子餓，要吃饅。爹怔怔的一句話也沒說，慢慢推開我，坐在炕上光嘆氣。停了好大會才知道是本家的大爺要我大哥過繼給他。媽抱住大哥又哭起來，爹說：“這不是賣孩子，也不是過繼給地主老財，就讓孩子逃個活命吧！”媽遲疑了好久，才答應下來。

大哥哭着剛讓人領走，穿着長袍馬褂的地主李金福就闖進了門，皮笑肉不笑地打個招呼就大模大樣地坐在院當中。黃鼠狼給雞拜年——沒安好心。我二哥三哥是雙胞胎，李金福早就起了黑心，想買過去。聽說大哥過繼給人家，他就連忙跑來，出七石糧食來買我二哥和三哥。“兒是娘的連心肉”，凭他怎麼說，媽也不願意。爹氣得直跺腳，說不出話來。院子里只听得我在哭鬧。李金福惡狠狠地說：

“哼，放着福窩不讓孩子去，真是賤骨頭！”

說着就忿忿地朝外走，到門口還扭回頭來說：“騎着驢看唱本——走着瞧吧！”

望着那可惡的背影，爹啐了口唾沫說：

“呸，狗東西！甭隔門縫看人。咱人窮志不窮，一家餓死也死在一塊。窮死也不替地主老財當牛馬！”

後來兩個哥和姐姐都先後餓死了，媽哭得死去活來。这么大的天地，竟沒有一條窮人的活路！

爹和媽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我長大了能有個出頭的日子。

我十一岁那年，爹不再让我整天拾柴拣粪打麻绳，他买了一炷香烧了，恭恭敬敬地为我祈祷，他对我说：“就是自己饿着肚子也要省几个钱送你进学堂。”知道要念书了，我高兴得一蹦三跳。去学堂的头天晚上，我躺在炕上老睡不着。妈坐在我身旁，就着一盏豆粒般大的灯火，用破布东拼西凑给我补衣服。天刚亮我就爬起来，胡乱吃几口饭就嚷着要到学堂去。学堂在十里河村的破庙里，这庙又高又大，阴森森的。妈牵着我的手送我到庙门口，嘱咐了好些话，才擦了擦眼角噙着的泪花，回去了。

这是一个私塾。进学堂除了给孔夫子的牌位磕头，每月初一和十五还要各缴一股香钱。有钱人家不当回事，可穷人家就难上难了。一股香要一毛多钱，能买一斤粮食哪。我每回交得晚，先生总是满脸不高兴。

没钱买书包，爹就给我找两块整整齐齐的木板来夹书，再用绳子拴住。要写字，连个红格本也买不起，往往是我这个“鼻涕将军”哭闹几番，爹想尽办法才买回一本来，递到我手里时说：“孩子，不是爹不买，实在是咱家穷买不起！”

穷人家的孩子上学的本来就少，寥寥几个便更容易受地主家孩子的欺侮。逢到这种时候，先生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做没看见。地主的孩子穿得整整齐齐，座位挑在前面，我穿得破破烂烂，先生总带着不屑一顾的神气赶我坐到最后。我听也听不清，看也看不真，有一回我朝前坐了个空位子，正和李金福的孩子坐在一起。他仗着他爹的势力硬不让我坐，还把我的书扔在地上。

在他眼里，穷人是他爸爸的牛馬，穷人家的孩子也該受他欺侮。誰能說“人之初，性本善”呢？階級的烙印从童年时代就烙在每个幼小的心灵上。

我瞪着眼，挽起衣袖，正想狠狠揍他一頓，叫他龟孙子知道知道咱穷人是不好欺的，也出出憋了好久的怒气。他看势头不对，光棍不吃眼前亏，立刻夹着尾巴溜到先生跟前去“告状”。先生看見穷人家的孩子竟敢“欺負”地主的小少爷，这还了得，非要“大动干戈”不行。他叫几个学生搬了一条板凳，放在他前面，又厉声吆喝我过去趴到板凳上，要打我屁股，我不干，他就讓学生帮他把我的按下去，退下褲子，拿起戒尺劈里啪啦地打起来，痛得我直咬牙。直到他打累了才停下来。屁股打得直冒血，沒法坐，还得站着听他像蚊子哼哼一样地講書。

按照先生的邏輯，地主家孩子的屁股是天生成用来坐椅子念書的，穷人家孩子的屁股是天生成用来挨打的。

我恨透了这样的学堂，先生和李金福一样是坏人。我再也不想在这儿呆下去，加上家里生活的窘迫也不能再讓我繼續念書。这样，連《三字經》還沒背完，我就草草結束了我的“学校生活”。

裁縫鋪里受熬煎

“炮声一响，眼泪汪汪”。一九三七年日本鬼子占領了北京城。鬼子兵在街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胡同的墙角里堆着餓死的人，散发着一股难聞的臭气。北京的城門終日紧閉。

我家住在城外，爹拉洋車常常是从臭水沟里爬进城去。在日本鬼子的統治下，地主、高利貸者、資本家加紧了对老百姓的压榨。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在我刚十二岁的时候，爹只好送我去当学徒。

能当上学徒可也不容易。我爹求爷爷告奶奶，不知說了多少好話，一个裁縫鋪才答应收我当学徒。腆着肚子的馮掌柜上上下下地打量我，說我又黄又瘦，干不了多少活，最后，才像买牲口一样写下一张契約，規定：一般的学徒是三年零一节为期，我年岁小要四年才能出师。要是不听话可以随意“管教”，有病或是被拉兵被打伤，掌柜概不負責。只許掌柜把学徒辞退，不准学徒半道不干，否則要賠全部飯錢和房錢。

給他当四年牛馬，受他剝削，反倒还說是掌柜养活了学徒，天下竟有这样的“道理”！

沒有办法，爹只好噙着泪在这张契約上划了押，按了指印。他拉住我囑咐說：“孩子，在这儿端的是人家的碗，吃的是人家的飯。处处要小心些，多跟师傅学点手艺，干活要勤快……”好久，才依依不舍地走了。从此，我脖子上就套上了奴隶的枷鎖。

学徒生活开始了，星星还在眨眼睛就起来挑水、生火、烧鍋，然后撒鋪、倒尿壶，紧接着做飯、抱孩子、冲茶、倒水……从早忙到晚，直到深夜才把白天做活用的木板拼起来当我的床，躺下去腰疼腿酸动弹不得。白天挨打受气，到了夜里还不敢大声哭一声，因为怕吵了掌柜的瞌睡，又要挨揍，眼泪只好朝肚里吞。朦朧中还想着媽也一定很惦记我，我多想跑回去看

看媽呀！可是不能。只有在梦里才能跟媽相会。有时候太累了，早晨起不来，少不了又是一頓拳打脚踢……

“收来的学徒买来的馬，任我騎来任我打，”这就是掌柜跟学徒的关系。挨黑挨打是家常便飯，师傅們对我也好不了多少。掌柜常对师傅們說：“学徒嘛，总得受管教，不受管教还能是学徒嗎？”所謂“管教”无非是“言教”和“行教”，这“言教”便是罵，“行教”便是打，两者兼施就是“教徒有方”。在他看来，学徒要是整天学手艺，那就是“不成体統”，乱了“規矩”。

当学徒的苦处真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师傅不是怕学徒学得少学得慢，而是怕学徒学会了任何一点手艺。师傅对自家人还是“传子不传女”，更何况是外来的徒弟呢？我在裁縫鋪里当了一年多学徒，学会的手艺仅仅是釘鈕扣，不过，做飯、烧火、挑水的“手艺”倒学得不少。

整天价劳累，学不到手艺，这还不算，最令人担心的是不知道啥时候就要挨打，終日提心吊胆。稍不順眼便“行教”起来，拿起什么就用什么打，也不管打在头上或是背上。掌柜受了老板娘的气，轉回头来准拿我当出气筒，不分青紅皂白地打上一頓；师傅們受了掌柜的气，也拿我当出气筒。真是“老鼠鑽风箱——两头受气”。

那时候鬼子兵端着刺刀在街上轉，掌柜怕上街，师傅們又要做活，所以每次买粮食总是我的差事。有一天下午，掌柜喊我去买粮食，我拿起口袋，接过“配給証”和錢就急忙赶去排队。因为配給粮每天只卖三千斤，从八点开始，卖完为止，要是排队晚了，买不上粮食，准得挨一頓打。

我趕到大和恆糧店門口一看，已經黑壓壓地排滿了人，亂哄哄的，我好容易才排上隊。干了大半天活，又累又餓，只好勒緊腰帶蹲下來等着。從太陽落等到太陽升，我用破口袋裹頭蓋腦地正在打盹，一片嘈雜的喊叫聲把我惊醒：要開門賣糧了！鬼子兵看見人們拚命朝前擠，海水般地擁過去，就喊着“八路的干活”騎着大洋馬沖了過來。前面有個老太婆被擠倒在地上，我正想上前扶一把，只見大洋馬沖到這里，一聲慘叫，人們愕然回過頭來看，老太婆已被活活踩死了，蒼白的頭髮沾着殷紅的血……我捂着臉不敢看下去，隨着被轟散的人群逃回鋪里，心還呼呼地跳個不停。

沒有等我往嘴里塞完一個餅子，老板娘就妖聲妖氣地喊我去抱小少爺。這時掌櫃從外邊回來，知道我沒買到糧食，非常生氣，只是因為我抱着他的“寶貝蛋”，才沒有打我，但還是指着我的鼻子罵了一頓：“笨蛋，蠢材！連糧食都沒本事買，真是白養活你了！”

我賭氣轉身就走，不小心把“寶貝蛋”給撞在門框上，哭個沒完。老板娘聞聲趕來，搶去“寶貝蛋”，順手給了我兩巴掌。掌櫃也吹胡子瞪眼氣得要命，拿起棍子亂打，我力氣小，奪又奪不過，轉身要跑，被他拽住胳膊凶狠地揍了一頓。挨完打還得照樣干活。我一只手擦着眼淚，一只手端水送茶。掌櫃吊起三角眼惡狠狠地盯住我。

裁縫鋪里正在作皮活，羊毛亂飛。掌櫃的茶杯里飄進了一根羊毛，他殺氣騰騰地拿起根鐵尺照我頭上打下來。我哎喲一聲，捂住頭就跑，頭上熱辣辣地痛，我一看，滿手是血，鮮

紅鮮紅的順着手往下淌，一滴一滴地掉到地上。掌柜还拿着鉄尺在后面赶着罵：“兔崽子，看你往哪里跑！”我哭着冲到鋪子外面去，耳朵里还隱約听到他的阴森的冷笑：“哈哈……总跑不出我的手心！”

我多么想一口气跑到家，扑到媽怀里痛痛快快地哭一場！跑到半路，我停下来了。不，我不能回家。家里还揭不开鍋，我回去不又是多一张嘴嗎？再說，打成这个样子，爹媽見了該多心疼呀，我越想越难受，哭得像泪人一样。我轉身往回走，但是我沒有回裁縫鋪去。白天流浪街头，求乞討飯，晚上蹣縮在人家門洞里过夜。这样过了四五天，掌柜派人找到了我，硬把我拖了回去。我不願回去，可是又沒有別的办法。当学徒的契約握在人家手里，上面規定，如果学徒半道不干要賠出全部飯錢和房錢。家里把鍋吊起来当鐘，哪里有錢賠？不能再讓家里受累。我只好擦了擦泪又回到牢籠里。

在这牢籠里，学徒的生活連牛馬都不如，有个歌謠說：

当学徒，难上难。

睡的破木板，

吃的糠菜团。

掌柜不順眼，

一天打三遍。

两头見星星，

天天不得閑。

当学徒，难上难！

吃飯的时候，先是掌柜和師傅們吃，剩下的学徒才能吃。

剩多吃多，剩少吃少，不剩就得餓肚皮。日本鬼子配給的混合面又簡直不是人吃的東西，折騰得我黃皮包骨頭，眼泡腫起老高。

六月間下大雨，沒活干，師傅們都回家去了，掌櫃也要送老婆回家去，臨走時只說要我看好門，吃飯的事連問也沒問。我餓得沒辦法，只得把剩下的一點沒有脫皮的谷子煮來吃。肚里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塞了下去，誰知拉屎的時候就困難了。兩三天拉不下來，憋得我躺在床上直哼。掌櫃不放心我看門，第三天就趕了回來，見我憋成這個樣子，生怕我死在鋪里給他添麻煩。思忖了一陣便“大發善心”給了我一塊日本票，趕我回家“養病”。狗東西見死不救還要朝外趕，我賭氣就趑趄趑趄地走了。我家在城外十來里地，要在平常，一會功夫就跑到了家。可今天我憋得上氣不接下氣，肚子疼得要命，只得走幾步蹲下來歇歇氣，再不行就爬。豆粒般大的汗珠從額上往下滴……爬一陣歇一陣，心里恨死了黑心的掌櫃。我想，死不了總要找到媽，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從太陽出來直爬到天黑才摸到家門口，拍拍門，叫了兩聲媽就昏過去了。醒來時見媽正抱住我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慟哭。病在兒身上，痛在娘心上。見我憋得不像樣子，就咬咬牙用挖耳勺一點一點從肛門里朝外掏。整整掏了一夜我才能拉出點屎來。這才留下了一條活命。

“天下的窮人護窮人”，打鐵的于大爺看着俺家實在沒法過，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介紹我到南魚池大街的一個鐵匠鋪里當學徒。我就從一個火坑跳進了另一個火坑。

龙須沟畔把鉄打

鉄匠鋪在龙須沟的南沿，掌柜叫严振鐸，滿脸横肉，肥得像条猪。他眯縫着眼把我打量一番就叫我爹在契約上划押按指印，又吩咐我回家准备一下，停两天来上工，还直对我爹說：“要是不等着用人，决不会收这么小的徒弟，又黄又瘦，像根劈柴……”爹千恩万謝地領着我出来。出了鋪門我扭头看，还見严掌柜像个貨郎鼓似地直搖頭。

过了两天，从家里临走时，我煮点干白菜叶，像吃山珍海味一样美美地吃了一頓，还穿上了媽的破棉袄。棉袄又大又长，我找了根草繩胡乱拴在腰里，頂着冷风走了。想着爹和媽餓得躺在炕上，弟弟餓得皮包骨头只剩下两个大眼睛……我一边走一边用袖子擦着眼泪。泪水陪着我一路来到了龙須沟。

龙須沟里的水脏得发黑，臭得熏人，可是，掌柜們的心比这水还要脏还要臭！

沟北沿的鉄匠鋪每天干的早，收的也早，南沿的严家鋪子每天干的晚，收的也晚。沟北沿的掌柜逼着打鉄工人起半夜干五更，就指着南沿的火光說：“你們看，人家南沿的鋪子爐火通明，可早就干了！”其实，我們南沿是貪黑干还没有收工。严掌柜当然也不落后。他每晚不讓我們干到鸡叫就好像过意不去，总是朝着北沿嘮嘮嘴說：“你們听，北沿的鋪子叮叮当当，現在还没有收工，干得正欢哩！”其实，人家北沿是起早干刚开工。两家的掌柜就这样合伙整我們工人。

从早干到晚，每天十五六个小时，我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怎么能撑得住？连师傅们也累得东倒西歪，白天睡过觉的严掌柜还直打呵欠呢。时间长了就熬得两眼通红，整天渴睡得要命。吃饭盛粥时能瞌睡得两手插在粥里，端着碗吃饭时磕睡得碗会啪地掉在地上，大便时瞌睡得坐在尿上……

这次当学徒不像我在裁缝铺里每天要看孩子作杂事，而要我干活了。这活就是拉风箱和做饭。说起做饭，这是我早就学会的“手艺”，只是这里人多锅大，做得要多，说到拉风箱可就难了。

我个子小，拉风箱得用肩扛着风箱杆。从天亮到半夜，累得骨头像散了一样。这还不算，特别是师傅啥也不教我，拉着风箱我也不知道要烧到啥程度，火候不够了师傅要打，火候过头了把铁烧化，照样是打。打的时候，不是拳头捶就是巴掌扇，不是腿踢就是脚踩，而且往往是拳打脚踢一齐来。弄得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也不知道为啥打我。有时候铁化了，掌钳的师傅就夹起来故意放到我眼前，让我看。那怎么能看呢？烤得我头发直冒烟，哪里还敢抬头。我用手捂着脸爬到墙角里，真想找个老鼠洞鑽进去，可是师傅们还在一边哼着生气。

铁锤终日叮当响，老板钱柜里的银洋也在响叮当。真是“榨干了工人的血汗，塞满了掌柜的腰包”。资本家的每一块银洋都是咱工人的血汗铸成的！

严掌柜整天哭丧着脸，凶神一般。但是，他也有高兴得眉飞色舞的时候。那就是：第一，每天晚上他把算盘拨得山响，

一五一十地数着銀洋的时候；第二，尤其是在劈哩啪拉的鞭炮声中他的新紅爐宣告落成的时候。

严掌柜的鋪子虽小，他的野心却不小。他把鋪子定名为“永立兴”，是有用意的。他有四个儿子：承立、承足、承江、承山，凑起来正是“立足江山”。講起这个时，他总是捋着八字胡，高兴得不得了。每当士紳們伸出大拇指，連連称贊“永立兴”生意兴隆，贊揚“立足江山”有出息的时候，他总是抽动着滿脸橫肉，笑得合不攏嘴。这便是我們所見到的他第三种高兴的时候。

但是，也有例外。有一次他竟然眯縫着眼对我笑了一笑，挺着肚子把自己装扮得活像个“大慈大悲”的弥勒佛，递給我一件粗布上衣。我立刻警惕起来，严正地說：

“这是干什么？”

他皮笑肉不笑地說：

“穿上，穿上，穿上再說……”

我迟疑了好久不敢接，但轉念一想：“老子整年累月給你当牛馬，五黄六月还是披破棉袄。別說一件，就是十件也該穿！”想到这里，我就拿过来，橫披在身上扭头走了。过了一会我才看透了严掌柜的“精明”打算。原来，日本鬼子不讓光着膀子上街，毒日头下披件棉袄出門又太不像話，人家会笑話严掌柜待徒弟太苛刻。現在有了件单衣就可以照样上街挑水，买东西，而且严掌柜还能借此夸耀自己“待徒如子”。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嗎？

这样，旁的人在中午还能歇上一会，我却得照例跑老远的

路去給掌柜家里挑水，一挑就是三担。我担着笨重的水桶爬上高高的台阶，累得喘不上气来。掌柜的老婆照例两手叉腰站在房檐下，两只眼死瞅着我，好像我是小偷似的。

我在火星乱飞的紅爐旁，拉着跟我一般高的大风箱，烤得滿面黧黑，像个周仓。严掌柜看我能干活了，就又收了个小学徒，叫我抡大錘。每天干活时，胸前烤得发焦；背后掌柜的吆喝声像鬼嚎，抡大錘，震得我虎口发裂，两耳轟轟直响。新来的师弟个子小，怎么也沒法把鍋端上爐子，因此做飯的差事还是由我兼管。

做飯是件苦差事。做少了，师傅們不够吃就发脾气，活也干得少，掌柜就罵我存心捣乱。做多了，掌柜又罵我費粮食，只讓我吃剩飯。冬天还好办，在夏天就麻烦了，飯馊了也只得捏着鼻子硬咽下去。有一次，剩的窝窝头长了毛，实在沒法吃，我就在半夜里把它扔到尿池里（这尿池是掌柜怕工人解溲跑得远，耽误干活，在鋪子旁边砌的）。沒料到第二天窝窝头漂了起来，这一下可坏了，真像是戳了馬蜂窝，乱烘烘的鬧得天翻地复。少掌柜严承立擰住我耳朵，凶煞煞地把我按倒在尿池边，劈哩啪拉就是几个耳光，还逼我用手捞起来，要我吃下去。这不是騎着人的脖子撒尿嗎？我撿起一个就朝少掌柜的脸上摔过去，說：“你先吃！”这下子几个少掌柜的肺都要气炸了，“立足江山”一齐动手，拳打脚踢皮带抽，又打了我一頓，临了还罰我这一天不准吃飯。

晚上收工后，我还得强打精神去熬粥。又餓又累，一天下来，我两眼冒金星，实在沒一点力气了。从爐子上端下鉄鍋

时，我两手直打颤。嘩的一声，一大鍋滾燙的粥全澆在我身上，痛得我頓時昏厥過去。嚴掌櫃怕我死在鋪子里給他招晦氣，連忙叫人把我送進個小醫院。他不肯多出錢，醫院也不肯好好治，胡亂給我塗上點葯水搥上紗布算完事。

我燙得遍體鱗傷，兩腿冒血，每天要昏過去好幾次。爹聽到了信急忙趕來，見我燙成這個樣子，就罵黑心的掌櫃：活人折磨死，死人朝外推。在醫院里沒錢治，不病死也要痛死。爹只好用車把我拉回家，用土方給我治。幸亏咱工人的筋骨硬，我硬是活了下來！家里沒法過，還得去干活。當我拄着根棍子到鋪里的時候，掌櫃大吃一驚，睜大着眼望了我好半天，干笑了兩聲，只好讓我復了工。

燙傷還沒有全好，我又揮舞起笨重的鐵錘。夏天里渾身奇癢難當；冬天里冷風吹來，渾身直打哆嗦，像刀割一樣難受。手裂得像枯樹皮，血順着深深的裂縫滴到地上……

龍須溝整年累月是黑夜，漫漫长夜無盡頭，太陽啊，你啥時才能照到龍須溝？

從鄉下來了幾個新伙計，他們把毛主席的名字傳到我耳里。我們大伙有了希望，想起了他老人家，心里就熱烘烘的。在北京解放的前夕，夜深人靜的時候，站在龍須溝沿可以聽到遠處隆隆的炮聲！嗨，咱工人可有了奔頭了！

奴隸翻身見晴天

一九四八年北京解放了。共產黨給我們工人撥開了烏雲，現出晴天。可是，資本家是會不甘心情願讓工人翻身的。

严掌柜虽然收敛了一些凶焰，还是一天逼着我们干十五六个小时，照样把我们当牛马驱使。

江山是自己的了，不能再让掌柜骑在我们脖子上作威作福。我就和韩朝梁、苏焕元等总共五个人一起商量了几夜，最后写了三封简单明了的信分别寄给《新民报》（今《北京日报》的前身）、劳动局和九区职工会。我们说：中国大陆全解放了，只剩下两个地方没解放——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金鱼池大街的铁匠铺。我们盼望着毛主席派人来，领导我们和资本家斗争，使“印把子”真正握在工人手里。不久，劳动局就派人来了。我们有了靠山，斗争的劲头更大了。

一九五一年，“三反”“五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严掌柜眼珠子一转又使出了坏心眼。他两手一摊，望着大伙，叹了口气说：“唉，都是叫‘三反’‘五反’闹得咱生意不好。我看，咱们就同舟共济吧，工资往后再说。反正是买卖好咱全都好，肉肥汤也肥。”我们干了一年，他连一个工钱也不发，反而说这是因为“三反”“五反”的原故，真把我们气坏了。这时候，我是天天上工会去的。在党的教育下，觉悟一天天提高，工人和掌柜谁养活谁的问题也认识清楚了。于是，几个积极分子串连了大伙，在龙须沟畔的铁匠铺里掀起了阶级斗争的声浪，终于斗倒了严掌柜。

经过这个回合的斗争，虽然斗得严掌柜抬不起头来，可是他并没有认输。别看他整天搭拉着脑袋，坏主意可还是装满了肚子。一九五二年他假装歇了业，等我离开以后，他又重新开了张，而且变得更加猖狂，指名道姓地骂我瞎积极，说我闹

来鬧去鬧个沒活干。劳动局給咱們撐腰，又斗争了一个回合才打下了他的气焰。过去当学徒咱給掌柜写契約，这回他規規矩矩給咱写了契約：賠我三个月的飯錢，并在三个月內給訖。通过这回斗争，我知道了那些被推翻了的掌柜們总是想恢复他們的“天堂”，所以，阶级斗争的时代并没有过去。

不久，我就来到了石鋼，一九五四年入了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想想过去，看看現在，我深深地体会到了阶级的恨和阶级的爱。过去的时代是阶级压迫的时代也是阶级斗争的时代，現在阶级斗争时代还没有过去。青年同志們：要警惕啊，千万不能忘記过去！

晁福林整理

当我年青的时候

运输部 陈德琳

我今年五十五岁，过去在运输部机务段当火车司机。一九六二年党照顾我年岁大，调我到车辆段看打风机。

苦难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帝国主义支持军阀混战的时期中度过的。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父亲就在京奉铁路丰台工务段做临时工。临时工是兔子的尾巴，不长，资本家说声裁人，就失业。父亲每年只能做七、八个月的活。就是有活干的时候，每月的工资也仅仅只有六块六毛，哪里够全家老小七口人糊口？当时我和母亲、妹妹等住在丰台看丹村，守着三间破土房，全靠父亲这点工资度命。

为了塞饱肚子，母亲每天带着我们到地里和山上挖野菜、采树叶。我瘦得皮包骨，脸色蜡黄，鼻子常出血，上树采树叶时，怕我劲儿不够掉下来，便先用绳子拦腰捆在大树枝上，再艰难地摘树叶，稍不小心，手心手指就被树枝划破。有一次，我一个人出去挖野菜，看见地主家的孩子穿着新衣服去逛庙

会看大戏，我跑回家去跟媽媽吵着要去，媽媽看着我，好半天沒說一句話，泪珠順着她的臉頰滴落在我的脸上。过了好一会，才用顫抖的声音說：“孩子，你投錯了人家！地主家有吃有穿，孩子可以逛庙会，咱家穷，哪有錢給你去逛庙会？……”說到这里，就抱着我大声痛哭起来。我边哭边說：“媽，等我长大就好了！”媽抬起头，哄着我說：“是啊！砖头瓦块还有个翻身的日子，好孩子，咱們总会熬出个头的。”

冬天，树叶掉光了，野菜也沒了，我父亲又被資本家开除了，全家只好靠夏天存下的一点干树叶、干野菜充飢。因为肚里无食，身上无衣，我們常常天不黑就上炕躺下，直躺到第二天晌午。有时候，爹出去借粮食，媽在家点火烧水，鍋里的水烧得嘩嘩的开，不知对了几次凉水，还不見爹回来，媽守在鍋台前，一会儿看看炕上躺着的瘦得干巴巴的孩子，一会儿看看鍋里的白开水，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亲 人 不 亲

屋漏又逢連夜雨。父亲病了。母亲去向本村开油盐鋪的赵掌柜借錢，說尽了好話，赵掌柜說：“借錢上利，有言在先，到年底可得本利一并归还！”就这样先后一共欠下他三十元。到了腊月三十那天，父亲說：“穷人就怕鬼門关，我还是出門去躲一躲吧！”說罢正要出門，不料，这时赵掌柜忽然闖进門来，两人碰了个对面。父亲只得賠笑脸說好話，赵掌柜看到实在逼不出錢来，念头一轉說：“还不起錢可以暂时不还，可是得讓你家三爷給我一句話。”

三爷就是我的亲三叔，念过几年书，后来离了家，不知怎么在山东一个县衙门里混上了个差事。我两岁那年，三叔同我们分了家。我父亲守着几亩薄沙地，又欠了债，没办法把地卖了，从此就上丰台来扛活了。三叔当了官，有钱有势，见了我们连理都不理。那几天，他正回家乡来过年。

父亲听了赵掌柜的话，摇摇头，觉得没指望。可是赵掌柜说：“同胞手足，还能不扶你一把。去不去由你，只要你有办法还我钱就得。你看着办吧。”

父亲逼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去找三叔。不出意料，三叔冷言冷语地说：“叫我答句话可以，可是以后你又用什么去还呢？再说，各人有各人的难处，我手上钱也不济……”

父亲听了这话，实在憋不住，气愤地说：“借不借由你，用不着装穷，谁不知道你跟着县大爷搜刮百姓……”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三叔恼羞成怒，一把把我父亲推出门外，父亲摔在地上，扭坏了脊梁骨，回家后，对我说：“琳儿，记住，穷，我们也要穷得有骨头，你三叔早不是咱家人了。”

欠赵掌柜的钱得还。父亲一咬牙，把仅有的三间土房托人卖掉了。事后我们才知道，买我家房的就是我那三叔。他买去我们的地皮，盖起了五大间北房。我们只好搬到丰台福顺后街，租住了两间又黑又漏的破草房。

小孩队里当杂工

父亲的身体本来就不好，这回受了窝囊气，痔疮发得很厉害，肛门里经常流血，成天价躺在炕上呻吟，又没钱请大夫，眼

看病勢一天天加重，一家人眼淚都流盡了。

一天，葛模正大叔來看父親。他是做鐵匠的，和我父親是好朋友，看到這情景，向我媽說：“老嫂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一定要想法治病！”

我母親悲痛地說：“連飯都吃不上，拿什麼治病呢？”

葛大叔給我們出主意說：“找幾個伙計，咱們一起去向八老爺求情，成年累月給他賣苦力，現在人病成這樣，他總不能不管吧！”

“八老爺”就是掌管丰台工務段的那個英國人。第二天清早，葛大叔帶着母親和我，穿過泥土道，踏上平整的柏油馬路，來到一座兩層的小洋樓前，門前停着一輛包車，車夫閑坐在台階上。這就是“八老爺”的公館。這時，才清晨七點多鐘。車夫告訴我們，“八老爺”沒起床，得在門外等着。直等到將近九點，才見門一開，出來一個高鼻子胖洋人，一手摟着個妖里妖怪的洋鬼婆。見了我們，胖洋人把鷹鉤鼻子一哼，怪吓人的；洋鬼婆忙從提包里掏出塊白紗手絹，捂住鼻子。我照着母親事先教好的話說：“八老爺，我父親病重沒錢治，全家都在挨餓，想向您借點錢。”

“八老爺”連眼皮也沒抬一抬，過了半天才拉長聲調問：“你們是幹什麼的呀？”

葛大叔從旁向“八老爺”訴說了我家的情況。“八老爺”這才轉了轉眼珠，答應借錢給父親治病，但是有個條件，就是要我代替父親給他做雜工，工資減半，還要按月扣還借款。明知不合理，我母親也只好同意。這時，我才十一歲，還正是貪玩

的娃娃呢！

第一天进厂总觉得怪冤的，心想：我这么点儿的小孩怎么就該作工呢？！哪知一看，厂里到处都有我这样的小孩在作苦工，很快地我便和他們混熟了，自然而然成了“小孩队”員。

每天天不亮，我們就得上工。搓刨花，扫庫房，擦包車，干杂活，监工看不順眼，就用鞭子抽，不讓我們有喘气的工夫，一直到天黑点完了路灯（当时还没有电灯）才能回家。

給工厂老板干活，只要工头不在，我們便想办法磨洋工。小孩队里尽是十一、二岁的孩子，誰不爱玩。工务段放着一堆堆八九丈长的大木杆，我們弄来二、三十根，搭个尖頂“帐篷”，里面便成了我們的“小俱乐部”。工头一走，我們派个伙伴放哨，其他的人就鑽进“帐篷”里去玩儿。我們用白灰块画好各式棋盘，从地上拣堆石头子，下起“三六九”（棋名）、老虎棋或“四子”（棋名）来。只要“崗哨”不作声，我們在里面就有說有笑玩个不停。若是工头来了，“崗哨”大声放个暗号，我們便呼啦一下散开。我們人多、个小、腿快、眼尖，一溜烟就跑远了，工头根本找不着。

玩够了，我們就睡大觉，有时一睡半天。

当时工人中流行着两句話：“学会了磨洋工，拉屎三点鐘，看看不够点，回去再空空！”“不打勤的，不打懶的，专打那不长眼的！”說的就是我們同资本家、狗腿子斗争的一部分情形。

团 結 一 心

一九二三年，我們听說武汉有个工人叫林祥謙的，被軍閥

杀害了，工人们个个攥紧拳头憋着一肚子气，想找机会出出。年底资本家迟迟不发工资。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会发动大家罢工。

一天清晨，京汉铁路工人全线罢工了。我们知道九点钟有一趟三次快车要通过我们这儿。全体工人便坐在铁路两边准备卧轨，不许火车通过；若是路局不答应立即发放工资，我们就全不起来。工人万众一心，没有一个去上工，还把段里大大小小的头儿们一齐抓来，迫使他们和我们一起卧轨；要死你们这些头头也甭想活命！

九点半，三次快车果然来了，可是铁轨上坐满了两排工人，密密麻麻，望上去见不到尽头，列车根本无法通过。车务段段长“迹脸子”（因为他脸上有块黑迹，所以工人给他取了“迹脸子”这个外号）看见形势不妙，请示北京铁路局，路局无可奈



何，答应晚上八点送钱到丰台，第二天清早发给工人。“述脸子”把这个消息告诉工人，要工人散开，让三次快車通过，并保证第二天清早一定发工资。工人们合计了一下，说：“明天不开支，我们便照样来一次，何时发何时罢休！”他见工人人多气足，说了声“好！”夹着尾巴就跑了。第二天，他乖乖地发了工资。原来，顶顶大名的大段长也有个在工人面前低头的时候！

那时我十五岁，大道理说不清也想不明，只觉着工人们抱作一团，齐心合力同资本家斗，就有办法。

卖了青苗找工作

我十六岁那年，“八老爷”吸够中国人民的血汗，装满他的腰包，屁股一拍就走了。新来的洋鬼子叫斯维。他一上任，便大批解雇工人，我是其中的一个。失业后，我在铁路沿线捡煤核。为了多捡点，经常帮火车司炉扒炉灰，干点零星活。和他们混熟了，自己便留心从旁学了点司炉技术。有机会时也给人家打短工，但是总没有找到固定工作。

“七七”事变以后，生活更难维持，我便带着妻子回到老家，租种了别人三亩地，打下的粮食有时还不够交租，仍然是受气挨饿。一九三八年，听说石景山招考司炉，第一批已登记过了，得等第二批再登记，而最坑人的是登记时要交六十元的“押金”，明知这钱是进了私人腰包，可有什么办法呢？为了凑足这笔钱，只好把租种的三亩地的青苗卖了，换来四十元，又向人借了二十元印子钱。凑巧，第一批登记的人中出了个空额，我便去请求负责登记的工头让我补缺，那工头眼珠一转，

說：“補缺可以，你得再交五塊錢手續費。”這分明是存心敲詐，我心里罵道：“你們真是喂不飽的寄生蟲！”後來，東求西借，又湊了五塊錢，這才算踏進了石景山工廠的大門，作了司爐，從一九四二年起又作了廠里的火車司機。

從此，我一直呆在石景山鋼鐵廠。這期間嘗過日本鬼子的皮鞭，挨過國民黨的拳頭，熬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終於來了救命恩人共產黨，把我們這些受苦的工农大眾從人間地獄中解放出來，從帝國主義資本家的奴隸，變成了國家的主人，從茅草屋搬進了新洋樓，從吃糠咽菜到吃大米白面……。想想過去，看看今天，我簡直生活在兩個世界，一個是地獄，一個是天堂。回憶舊日恨，更覺今日福，回憶舊日苦，更知今日甜。千言萬語說不盡，只有用加緊生產的實際行動來報答黨和毛主席的大恩情。

我要把我經歷的苦日子告訴給我的兒女、徒弟和青年們，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父母在他們這樣的年紀是怎樣生活的，使他們認識今天的幸福來之不易，使他們更加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聽黨和毛主席的話，努力學習，好好工作，作一個紅色的接班人。

何曉夏 陳福深整理

平原插圖

三个监狱

动力总厂 张景和

家破人亡

一九三二年，我出生在一个破产农民的家里。在这前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法西斯强盗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中国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了。

一九三九年，我才七岁。门头沟涨大水，冲走了我家的房子和破破烂烂的家什。全家五口人，好不容易逃了出来，侥幸没有淹死。水退后，我们回到我家原址时，只剩下一块光秃秃的地面。我父母看着这幅情景，呼天抢地，哭得死去活来。我们兄弟三人，呆呆地看着父母哭，自己也跟着哭。我家本来就穷得活不下去，再遭到这样大的天灾，日子越发难混。没有办法，只好向地主家租了一间破茅房，避避风雨。家里粒米不存，全靠父母打短工，好歹挣点混合面勉强度命。父亲因为只有一点混合面和野菜吃，扛的活又累，身子骨儿一天天黄瘦下去，后来又渐渐浮肿起来。有一天，他说要到外乡去找工做，留下我们母子四人就走了。他这一去，从此杳无音信，明

明是活活地餓死在外面了。母亲守了寡，带着我們兄弟三人无法生活，眼睁睁地看着三个孩子又黃又瘦，餓得有气无力，她的心都碎了。迫不得已，她含着眼泪，把我的弟弟卖給了河南街一个外国人。我哥哥餓得受不了，到地主家要点吃的，地主誣賴他，說他偷了地主家的东西，不容申辯，一頓毒打将他打死了。剩下我母子两人，母亲为了养活我，到西兴房給人家当嫖姆，每月掙三块钱工錢。但那时物价經常涨，三块钱买不了多少东西，仍然无法維持我的生活。母亲不忍看着我活活地餓死，无可奈何，她第二次背着自己亲生的骨肉——我去出卖。儿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她的心里像乱刀子扎一样的痛，可是地主、資本家，看我黃皮刮瘦，又瞎了一只眼睛（我小时，剪刀掉下来砸坏的），干不了什么活儿，不肯要我。母亲无日无夜地給資本家干活，等于卖给了他家。沉重的劳动，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哪里还有余力照顧我！唉，有錢人的孩子能买到奶娘的照顧，穷人的孩子却得不到亲生母亲的撫育。我們一家亲骨肉，就在这天灾人祸的煎逼下，死的死，卖的卖，母子离散，家破人亡了。

孤儿院——儿童監獄

母亲在外面帮人，剩下我孤孤单单一个人留在那間破茅房里，如何生活下去呢？不能坐着挨餓，唯有出去要飯一条路。要飯也得有个飯碗、有条討飯袋呀。我在那間破茅房里东翻西找，总算找到一个破鉄碗，一条小面粉口袋。袋子上还粘着一点混合面。我使劲地抖，抖出一小撮混合面，想用那个

破鉄碗煮熟了吃。煮出来像一滩浆糊，我伸手去端鉄碗，燙得很，手一松，半碗稀溜溜的粥，全倒在我的脚上。脚燙起了好几个大水泡，痛得我在地上打滾。水泡破了，脚脫了皮，热辣辣地疼得着不得地。我只好爬着去要飯。我一家家地爬，求人家給点吃的。有錢人宁可把东西放在家里烂掉臭掉，也不肯給穷人一点。穷人家尽管鍋底朝天，自己也吃不飽，看到我这个模样，总匀出一点給我吃。碰得好，一天还能吃得个半飽。我就这样爬呀爬呀，爬过了多少村子啊。

一天，我爬到了倭瓜窑資本家办的一个所謂孤儿院。他們收下了我。資本家挂羊头卖狗肉，表面上說是收留貧苦孤儿，办的是“慈善事业”，实际上却是在这块金字招牌掩盖下干着剝削劳动人民、残害儿童的罪恶勾当。他們借口办孤儿院，挨家挨戶地向人家募捐，募得了大量錢財后，却塞进自己的腰包。

孤儿院是一个儿童監獄。我們这些三四岁到七八岁的穷孩子，五十多个人住一間小房子，屋里鋪着七零八碎的麦秸，和猪窝沒有两样。拉屎撒尿全在里面，臭气呛人。跳蚤、虱子、蚊子，咬得我們无法安身。但是我們因为被力所不及的劳动弄得精疲力竭，一到晚上，也就顧不得这些，橫七豎八地倒在这猪窝里，胡乱地睡去。我們吃的是混合面加野菜煮的稀粥，簡直就是猪吃的泔水，而且还吃不飽。开飯时，大家一拥而上，搶的搶，打的打，哭的哭，鬧做一团，搶不到的只得咽泪水。有一次吃长了毛的窝窝头，規定一人一个，有个孩子实在餓得不行，拿了两个，被管事先生看見，啪啪就是两个耳光，临了，

夺下他手里的两个窝窝头，一个也不准他吃。说到穿衣，那就更惨。我们经常光着屁股，也没有人来管。生了病，他们也不管你的死活。我那时烫伤了脚，没人给治，烂得流血流脓，走起路来一步一瘸，先



生还拿着棍子硬逼我去搬煤。我刚比筐子高一点儿，抬起几十斤一筐的煤跌跌撞撞，哪里走得稳当。一次被石头绊倒，摔在煤块上，砸得头破血流，那“慈善”的先生举起棍子就打。先生是资本家雇来专门监督我们劳动的，其他的事，他一概不管。一次一个孩子中午跑出去了，没有干活，晚上回来，先生抓住他就打屁股。打耳光、打手板、罚站、罚跪，已经成了家常便饭。死了人，他们埋都不愿埋，生怕“浪费”木板，扔在外面，又怕被人看见，有损他“慈悲为怀”的“美名”。一次，一个瘦骨嶙峋的小孩，进孤儿院不几天就死了。他们就在夜里悄悄地

把尸体拖出去，扔到树林子里，讓野狗去吃。

我在孤儿院里天天干重活，挨打挨餓，过着監獄般的生活，心里又惦记着媽媽，夜晚常常从睡梦中哭醒过来。好容易熬了三四个月，脚上的伤好了一点，我就逃出了孤儿院，去找我母亲。

我一边要飯，一边找母亲。风里来，雨里去，一个个村子，一条条大街小巷，到处寻找，终于打听到母亲在資本家焦克刚家帮工。我急急忙忙跑到他家时，因为餓花了眼，一下子竟昏倒过去了。母亲看到我这付光景，心里像刀絞一样，抱着我嗚咽地抽泣，焦克刚黑心的姨太太却歹毒地对我母亲說：“你还要他作什么，沒指望了，拉去埋了吧！”

穷人护穷人，住在資本家隔壁的一个穷人，看到这个样子，热心快腸地端了一碗面糊糊給我母亲喂了我，我才渐渐地醒轉来。

煤窑——地下監獄

九岁那年，为了活命，我只好下窑去背煤。我背着筐，和大家一道，手脚着地，像四条腿的毛驢一样，在那狭长的坑道里爬出爬进。坑道是傾斜的，梯子曲曲折折地伸展到地底。有的地方还能够直着身子爬，一到最陡的地段，梯子就会碰破鼻梁，只有斜着身子往上爬。我刚下煤窑时，不知道这个要訣，背着煤豎着往上爬，梯子老碰鼻子，背上的筐頂着石壁，脚一軟，常常从梯子上咕咚咕咚滾下去。石壁刺得我遍体鳞伤，痛得爬都爬不起来。監工看見了，一頓拳打脚踢，我只好掙

扎着爬起来，拾起倒出来的煤又往上爬。

煤窑是一个人間地獄，又黑又湿，臭得呛人，通风設備一点儿也沒有，人一下去就得张开口大口地喘气，一吸气，蚊子、蒼蠅不是吸到嘴里，就是鑽进鼻孔里。煤窑里什么安全設備也沒有，下一次窑，等于冒一次生命危險。一次我正在小天义煤窑中背煤，忽然轟的一声巨响，窑塌下去，窑里的灯一下子全黑了，只听见一片“救命”的惨叫声。我毛发一根根都竖起来了，扔了筐就跑。要不是我跑得快，只消慢一步就被活埋了。在煤窑里，压死的、淹死的、砸死的、放炮打死的、撞死的……多着呢。窑底下，夏天阴凉得透骨，冬天热得連单衣也穿不住，只好光着屁股干活。出了窑，北风一吹，皮开肉綻。我没有鞋穿，脚上裂了一条条一寸来长的口子，一步一瘸，一步一个血印，长长的梯子上，每一級都留着我的血迹。

我們吃的是阳間的飯，干的是阴間的活。在井下拉煤的馬（有的井較大，馬匹可以出入），只干八小时，还能吃到五斤半黄豆，地下还有馬棚給它們歇乏，有人侍候它們。工人呢？每天吃一斤半豆餅，在那长长的梯子上，上上下下，背十多个小时的煤。在旧社会中，我們工人和别的穷人一样，只不过是能說話的牛馬罢了。

受不了这样沉重的剝削和压迫，我不願意干了。我把头上的灯嘴子摘下来，扎在自己破烂的棉衣里，正要走时，被监工看見，不容分說，拳打脚踢棍子抽，把我打了个半死。我当时咬住牙咽下这口血泪，趁监工沒防备的时候，还是偷偷地跑了。

工厂——法西斯监狱

逃出煤窑后，我又开始流浪。那年头，兵荒马乱，要饭没人给。走投无路，一天，我饿着肚子在石景山附近的北辛安村要饭，碰到一个姓梁的，他是给地主赶车的，看我可怜，对我说：“我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他把我带到石景山一个地主家里，地主见我瘦得皮包骨，榨不出什么油水，不肯要，给了我一个窝头，就这样打发我走了。

我只好继续流浪。成天在石景山一带转来转去，白天到附近村子要点饭充饥，夜晚蹣缩着瘦小的身子，宿在人家的屋檐下。有时在石景山铁厂捡点装洋灰的破纸袋、废钉子，卖给小摊贩杨海，换几个红薯吃。冬天下大雪，我那七孔八洞的破棉衣，抵不住刺骨的北风，浑身直哆嗦，手脚上的皮肤冻裂得像松树皮一样。我把拾来的纸洋灰袋子披在身上，用绳子捆着，对付严寒。肚子越饿，身上冷得越厉害，冬天的夜晚又长，特别难熬。在大雪纷飞的夜晚，我们几个流浪儿一伙儿偎在杨海的白薯炉子旁，烤了这边，转转身又烤那边，烤了前身，后身冷，烤了后身，前身冷。过了几天，杨海不许我们再围着他的白薯炉子取暖，把我们轟走了。无处藏身，我只得鑽进石景山铁厂炼焦的串窑里过夜。

那时候，多少人和我一样，饥寒交迫，饿的饿死，冻的冻死。成批的尸体，扔在野地里喂野狗。野狗吃惯了死人，有时看见奄奄一息的活人，也当作死人，成群地扑上去，抢着把他吃掉。

好不容易挨到了十一岁，我想到工厂去当童工。这是日本法西斯强盗霸占的一家中国工厂。我个子又矮又小，日本鬼子开始雇用华工时，不要小孩和老头，我便想了一个法子：在点名时，鑽在人群里，在脚下垫上三块砖，好几次都混过去了，有一次却被苏瘸子发现了。他是日本法西斯强盗的狗腿子，狐假虎威，作威作福，压迫中国人。他一发现我，立刻把我从人群中揪出来，瞪着两只要吃人的眼睛，说：“你这小鬼，敢在我苏工长面前弄鬼。”啪啪就是两巴掌，临了又用他点名时用的锤子敲了我一顿。苏瘸子点名时总要用锤子在每个工人头上敲一下。

后来，鬼子为了加紧掠夺中国人民，开始大量招收华工，连儿童也不放过了。这样，我又进了工厂，干着成年人干的活。

我在工厂里干洗煤活，不管是六月三伏天，还是数九寒冬，都得在泥水里滚来滚去。日本监工提着一根洋镐柄来回地走，监视着我们。工人要是歇一口气，被他看见了，没有不挨揍的。当时工人中有这样两句话：“洗煤怕瞎子，炼焦怕花子，”（瞎子、花子都是日本监工的外号）正好说明我们的“地位”。

鬼子一方面利用监工监督我们劳动，同时又用拉长劳动时间的办法来剥削工人。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我这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哪里顶得住。一次，我困得支持不住，倒在洗煤的泥水里就睡着了。监工发现后，几棍子抽醒了我。

鬼子对中国工人的安全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他们说：“中

国人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还大大的有的。”一次，我在高大的卷揚机旁調煤。卷揚机的传送带对准煤粉仓的大喇叭口，煤粉像流水般不停地往喇叭口里落下去，等运煤的列車一来，喇叭口下的底板一拉开，煤粉便一下卸入車廂。我們在卷揚机旁工作，脚踏在两块窄窄的跳板上，跳板下就是煤粉仓。我累得实在支持不住了，头一晕，身子一晃，掉进煤粉仓里。上面的煤压下来，把我活活地埋在煤粉仓里。我拚命地掙扎，想往上爬，但几吨重的煤压在我的身上，我动一下，煤粉就压得更紧些。我的鼻孔里、嘴巴里、耳朵里，全塞满了煤。叫又叫不出，呼吸又呼吸不得。只要再憋几分鐘，我就完蛋了。幸亏这时在我側边干活的一个姓梁的老工人看見了，馬上拉开煤粉仓的底板，把我从煤粉中扒了出来。这时我已經昏死过去了。工人們把我抬到水池边，洗清了我口中、鼻孔中的煤粉，經過急救，我才慢慢地苏醒过来。

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一天下午，一个与我同年的孩子，也是由于疲劳过度摔倒在皮带机上，立刻被皮带卷进碎煤机，随后又卷入粉煤机，两部机器一軋，可怜这孩子便压成了血餅，皮带上沾满了他的鮮血，煤粉里掺进了他的骨末。又有一次，一个童工被矿石砸得半死，敌人怕因此引起工人爭取安全的斗争，便假装說送他到医院去急救，可是在半路上，却把他扔进“万人坑”去活埋了。

生产上是如此，生活上就更不用說了。住的是大監獄，吃的是混合面、生毛的窝窝头。吃了这种霉烂食物，很多工人得虎列拉(霍乱)。工人得了这种病，鬼子借口防止传染，把病

人赶进隔离区，也不医治，丢到石灰里活活地噏死，再把尸体扔进“万人坑”，任凭野狗去吃。

在日本鬼子的剝削压迫下，劳动折磨死的、餓死的、烧死的、活埋的……是不計其数的。日本侵略中国史，就是这样一页血迹斑斑的历史，这血和泪写成的历史，就一页页刻在每个中国工人的心里。

尽管日本法西斯强盜的統治十分残酷和野蛮，但我们工人阶级并没有屈服。我们用各种办法同鬼子斗争：暗中破坏机器；制造生产故障；破坏生产成品，等等。最有趣的是磨洋工：大家的眼睛盯着监工，监工过来了，大家吆喝一声，干一下；他一走，我们又坐下来歇着。他走到东边，西边工人坐下来。他走到西边，东边工人坐下来。就这样同他捉迷藏。大家后来总结了一句话：“不打勤的，不打懒的，单打没有眼的。”监工监视着我们，我们也监视着监工。不管小鬼子的鞭子如何厉害，如何凶狠，但是谁的心里都明白，这吃人的魔王是长不了的，“小鬼子别胡闹，鬼子尾巴长不了。”

斗 争

我十三岁那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想这一下中国人该见青天了。谁知去了一只老虎，来了一只狼，蒋介石的統治，代替了日本鬼子的統治，换湯不换药。蒋介石一接收工厂，就解雇了大批的工人，我也离开了工厂。为了生活，我又回到门头沟，重新落到地下监狱去扛煤。明知是个虎口，但我在鬼子皮鞭下混了一段，大风大浪都经过了，我是知道怎么和大伙一

起对付资本家的。

一天，一个青年工人背了一大筐煤，管秤的一称，说是五十五斤，那工人火了，把筐往磅秤上使劲一搁，说：“给我单称！”（平常是连人带煤一起称的），大家都注视着磅上的法码。足足有一百四十一斤！管秤的还想糊弄我们，说：“煤是用公斤计算的，一筐还要扣十五斤水分，只能算五十五斤。”工人心里早已知道资本家的掌秤的在秤上弄鬼，本来藏着满肚子的怒火，这一下火点着了。大家去找资本家讲理，要求赔过去少算的秤，以后不许再有这样的事发生。资本家看见我们人多势大，没有办法，只得答应了这些条件。但是狼心狗肺的资本家明里不扣秤，暗里还是扣，特别是扣我们小孩的秤。可我们也不是好惹的，便想出了一个塞石头的办法：把窑底背上来的煤在半路上倒出筐来，在筐底上塞几块石块，上面盖一层煤，然后背出来过称。夜里，掌秤的看不清，常常给糊弄过去，直到卖煤时，他才发现是一大堆石头，气得他直跺脚，狠狠地揍了工头一顿，要他查是谁干的。但是因为背煤的人多心齐，谁也不说，他查了好久也没查出来。资本家恼羞成怒，又想出一条毒计：尅扣工人的工资。用的办法是不按时发工钱，拖延几天再发下来时，因为伪币贬值很快，工人拿去买东西，只能买到原来的一半。我们工人心眼齐了，每逢资本家不按时发工资时，我们就不给干活。弄得资本家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得乖乖地接受我们的条件，按时发工资。

临解放时，我在大裕沟东天顺窑井背煤。天天谈论着、盼望着解放军来。资本家知道他们的日子不长了，便又扣着工

人的工資不發，想帶着我們的血汗錢，一滾包打起逃跑。我們看穿了這個陰謀，把他抓住，要他賣了家產抵付我們的工資。

三年中，門頭溝六十四個大小窑井，我都跑遍了，什麼罪我也受盡了。三年中，我參加了大大小小的鬥爭，在鬥爭中看到了工人的力量。

我從六歲開始要飯流浪，一直到第二次回到門頭溝背煤，這一段歷史是我的血淚史，也是我和地主、資本家、日本鬼、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史。這一頁血淚史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階級壓迫、階級鬥爭史。

翻身不忘過去苦

苦難的歲月，終於熬到了頭。一九四八年門頭溝解放了，苦難的人民重見天日了。在黨的教育培養下，我一天天成長起來。一九五二年，我入了團。第二年，又入了黨。今天，黨小組還選我當上了小組長。在工作上，我數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我們的黨小組被評為先進的黨小組。

母親也回來了。一九五二年，我娶了媳婦，不久添了孩子，我的家又重建起來了。我過去沒有進過學校門，解放後上了工人夜校，現在已經具有初中文化水平，能看報、學理論。

這一切都是黨和毛主席給予的。沒有黨，就沒有我，我永遠不會忘記黨，永遠不會忘記我過去的血淚史，永遠沿着黨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奮勇前進！

李炳鈞整理

張英偉插圖

街 头

炼钢厂 戴世鸿

一九二七年，我出生在北京一个送奶工人的家庭。七岁开始沿街捡破烂，十岁进日本人办的工厂干活，后来又进一家烂纸厂工作，换来换去，受的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里就讲一段拉车的事吧。

一九四三年，我还不满十六岁，便开始拉洋车。我和母亲商谈这件事的时候，她瞅着我瘦得像只干猴的身体，一言不发，楞了好半天才摸着我的头，心痛地对我说：

“大人坐在车上，你拉着他跑，成吗？”

“成！妈，我能成！”

“你认得道吗？孩子，拉得了吗？……”

她一连问我好些问题，我都一一回答说：“行，”“干得了”……其实我心里也没有个数。

拉洋车首先得有车，租车得找车主。我去找小川锐“三兴车厂”的王掌柜。他是个派头很大的人，车厂里有四十多部新

車和半新的車子。还雇了几个修車工人。他知道我家穷,又看我年紀小,很不願租給我,生怕我摔坏了他的車子,賠不起。在他眼里,我們一家人的性命还不頂他一部旧洋車值錢呢。我母子两人向他苦苦哀求,他才勉强答应,但是要我們照老規矩,找两个“連环保”。起初找了两位穷朋友做保,車主說不行,光有人保还不成,还得看保人有没有点财产。几天过去了,我們还是找不到。后来幸亏好心腸的街坊翟长明和王大全答应作保。王掌柜看到翟长明虽說是个拉車的,但他自己有輛車子,王大全是做小买卖的,又和他相熟,有家有业,这才答应租車給我拉。“保单”上写明,租車人如有变卖、损坏車輛和发生其他意外,担保人願負完全責任。車主收下保单,又和我当面議定合同,規定每天应繳的車租,三天不交,車主即收回車子,車子如有损坏,租車人得按价照賠,等等。随后他发給我一个“号卡”。所謂“号卡”就是一块縫着白字号碼的藍布,这是洋車夫的統一标记,用来防止我們偷跑和作弊的。这样,我好容易当上了洋車工人。

我刚学拉車,認得的路不多,只敢拉短途,在虎坊桥、菜市口、西单一帶,四里半路的范围内跑来跑去。一天掙不到多少錢,每天繳了車租,剩下点錢实在不够糊口。

我换了个車主。这就是大川錠的田玉山掌柜,他家有六十多部車子,大半是旧的。田家靠着这六十多部旧車子收租,生活得非常富裕。田家的老掌柜人老心不老,五十多岁了还經常穿着一身时髦的綢緞大褂,四处游逛。上澡堂、探亲戚、会朋友,一出門便叫伙計給他拉車。每当我们拉車回去的时

候，田玉山便皮笑肉不笑地對我們說：“今天運氣不錯吧，哼，一定不錯！”接着便仔細檢查車子，從頭到尾找不出一點毛病，才收車租。“要是碰上老掌櫃，麻煩事就更多了。有一次，我的車墊上沾了點水，老掌櫃用布擦了又擦，嘀咕了好半天：“墊子濕了，墊子濕了。”他最喜歡數點車子，生怕少了似的。每到傍晚，便嘮嘮叨叨地數起來，有時車子多，停放得又亂，他數來數去數不清，忙得團團轉。洋車是車主的命根，誰觸動了它，他會和誰拚命。

在田掌櫃家當伙計，生活也好不了多少。有一次拉不上客，一連兩天交不起租，我在田玉山面前說了不少好話，才勉強答應我拉第三天。第三天，我心想不吃飯不睡覺也得湊夠車租。但第三天仍然和前兩天一樣。當我空手回車廠時，田掌櫃一句話也不說，仔細地檢查一遍以後，就把車收回去了。我左說右說，他根本不理睬。實在無法，我去找保人，央求了半天，保人又向車主說了很多好話，並作了擔保，車主才讓我繼續拉車。

為了保住這飯碗，逢年過節，少不了還得辦點禮物送給保人。別看這點“小意思”不值幾何，却是我挨幾天的餓才湊起來的。

拉洋車不但受車主的剝削，還要受一些有錢有勢的乘客的欺壓和凌辱。

一天，我蹲在前門火車站廣場上，迎面來了三個“丘八”，腰里扎着大皮帶、帽子上縫着“青天白日”帽徽。其中一個叫我把一大堆行李拉到糧食店街。我拉着車，他們在後面跟着

走。到了指定的地方，卸完行李以后，他們突然說少了什么貴重东西，三个人一口咬定，說我偷了，硬要我交出来。我說：“老总，你們在后面跟着，我在前面拉車，一路上手不离車把，怎么能偷东西呢？”其中一个丘八解下腰上的大皮带，不容我分辯，恶狠狠地往我身上乱抽：“打死你这个小偷，打死你这个小偷！”我被打昏了头，拔腿逃命，另外两个追上我又打。临了，他們認為打够了，便扣下我的車子，把車推到一家客店里。

我看見几个宪兵走过来，就把事情經過告訴他們，原想他們主持公道，不料宪兵們把我帶到柳树井宪兵队里。房子正北面是个审讯室，东边放着老虎凳、木棍、繩子……等等刑具。他們把我領进东边，先打我一頓，然后問我：“你偷了人家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我怎样回答呢？我不承認偷东西，又是一頓毒打。他們看确实問不出什么名堂，才放了我。

最后，通过舅舅托人說情，賠了一笔冤枉錢，才算了事。我去領車子时，还挨了两耳光。这件事虽然隔了二十来年，但是一想起来，我的心头的余恨还没有消呢！

一次，又有一个国民党軍官，早上叫我拉車送他去办事，从东城折到西城，又从南奔到北，整整跑了一天。天黑了，他的事也办完了，連理也不理我，挟起皮包就走。我拉着他，說：“先生，車錢呢？”那軍官什么話也不說，左手抓住我的胸口，右手举起拳头，狠狠地揍我。我滿肚子的委屈，說：“替先生当差，侍候先生，都可以，先生得給我飯吃啊，我还要交車租啊。”他不听这一套，又是一頓毒打，瞪着凶神恶煞的眼睛，問我：

“还要車錢不要！”我哪敢再提車錢，只好空着手回家。

經常欺压洋車夫的，还有拿着木棍在馬路发号施令的警察。日本投降以后不久，有一次我坐在前門馬路上等着接客，一个警察走过来，說我妨碍交通，不問青紅皂白，举起木棍乱敲我的車子，棍子打折了，便用剩下的半截打，我一边用身体掩护車子，請求寬恕，一边握住車把拉起車子就跑，他紧紧地追上来，追了一里多路，逮住了我。他知道我們洋車夫最害怕的是弄坏了車主的車子，便拚命打車，打坏了挡泥板，又把車墊扔到河里，打完車又打人。还命令我以后只准在小胡同里接客人。我忍气吞声把車墊从河里捞上来，拉着打坏了的車子跑回車厂，車主馬上扣了我的車，說：“你什么时候赔了，什么时候再拉。”沒有車子就等于沒有了飯碗，又怎能先赔錢呢？后来經過保人疏通，車主才答应先給車拉，以后每天扣一部分賠償費。这笔錢我赔了很長一段時間才赔完。后来我知道，打我的那个警察长官叫“大馬猴”，是前門大街上的街霸、洋車夫的死对头。

前門火車站是个最熱鬧的地方，来去的旅客多，洋車也多。鐵路局看到有利可图，便在我们这些穷車夫身上打主意，規定凡是进前門火車站拉座的車夫，不管生意怎样，一律先繳一笔稅款，否則給鐵路警察逮住了，就驅逐出站。

車站上还有一大帮騙子，这些地痞流氓和警察勾結在一起，后面又有豪紳撑腰，为非作歹，尽干坏事。他們經常打扮成車夫模样，拉着洋車做样子。一看见外地来的旅客，便蜂拥而上。講价的时候，明明只有十里地，他們說二十里，借此把

車价提高好多倍，欺騙人生地不熟的旅客。價錢講定以後，他們自己不拉，却叫我們去拉，只把一小部分車錢分給我們，大部分車錢都落進了他們的腰包。這樣，他們就壟斷了生意，控制了車价，榨取了我們的血汗。他們有錢有勢，我們敢怒不敢言，只有忍氣吞聲的份兒。

洋車夫的生活最苦，要吃沒吃的，要穿沒穿的。成年累月赤着腳在馬路上跑來跑去，夏天腳板燙起了泡，冬天腿凍得失去了知覺。為了多掙幾個錢，越是大風、大雨、大雪、大太陽，越要拚命多拉。有時，天下大雨，戲院深夜里散了場，顧客多，可是車也多，大伙兒爭着拉座，也顧不得討价了。馃子、豆餅、豆渣是家常便飯，偶爾掙到點玉米面，又沒錢買柴火。最方便的是花生餅，揣在兜里，拉着車，餓了就塞點口里，哄哄肚子。

拉了一天的車，到了下半夜還不敢回家，因為那時國民黨經常抓壯丁，夜里只好睡在馬路上。

在層層的剝削和壓迫下，我的爸爸一病不起，不久，妹妹得了霍亂，媽媽也得了病，先後離開了我們。家里還剩下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我雖然是老大，也無能為力，只好讓他們討飯。

二

拉洋車掙不到錢，我便改拉排子車（板車）。這活兒比拉洋車更累更苦。苦就苦吧，只要能多掙兩個窩窩頭，好歹把弟妹拉扯大，也不枉我父母做了一場人！拉排子車的人被叫做“苦力”。

解放前，在繁华熱鬧的前門旱碼頭上，在西單和其他一些地方，都設有“人市”。我們這些拉排子車的窮人每天天不亮就來到“人市”上等候僱主。有的人已經過了六十歲，仍然和年青人一樣，手里拿着幾片干糧，腰里扎着條繩子，擠在人群中。活少人多，工錢又低，還要經常挨打受氣，但人們顧不得這些，活一來，便像發瘋一樣擁上去。每天能搶到活干的，只是一部分，搶不到活的只有干瞪眼。有一次我病了，蹲在那里七八天沒人僱我，自己又不會搶活干，非常焦急。第九天，我看到一位顧客要找人拉東西，有幾個人已經圍上去，正在討價，我要了一個很低的價錢，那人便與我議定了。這可得罪了專門包攬生意的把頭，把我毒打了一頓。活沒做成，反而挨了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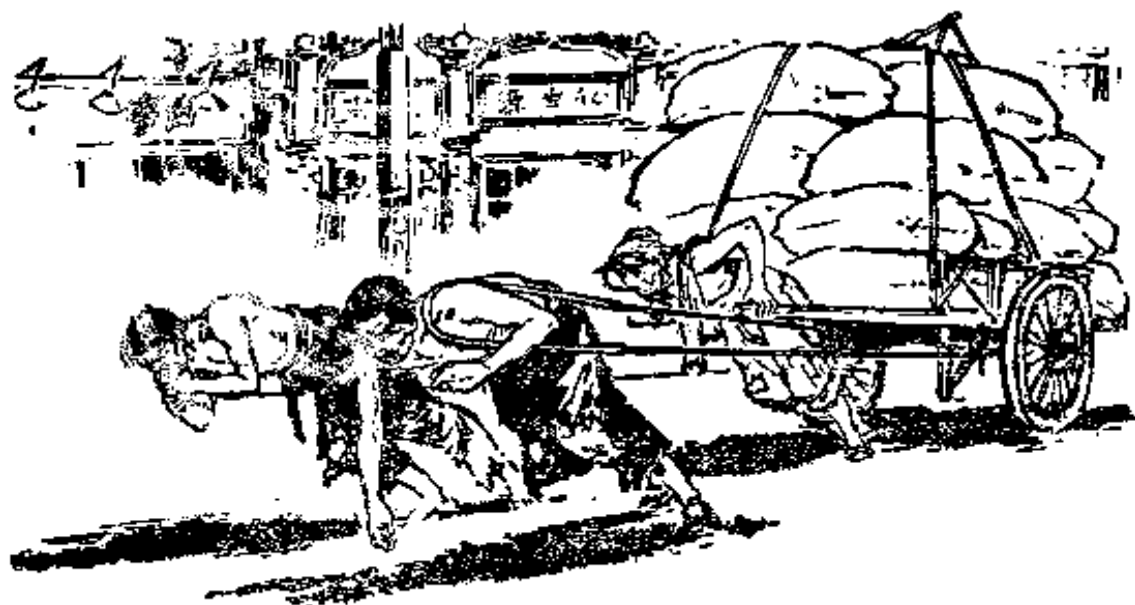
排子車的車主只要有十來部車，便可以靠“苦力”的勞動，过着富裕的生活。有一個姓管的小車主，只有十幾部舊車，經過幾年的“經營”，竟買了一幢二層樓的小洋房，討了個小老婆。那些擁有百多部、幾百部車的大資本家，更不用說了。

在碼頭上，在人市上，還有許多封建把頭。他們自己沒有車，也不干別的營生，更不用勞動。他們一層一層的組織起來，控制了整個碼頭和人市。在前門旱碼頭上，有一個最大的總把頭叫“大老黑”，是個大地痞、大豪紳，私人竟有一支武裝“偵緝隊”，其實就是便衣特務，隨便逮人和審訊，處人于死地。他又與國民黨政府上層有勾搭，橫行霸道，敲詐勒索，誰也不敢惹他，連警察當局也怕他三分。他手下的把頭，全是他的門生弟子。他有各種把頭組織，稱東道、西道、南道、北道……分別控制東路、西路……包攬全部搬運生意，壟斷搬運價格。大

把头把活承包下来，轉給二把头，二把头又把活轉給三把头，层层轉手，直到小把头把活轉給“苦力头”才算轉到尽头。“苦力头”包下活后，再找我們这些苦力一同拉車。“苦力头”虽然自己参加劳动，但也剝削和欺压我們。

一次，因为头天晚上喝得又少又稀，早上又一点东西也沒落肚，飢餓无力，我們三个人拉着一部排子車，車上装着二十多担粮食，拉到西长安街的时候，我的眼睛直冒火星，不能再拉了，然而我想，只剩下一两个小时便拉到了，便咬紧牙关，深深弯着腰，繼續往前走，身上直冒冷汗，走不多远便昏倒了。他們把我救醒以后，我在馬路边休息了一会，一个人歪歪倒倒地空手走回家去，劳动了大半天，“苦力头”一个子儿也沒給我。

我們拉的排子車有的很破烂，加上那时馬路質量低，夏天瀝青被太阳一晒軟綿綿的，車上装的一般是二千多斤的粮食，这样，拉起来就更費劲，一步一点头，上身弯得几乎貼着地面，



繩子始終纏得緊緊的。稍為歇歇，“苦力頭”便又打又罵。一次，我稍為伸了一伸腰，繩子松了一下，“苦力頭”抓住這個“把柄”，回去以後一點工錢也不給我，全扣掉了。

拉排子車一天一般只能拉到一趟，拉到兩趟的時候是很少的，有時一趟也撈不到。拉到一趟時，工錢大概夠我們四兄妹吃一頓。我每天早上背着個小口袋出門，拉上了，便買點粗糧，摻合些弟妹們搞回來的野菜煮稀粥吃；拉不上，或者工錢被扣了，便空着手回家，大家干挨餓。那時物價一天漲好幾次，什麼美金、法幣，全不值錢，拿到一點工錢，也買不到多少糧食。

後來我弟弟到石景山鋼鐵廠當學徒，燙壞了腿，被趕回家來，不久又被國民黨反動派抓去當兵，至今還沒找到他的下落。

那時候我雖然不懂什麼革命道理，但是我心裡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卻是恨之入骨的。我拉着車在馬路上跑，看見工人和學生示威遊行，反對內戰、反對飢餓，很受感動，打心眼里和他們站在一起。

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後，我的悲慘的遭遇結束了。這一年我進石景山鋼鐵廠當了工人，從此過着美好幸福的生活。今天，我是個共產黨員、國家的主人，我要努力工作，不斷以階級苦來磨勵自己的無產階級的革命鬥志，做個徹底的革命者。

黎承枝整理

鍾繼明插圖

苦海深仇

燒結廠 杜守庫

我今年五十八歲，在舊社會熬過了大半生，誰知黃土沒頂又見景。可我怎能忘記那大半輩子的苦呢！

填不飽的黑心狼

我家在河北省武安縣。那是個什麼樣的家呀！父親和哥哥一年到頭給地主扛長工，母親和姐姐，起早貪黑地給地主家做短工。我呢，從小就領着五歲的弟弟出去討飯。八歲那年，弟弟出麻疹死了，我去給人家放牲口，早晚管上兩頓糠菜窩窩頭，動不動還挨打受罵，就這樣對付對付挨過了童年。

十三歲那年，家裡打發我到了門頭溝，和大人一樣下了煤窑。打這起，我就和煤石頭打上了交道。拚死拚活地干，到頭來，還是糊不住一張嘴。那時，門頭溝一帶，盡是小煤窑。頭一回我去的是高地煤窑。那是個小土窑，平地上挖個洞子，黑黝黝的深不見底，站在井口一望，簡直令人魂飛魄散，這是活地獄呀！每次上工都是用繩子吊下去。木橧滾子一圈圈地轉着，我坐在繩套上，緊閉起兩眼，連口大氣都不敢出。隨着繩

套进入地獄，四周黑糊糊的，底下的窑洞矮得直不起腰，背煤得像牲口一般爬着走。沉重的煤筐像座山一样的压在背上；我咬紧牙关，一把泪一把汗地往前爬。累了，想稍为停下来喘口气，工头的棍子就往脑袋上打。

十七岁那年，我来到吴家煤窑。这里是平窑，从窑口到窑底是一条三百多米长的斜坡。坡上铺着木梯，我们弓着身子，背上驮着沉重的煤筐，挪一步，喘一口气，整个巷道里光听得哼哧哼哧的喘气声。碰到陡的地方，不能正面爬，还得欠过身子侧着往上爬。一天爬下来，累得腿肚子直打颤。窑里到处是水，没有钱买胶鞋，只得光着脚干活。两只脚烂得青一块紫一块，皮上结的痂疤都连成了疙瘩。可又向谁去诉说呀！老板的心都是黑的。他给工人规定：每天两个人合伙挖二十五筐煤（每筐五十斤），每人才给二十个铜子。而老板向外卖的煤，一筐就要二十六个铜子。工人一天牛马一样地干十四、五个钟头，给老板挖十二筐半煤，自己拿到的还不到一筐的钱。下矿点的灯，还要自己掏钱买油。每天挣二十个铜子，除了油钱，七折八扣，剩下的买不上二斤棒子面。甭说养家，连自己一张嘴都糊不住。人还不如牲口强！井下的牲口，一天还给喂五六斤黑豆哩！

二十二岁那年夏天，发大水，吴家煤窑被水淹了。我便转到中国官僚资本和英国老板合办的“中英煤矿”。这里，英国人一手遮天。矿上的一切事情，英国人说了算，不但中国的监工听他们指派，开采的线路也全由他们规定。英国人来中国办矿，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打一起初就没安好心。他们想独霸

煤矿的利潤，硬要工人向附近中国人办的小土窑那个方向挖。三挖两挖，小窑底下被掏空了，一下塌了頂，无数的工人便葬身在井下。侥幸沒死的工人，也因为小土窑倒閉，失了业。英国人用这办法不知挤倒了多少小土窑，残害了多少中国工人！在失业的威胁下，工人被迫走进“中英煤矿”。人多活少，英国人便尽力压低工錢。一开初，工人挖一天煤最好的能掙五斤白面。到后来，东西越来越貴，工錢却越来越少。再加上把头、工头从中剝削，工人的灾难也越来越深重。

“中英”矿很大，有十二个柜头，管理着全矿的生产。每个柜头有掌柜的、把头、工头。他們在英国佬面前是奴才，在中国工人面前是凶神，伸着两只黑手，死命地剝削。工人们每天干完活，汗沒擦干，飯也顧不上吃，就得赶紧往柜上跑。在那里等着掌柜的洗了澡、吃完飯，出来发第二天的工牌。柜台前挤挤嚷嚷，誰都想把手伸到前面去。可是掌柜的胸有成竹，他左眼看錢，右眼看情；沒有門子，不送人情礼，挤得再前他也不发給工牌。誰敢爭一句，小心着第二天他再治你！拿到了工牌算是过了一关。第二天上班前两个鐘头，就得往井口跑，在那里等待下井。把門的把头，照样要刮一遍。一不小心，被刷下来，工牌也算白領了。因为工人太多，干上三两天，就要被逼着歇一次，一月能干上十五六天，就算是好运气了。均拉起来，一天还是掙不上三頓飽飯。

就这样，工資还没有保障。名义上一个月发一次，实际上常常是一个半月、两个月才发。为了吃飯，只得向老板、工头借支。借支要加利，借八角当一块錢記賬。到发工資时，連本帶

利扣除后,剩下的沒有几块钱了。工人们一年到头吃不上一頓飽飯,可是干起活来,工头老是死盯着你,不能有一点怠慢。

我那时干推煤的活,一天到晚推着半吨多重的煤車,穿梭一样地跑来跑去。有几次,我又累又餓,渾身打哆嗦,車子怎么也推不动。工头看見了,一边罵,一边用五六斤重的电石灯往我背上捅,捅得我心里火辣辣的难受,咬着牙,把車子推走。

除了中国工头监督工人外,英国人还常常到井下去查看。記得当时有一个經常下井的英国人,能說几句不三不四的中国話,自称姓王。中国监工、工头見了,都毕恭毕敬地称他“王老爷”。工人見了,吐口唾沫,小声喊一句“小王崽”。这家伙,刁得很。不定啥时候,突然出現在井中。看見哪个工人动作慢了点,就又打又罵。他一来,监工、工头越发凶神恶煞地待工人,动不动就把棍子举过头頂,乱打一气。所以,“小王崽”一来,就像降下了恶煞星,工人对他恨得咬牙切齿。

有时,遇上了石头,或者改变了开采綫路,出的煤少了。“小王崽”看見了,不仅要打罵,还要罰这个柜头的錢。掌柜的和工头并不害怕罰錢,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挨了罰,他們就扣压工人的工資。一压就几个月,逼着工人向他們借支。这正是他們发财的好机会!所以,罰一次,英国人吃肥了,掌柜的、工头也沾了一嘴油。只有咱工人,連骨头都被榨干了!这些吃人的家伙,真是填不飽的黑心狼!

死里逃生

至于說到安全保护,那甭提了。在英国人眼里,死个把中

国工人，仿佛死个蚂蚁，哪还顾安全。有一次夜班，工头只管催着工人挖煤，不讓打柱子。第二天，白班的工人刚上班，轟隆一下塌了頂，砸死了十三个工人。有一个工人，脸上的肉全被煤石头刮光了，血和着煤灰把骨头都染黑了，那副惨象真不忍看！工人死了，老板并不放在心上。有家属的，找上了，才給六十块钱埋葬費；沒家属的，刨个坑一埋就完事了。我干了二十年煤矿，这条命能活下来，真算是死里逃生。

有一次，一个姓李的工头值班。这家伙是掌柜的小舅子。一张驴脸堆满了横肉，动不动就打人罵人。看誰不順眼，就想尽方法坑害他。对待工人，他压了又榨，总想多挤点油水。他为了在自己的班上多出煤，向老板討好，經常逼着工人到要倒塌的洞子里挖煤。那次他叫我到一个窑洞挖煤，我一看，洞口沒有柱子，便說：“危險，我不去。”他一听，火了，一跳三尺高，冲我喊：“不去就滾！这儿沒你干的活。”为了保住飯碗，我只得忍住气，硬着头皮进去。挖了約摸半个多鐘头，累得滿头大汗，刚想喘口气，不料洞口的煤呼喇一下子掉下来了。我赶紧跳上一个台阶，总算沒被砸着。窑里的灯全灭了，洞口也被堵上了，里面漆黑一团。我蹲在那里，听着煤块子嘩啦嘩啦地往下掉，心里又惊又急。不一会，空气少了，煤烟子直往鼻孔里鑽，憋得透不过气来。我只觉得眼前直冒火星，头像被人打了一悶棍，昏昏沉沉，眼看就要支持不住了。外边的工友，急着挖洞口。但“李头”說装煤要紧，要工人們先把塌下的煤装车。这样一直过了两三个鐘头，才把我掏出来。当时已經全身都瘫軟了，只剩下两个鼻孔微微地出气。李头“嘿嘿”冷笑了两

声,就走了。

又一次,一个姓杜的工头,叫我去崩煤。我和四个工友走进窑洞,只見里面被挖成了一个大空洞,煤頂子扣在我們头上,随时都有塌下来的危险。我們刚打了一个炮眼,大頂子就开始往下掉煤块了。大伙拔腿往外跑。誰知工头堵在洞外,見我們出来了,就大罵:“誰讓你們出来的?一天四角錢,不是讓你来捉迷藏的。回去干活!”一个工人頂了他一句:“里边都掉煤块了,你讓我們进去送死?”工头一听,二话沒說,抄起鋤头就要打。我赶紧把那个工人推回去。大伙找了些木头,七手八脚頂住煤頂子,又去打炮眼。不一会只听得木头被压得嘎吱嘎吱直响,大頂子眼看要塌了。我一看不好,連忙喊大伙,一个个挨着快点往外跑。自己留在最后面,踉踉跄跄,刚到洞口,煤頂子呼喇一声塌下来,冲起的煤烟把我一下子掀倒地上,摔得鼻子里直冒血。工友們赶紧来扶我。工头鼻子里哼了两声,說:“算你們烧了高香。”大伙气得心里直发炸,恨不得一下宰了这小子。

过后,大伙合計着,要治治这家伙。那时我們的开采面在斜坡頂上,挖下的煤順着鋪了鉄板的斜坡滑下去,在底下装车。杜头监工时,經常坐在鉄板附近的过道里。他选中了这个地方坐下,是因为那儿上可以監視着挖煤的,下可以紧盯着推煤的。一天我們发现监工坐的地方,頂上的煤石头裂开了,大伙一合計,有意不給他打柱子。心想,这会要讓你好看啦!那天,他又神气活現地坐在那里,嘴里不住地嚷:“快干!快干!”过了一会,只听得啵啦一下那块煤石头掉下来了,正砸



在杜头腿上,当时就把小腿骨砸折了。这家伙爹呀娘呀地直喊。大伙说:“真解恨!这帮狗崽子,不知坑害了咱工人多少条命,砸死他们十个也抵不过来。”

为了躲避工头的报复,我和几个工友们换到了另一个柜头。可那里的掌柜、工头,照样拿着工人的命当儿戏。有一次我和工友们去崩煤,刚刚打响第一炮,就起了火;火苗子一窜老远。我连忙喊:“快趴下。”大伙趴在地上,磕磕碰碰地往外爬。身上烤得火烧火燎,嘴里鼻子里干得喘不动气。好歹爬出了洞口,刚往起一站,就昏过去了。后来工友们告诉我,当时大家来扶我,工头不让,赶着大伙去堵洞口。这些家伙的心比煤石头还黑啊!

家破人亡

一九三七年煤窑被淹,我失业了。走投无路,只得回老家武安去,央亲告友,租种了地主六亩地。谁知,那年卢沟桥一声炮响,鬼子入了关,穷人身上又压上了一座山。鬼子占用了我租来的六亩地,夺走了全家的饭碗。那时,我已经结了婚,有了一对双生子。有钱人家添人进口是喜事,穷人家却是包袱,没法子只得卖破烂,吃树皮野菜。两个不到一岁的孩子,饿得连哭的劲儿都没有了,瘦得只剩下几根骨头。没多久,折腾得三根筋吊着个脑袋,一个晚上都死去了。我老婆哭得眼泪都干了,我蹲在一边一个劲地往烟锅里装干树叶子,觉得心里火燎燎地直翻腾。天放亮,我含着眼泪从老婆手里夺过孩子,沟东边埋了一个,沟西边埋了一个。一连多少日子,全家

誰也不說一句話，个个心里压上了块大石头。

穷人路窄，第二年我想，呆在家里反正也是死，不如再出去闖闖，就同着几个穷哥們来到石景山，进了鋼鐵厂。那时，厂子被日本鬼子占着，鬼子恨不得从中国工人身上剝去三层皮。工人們像牛馬一样的干活，一天掙一斤三两混合面。沒有衣裳穿，就把装洋灰的牛皮紙袋，撕成条条，纏在身上。到了冬天，大北风一吹，冻得身上僵成疙瘩。大伙都挤在刚倒掉的爐渣旁边取暖。人多时还不打紧，要是在黑夜里，光杆子一个人在那里睡着了，火紅的爐渣倒下来，一下子就把躺在边上的人燙死了，那情景真惨！

鬼子、汉奸、工头在厂里轉来轉去，中国工人連大气也不敢出。有一次，我在炼焦厂装车。装完一輛，車走了，我坐在鉄鍬把上休息。鬼子看見了，硬說我偷懶。我刚解释了一句，他就大罵：“你的，坏了坏了的！”拿条棍子，劈头盖脸地打下来。还讓我跪在地上，双手举着鉄鍬。他在旁边走来走去，看我稍稍歪了身子，朝我脊梁就是一脚。大皮鞋上滿是釘子，一踢一圈紫疙瘩。过了一会，手累得又麻又瘦，刚要换换手，头上又挨了一棍子。就这样，一直折腾了我一个多鐘头，才放我起来。过路的工友們看了，都恨得朝鬼子瞪眼。我心里更是难过。一个中国人，在自己国家里干活，要受外国人的打罵，这算什么世道！

日子实在难过。两年后，哥哥奔大同下了煤矿，从此再无音信。父亲拖着多病的身子，又到了門头沟下煤窑了。我老婆撒下不滿周岁的小孩，也来厂做工。按說，一家几口人拚死

拚活地干，总能养活家口了吧？还是不行！没办法，母亲就抱着孩子，到外面讨饭。那年头，穷人没力帮，富人黑心肠，有力也不帮。有时跑一天，讨不上几口饭，只好去市场捡些残果烂菜填肚子。吃得我的孩子大吐大泻，没多久眼睁睁地死去了。第二次失去孩子，那个难受劲，就没法说了。

孩子死后，母亲一个人在家里，孤苦伶仃，想儿子，哭孙子，不到一年就把眼睛哭瞎了。有一次我回家去看她。她拉着我的手，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孩子，我实在饿得慌，眼看就不行了，给我买个油饼吃吧。”我听了恨不得马上去买，可是身上分文没有。只好流着眼泪，安慰她说：“我回厂就去领钱，领了钱一定给您买回来。”过了几天，等我再回家时，只见妈靠墙坐着，套着脖子的一条腿带，松松地挂在墙上的大钉子上。可怜的老母亲，不等上吊勒死，就已经饿断了气。母亲像牛马一样劳累了一生，最后连个油饼也没吃上，就这样惨死了。

没有钱买棺材，只好用床上垫的草席子把母亲包起来。那时候，穷人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处。母亲死了，连块埋葬的地皮都没有。托了很多人说情，花了二十多元钱，村长才点头，让我们在村边挖了个坑，埋葬了母亲。

祸不单行。没几天，从门头沟捎来信，说父亲也死去了。可怜的父亲，给地主、老板没白没黑地干了一辈子，腰都累弯了，最后连张破席子没挣上，就那么光着身子，带着一身煤灰入了土！

过了一年，我老婆因劳累过度，得了干血癆。又碰上生产，大人小孩都瘦成一把细骨头。因为先天不足，小孩子只活

了四天。又过了四天，我老婆也觉着不行了。她对我說：“叫你少操点心，我找四个孩子去了。……”話沒說完就断了气。从此，我光杆一身，过着孤零零的无依无靠的日子，滿心的怨恨，对誰去說？

思甜忆苦

解放了！穷人一步登天，成了国家的主人。我只觉得渾身上下，每个骨縫都松爽了，劲儿越使越多。一九五三年，我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常想，当了主人翁，就得有个当家做主的样子。为了工作需要，組織上多次調动我的工作，我都愉快接受，积极地去做好新工作。一九五九年調我到燒結厂看水泵机，我发现有的青年不安心工作，就常对他們說：旧社会穷人想找个事多不容易，現在你們还挑肥拣瘦的，多不應該！一九六一年，因身体不好，又調我管理倉庫。我想，要管就該管得像个样。上班时，我把倉庫收拾得一干二淨，井井有条。下班后，我就滿厂子里轉，把破銅烂鉄、机器零件收集起来，整整齐齐排列在倉庫里。許多东西，后来都被用上了。大伙說我“真勤快，真負責”。我心想，旧社会工人不如一块煤石头，是党和毛主席領着咱工人翻了身。現在，这天下是咱工人的，咱不勤快誰勤快？多干点是咱份內的事。

韓义裕 鍾蔓莉 崔秀明整理

张英伟插图

“万人坑”余生記

炼鋼厂 李护国

一九四三年夏天，整个石景山籠罩着死亡和恐怖。許多工人得了“虎列拉”（霍乱），上吐下泻，不多久就咽了气。光是七月份一个月就死了两千多人。馬路边、河滩上、大树下，到处都能見到病死的工人，有的还没咽气就讓野狗給撕裂了。这已經够人心惶惶了，但是，更可怕的是日本鬼子的所謂“防疫措施”。

鬼子在工厂大門口設立了“关卡”，安置了胶皮水管。上班的工人經過“关卡”的时候，鬼子拿着胶皮管对准工人沒头沒腦地噴射白灰水，又向他們身上揚石灰，美其名叫“消毒”。工人們走到这里得赶紧閉上眼睛嘴巴，憋足气接受这种“消毒”。身子骨差一些的工人被水管猛冲猛噴，脚跟站不稳，鬼子一看到誰搖晃，就說他得了“虎列拉”，馬上拉出去。

在古城荒地上和京沟河滩一带有几个方圓数十丈的大坑，是过去挖沙子留下的。日本鬼子在大坑里鋪了石灰，周围拉上几层鉄蒺藜。日本鬼子又派出“大夫”和警卫队特务，无日无夜地四出巡邏，搜查“霍乱病人”，只要发现拉肚子的工

人，都被認為是得了“虎列拉”，不管斷沒斷氣，一律拉去丟進坑里。大坑里堆滿了工人的屍體，野狗鑽進鑽出，烏鴉成群地在上面盤旋，爭着啄食死人肉。這就是駭人聽聞的石景山“萬人坑”。

那年我十三歲，和哥哥一起在廠里當“募集工”，每天干七八個小時，吃的却是混合面窩窩頭。正在風聲鶴唳，人人自危的時候，我不幸害了兩場大病。先是得了黃疸病，全身上下黃得跟蠟一樣。誰知黃疸病還沒有全好，又得了一種病，渾身燒得沒一點勁兒，上不了工。工頭跑到窩棚里去，不問青紅皂白，硬說我得的是“虎列拉”。哥哥知道事情不妙，明知工頭為人陰險奸詐，不是個好東西，可是想到他要是往上頭一報，鬼子准會把我扔進“萬人坑”，只得忍氣吞聲，硬着頭皮央求他：

“總管，請您幫幫忙，我們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只剩下我們兄弟倆。現在護國病倒了，我把他藏起來，求您別報告上去，救救我們。”

那工頭眼珠子一轉，嘴邊露出一絲奸笑，馬上又板着面孔，狡猾地說：“嗯，得了病就該報告我呀！把他藏起來怎麼行？廠方有規定，不上工就不給吃的，你們總不能白吃羅！……你們兩個人吃飯，一個人上工，我起碼得先扣你三個月工錢。……你還不能歇工。”

哥哥氣得臉色發青，轉頭看了我一眼，又轉過去，無可奈何地對工頭說：

“只要弟弟能活命，扣三個月工錢就……”

“得了，得了，跟我去画个押，打个手印，免得日后口说无凭。”工头提高嗓门，边说边走。

哥哥低着头，有气无力地跟着他走了……

就这样，哥哥在窝棚后面一处不惹人注意的地方，用席圈子圈了一个圈子。每天早晨上班前把我抱到里面，晚上下班回来，又把我抱回窝棚，睡在最里头，还把自己省下的混合面窝窝头一口一口地送到我的嘴里。

不几天，大祸临头了。一天早晨，哥哥刚去上工，我在席圈子里还没有睡着。忽然听到外面“咔嚓咔嚓”的皮靴声，由远而近地直朝我传来，我想坏事了，准是鬼子来了，心怦怦地跳了起来。突然，脚步声在我身边停住了，接着一根什么东西在我身旁捅了一下，席子被掀开了。我立刻看到鬼子面目狰狞地站在我面前，身后还有两个狗腿子。这时，那个扣了我们三个月工钱的工头，也装着不知道这件事似地跑来了。

“虎列拉的有，把他拉出来的！”鬼子一挥棍子对狗腿子下命令。

两个狗腿子一拥而上，连拉带扯把我拖了出去，我全身的骨头像散了一样，痛得要命。

正在这节骨眼上，哥哥气喘吁吁地跑来了，我心里安定了一点。哥哥跑到我身边抱住我，禁不住哭了起来，慌忙向鬼子求情：

“你们不能拉走他，他不拉稀，不是虎列拉，他还活着哩！”

鬼子咬牙切齿地用皮靴朝哥哥身上乱踢，把他踢到沟里去了。哥哥不顾一切地爬起来又扑到我身上，抱住我死也不

放。他轉过头去看到了工头，憤怒地对他說：

“你說話怎么不算数，害了我弟弟……”

工头厚顏无耻地說：

“太君找上来的，我也是刚来。”

他睜着眼睛撒謊，我气极了，他不报告，鬼子哪能找到我这个地方！

鬼子又蛮横地用棍子打哥哥，一边还乱罵着。这时狗腿子找来了一块和洋灰用的木板，气势汹汹地一手把我拉过来就按在上面，又找来了两个工人抬着我，由鬼子和一个狗腿子押着往小东門走去。哥哥从后面追了上来，声嘶力竭地喊着：

“你們不要把他丢进万人坑呀！他不是虎列拉……”

一个“死”字在我脑子里乱轉，可我又多么想活呀！

走到小东門日本大队部的地方，鬼子有事走了。狗腿子繼續押着我們走出了厂門。

哥哥乘鬼子不在，跟出了厂門，苦苦向狗腿子央求：

“求求你，救他一条命吧，我就这一个亲人了……”

狗腿子揮起棍子一面打哥哥，一面說：

“你也想死了，快上工去！”

抬我的两个工人也是和我們一样的受苦人。他們很同情我，半路上替我向狗腿子說情，并且把我放下来，不肯再往前走。狗腿子举起棍子就是几下，他們只得又抬起我，顛顛巍巍地向京沟河滩的“万人坑”走去。走着走着他們想出了一条計策。走到一棵榆树下时，他們又把我放下，气喘吁吁地对狗腿子說：



“你看这小家伙已经死了，我们也实在抬不动了。就丢在这儿算了吧！”

我经过一番折磨，这时已经奄奄一息，看样儿的确同死人差不多了。哥哥听完他们的话，起初楞怔一下，接着他望了望那两个工人，交换了一个眼色，心里一捉摸，明白了他们的用意，就跟着他们说了几句类似的话。狗腿子见我一动不动地躺着，以为我真的死了，急着回去向鬼子交差，悻悻地说：“赶快给我埋了，回去上工！”说完便扬长而去了。

哥哥和那两位工人拔了一些青草盖在我身上，免得我被别人发现。这里离“万人坑”很近，哥哥见我一个人留在这儿，难过极了。泪水流满了他的面颊。我害怕得直想哭，又怕哭出声来让人听见了不好办。我想伸出手来攥住他，叫他不要

走，手却抬不起来，好像不是自己的了。临了，哥哥俯下身，紧紧抱住我，又掏出半个窝窝头，攔在我嘴边，小声对我說：

“护国，能吃就把这半个窝窝头吃了吧。哥哥現在得去上班，下了班再来接你回去。”

自从我生病以来，哥哥总是把他很少的口粮留下一部分給我吃，自己半餓着去做工。我听了他的話，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

哥哥走后，我困乏极了，不久便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我慢慢地醒了过来，只听得烏鴉在头頂上“嘎嘎”地叫着。我想：“我得回去！要不然，在这‘万人坑’旁是会被野狗吃掉的。哥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接我，我还是趁天色亮，赶快回去吧。”

我想坐起来，可是身体像有千斤重，脑袋比一块大石头还沉，怎么掙扎也动不了窝。我靜了靜，使出最大的劲，忍着全身的剧痛，歪歪斜斜地坐了起来。刚一坐定，周围的小树、河沟都围着我打起圈圈来。

突然，我看到身旁有一根杠子，一手抓过来，磨蹭了好久，才拄着杠子站起来。可是一开步又倒下了。我只得順着杠子慢慢往上爬。过了好长时间，費了好大劲，才爬到河岸上。誰知这时候一条大黄狗眼睛閃着貪婪的凶光瞪着我，舌头垂下来有五寸长，正搖頭摆尾地朝我走来。我被这一吓，腿一軟便滾下了河滩。

过了好一会，听听沒有动静，我才又掙扎着往上爬，一路上爬爬歇歇，歇歇爬爬，到天快黑的时候，才爬近了鉄軌。試

着翻过去，先用两手扒着轨道，抬起上身，然后全身滚过去。这样一连过了好几道铁轨。总算爬过了最后一道铁轨。我的劲也使光了，头一晕，身子便不由自主地瘫在枕木旁了。

哥哥下了工赶紧来找我，一看榆树下除了一堆乱草和一块木板外，什么也没有。他以为我被狗吃了，哭哭啼啼往回走，到了枕木边才发现了我，又高兴又难过。他把我摇醒，和我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附近突然响起了一声气笛，我觉得好像大地也在哭，天空也在哭，一切都在哭……

回到窝棚后，藏了不几天，又被工头查出了。他借口说不好向鬼子交账，装腔作势，说什么也不肯留用我，其实是想乘机再来一次勒索。刀把子在人家手里，我们穷人有什么办法呢？只要他不再向鬼子报告，什么条件都只好答应。结果除了原定的扣三个月工钱的条件继续执行之外，现在又加了一条：三年内不付我们的工资，不准转到别处去干活。

这样一来，我侥幸地逃出了有形的“万人坑”，却掉进了更深更大的无形的“万人坑”。

直到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人民解放了中国，才彻底拯救我跳出了“万人坑”。

周征松整理

平原插图

階級仇 民族恨

机械动力厂 赵恆义

一 升大米

我的老家在辽宁省凤城县。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鬼子侵占了东北。从此，东北三省的人民做了亡国奴，生活在鬼子的铁蹄下。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的。

記得有一次过年，我们家揭不开锅盖啦，弟弟、妹妹不懂事，饿得直哭。父亲听着哭声，心像撕碎一般难受，只好出门去想办法借点粮食来。他先前给地主当佃户，因为交不起租，被逼退了田，给地主家扛长活。辛苦了一年，到年三十，全家连顿“团年饭”也吃不上，怎不心酸！

外面北风呼呼叫，大雪纷纷飞。父亲披着满身雪花走回来，寒颤颤地用衣角兜回来一升大米，过了好半天才慢腾腾地向母亲说，“这是隔壁借给咱们的，你去煮了让孩子们吃碗米饭，就算过个年吧。”弟弟、妹妹看到母亲煮饭去了，也就不再哭了。我把山上砍来的柴抱进来，生了堆火。不一会，母亲煮

好了飯，全家人圍着火，每人吃了半碗，這便算是一年一度的“團年飯”。

那時候，偽滿政府有道“命令”，白面和大米只准日本“皇軍”和地主資本家們享受，窮人是不准沾牙的，誰要是私自吃了，讓鬼子、地主發現，給你按上個“經濟犯”的罪名，少說也得受罰。為了這，父親在吃飯的時候，特意关照我們說：“吃了飯可千萬不要讓鬼子、地主知道，要是他們知道了，不光是咱們自家受罪，還得連累你叔伯哥哥。”母親听了這話，嘆口氣說：“這是個什麼鬼世界，叫我們窮人怎麼活命啊！”

吃完飯，我和弟弟在隔壁家玩，誰知弟弟不留神，嘴邊還留點飯粒，讓地主家的狗腿子楊正容看見了。他氣勢汹汹地逼着我問：“你們家的米飯哪兒來的？”

“我們家自己種的一點旱稻。”我對付着說。

“你們家哪有地種旱稻，你胡說八道！”他見我一身破破爛爛，就這樣譏笑我。

我說：“你管不着。”這一下可把他的肺都快氣炸了，他像瘋狗一樣直向我身邊奔來，狠狠地打了我兩個嘴巴，打得我眼冒金花，嘴角流血。他還說要把我父親捆起來送警察署。這時鄉親們都過來向他求情。那雜種狐假虎威，非要去報告鬼子不可，大伙兒好說歹說，讓我父親出十五塊錢（偽幣）給他才了事，這一來我們家又欠下了債，日子更加難過了。

三個“東家”

從十七歲起，我就給地主做長工了。先是在一個外號叫

“白麻子”的地主家，“白麻子”家有錢有勢，除了收地租以外，还在城里开“德順府雜貨店”，他儿子是警察署署长。在他家干活，成天提心吊胆，动不动就得挨打。我受不了，就偷跑到舅舅家去。这时“白麻子”有意找我的岔，竟血口噴人，硬要誣賴我，到警察署告我的状，說我偷了他一百条麻袋。这打哪儿說起呢！反正警察署署长是他的儿子，他們一手遮天，哪容我們穷人說理，二话沒說，就把我押进了監牢。临了，赶走了我家喂的一头猪，还罰我做了两个月的苦工才罢休。我从監牢出来，几次想拿鑊刀去把那个黑心腸的“白麻子”干掉，可父亲不讓我去，說：“孩子！千万不能硬干啊！好汉不吃眼前亏。”

十八岁那年，我到姓史的地主家去作长工。天下烏鴉一般黑，这史家地主待长工也是一样狠。他家有个老婆子，我們得叫她“五奶奶”。这地主婆怕我在地里干活偷懶，常爬上院牆来監視。后来我一看她爬上院牆，索性就背着鋤头迎着她走回来。她問我：“你怎么回来了？”我說：“你上院牆召我回来嘛。”地主婆說：“我哪儿叫你来着？”我理直气壮地說：“那你站在院牆上叫我干什么？”說得她无言可答。从此她自己再也不敢上院牆看了。可是不看又怪不放心，生怕我活儿干得少，便派儿子史小义到地头来監督。一天，我在菜地里松土鋤草，为了把草除淨，我鋤得比較細，自然也就慢一些。这时史小义就嚷道：“你干嗎磨洋工，半天才鋤这么一小片。”我一看到他生气。心想：你小子懂得庄稼活嗎？大热天我給鋤这么細，你倒說我鋤得慢。“你說我該怎么干？”我直起腰跟他頂起来，他看我站起来，怕我打他，就一面罵一面夹着尾巴往回溜。我

看見他這副窘相，真是又好氣又好笑，心想：“你嫌老子干得慢，好吧，咱干一個快的給你瞧瞧。”我拿起鋤頭呼啦呼啦地向前，一會兒就鋤了一大片。等他第二天到地里一看，苗全死了。這一年沒等干到頭，史家就把我打發走了。

離開了史家，我到了孫老大家去作長工。在他家扛活的一共有三個伙計。我是最小的一個。孫老大待我們特別刻薄，鬼心眼又多。吃的是他家的殘菜剩飯，冬天沒有棉褲穿，只好用破麻袋作褲子。炕上冷冰冰的，伙計們用柴燒燒炕，他說用柴太多。更毒辣的是他為了讓伙計早起上山砍柴，每天半夜雞還沒有叫，就悄悄地溜到雞窩邊，拿根棍子去捅雞窩，雞一叫，他就催你上山。那是冬天夜里，霜剛剛下，我們起來凍得全身哆嗦，牙齒直打架。日久天長，伙計們受不了，就合夥說，得想個辦法治治他。

一天深夜，月色朦朧，地上下了一層銀白色的霜。我老早就監視着孫老大。過一會兒，我看那老家伙又悄悄地走近雞窩旁，就低聲對哥兒們說：“大哥，孫老大又去了，咱們動手吧。”哥兒們說：“好。”等到雞剛有動靜，我們就大聲喊：“伙計們，捉賊啊！快起來，有人偷雞！”我們三個拿起事先早已準備好的木棍，一擁而上，一面打一面喊：“捉賊啊！捉賊啊！”打得孫老大連聲哀叫：“我不是賊，我不是賊，我是孫老大……”我們一板正經地說：“放你娘的屁，什麼老大、老二，別騙人。”一邊罵，一邊又是一頓狠打。結果把他的頭皮打破了，讓我們好好地出了口氣。從此，孫老大再也不敢去捅雞窩了。不過，我們怕他報復，這一年又沒干到頭，就各自背着鋪蓋卷兒走了。



两番逃跑

那年月，我們不光是受地主的剝削，还得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日本鬼子在我們家乡統治了十四年，可說是无恶不作。

我二十一岁那年，鬼子要抓我去当“国兵”（伪滿洲国的兵）。我知道了信息就躲开了。逃了和尚逃不了庙，他們把我的父亲抓去，灌辣椒水，压杠子，整得死去活来。老人家已經上了年紀的人，哪能經得起这班禽兽的折磨。我只好去把父亲换回来。可是父亲已經不像人样了，脸肿得老高，头发很长，脚和腿不能动弹。父亲見了我，知道我还得受折磨，泪水直往下流，悲痛失声地說：“好孩子，你就讓我死在这儿好了，我不能眼看你来活活地受折磨。”我的心像刀絞一样，安慰父亲道：“你放心吧，我不要紧的。”父子俩抱着痛哭一場。

在日本鬼子那儿被迫受了三个月的軍訓，日本小队长每天逼着我們上操，做錯了动作他就用棍子打，用脚踢。三个月軍訓之后，检查身体不合格，我这才沒有去当“国兵”。心想，这下大幸，該脱离虎口了吧！可汉奸又不饒你，硬要送我去作“勤劳奉士”（伪滿的一种劳役），母亲凑了二百个鸡蛋，托人說情，这才把我放出来。

我回到家里，眼看父母穷得活不下去，弟弟、妹妹瘦得皮包骨头，心想“得想个活命的办法。”这时候，正好日本鬼子向地主家要劳工，地主出四石谷雇我去。我明知給鬼子去作劳工的是十去九不回，可又不能眼看着全家人餓死，就下狠心去

了。和我同去的还有我的一个叔伯哥哥。

我們被日本鬼子送到煤矿上干活。那些煤洞真像鬼门关。煤洞的洞口很小，我們每天带了鬼火似的矿灯，从洞口爬进去，一镐一镐地挖煤，再一筐一筐的往上背。整天弯背哈腰，累得气都喘不过来。煤洞里没有什么安全设备，每隔丈把远才有一根支柱，说不定什么时候煤洞会塌下来。大伙都提心吊胆，每天早上进去，不知晚上能不能出来。井里通风不好，经常有瓦斯着火。有时鬼子看见着火了，明知里面还有很多工人弟兄没爬出来，就把洞口堵塞，让伙伴们活活烧死在里面。每天吃的是“橡子面”，这种“橡子面”本来是喂猪的，人吃了大便不通，脸和腿都肿得老高。穿的叫“更生布”，是用破布做的，里面掺些麻，穿在身上一点也不暖和。那么冷的天气，我没有铺盖，只有一条人家不要了的破狗皮，夜晚睡觉冻得够呛。在那个阎王殿里干活，动不动就得挨日本鬼子的打，这比给地主扛长活还要苦，我实在受不了，就和我那叔伯哥哥商量怎么办，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逃跑。

那是一个大雾天，我和叔伯哥哥很早就起来；什么也没有带，沿着河岸悄悄向前走，估计在天亮前可以偷越过日本鬼子的岗楼。可老天爷不帮忙，快过岗楼的时候，雾慢慢地散了。日本鬼子发现了我们，马上追了上来，把我们俩抓回岗楼。鬼子先把我那叔伯哥哥紧紧捆住，接着就用棍儿拚命地打，一面打，一面骂，直打得哥哥的大腿肉一块一块地飞起来，血往外溅。眼看着鬼子打哥哥，我心里实在难受，就哭着扑在哥哥身上，想给哥哥抗一抗。鬼子便狠狠地打起我来，把我的腿和脚

也打得稀烂，直到今天我的脚上还留着伤疤。这个伤疤叫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过去的仇恨。

我們挨了打，身子骨儿一直不好，可鬼子还是逼着我們干苦活，加上吃不飽，睡不好，結果我們俩都得了霍乱。鬼子一看到你得了这种病，就把你扔到河里去，許多得病的工人弟兄就这样白白地送了命。我們得病的第二天，日本鬼子就把我們关进了“隔离区”，第三天早上又把我們抬到河边。这时我全身无力，爬不起来，可我的脑袋还是清醒的，我想：“这下可完了，他們要把我們扔到河里去了。”我喊也喊不出来，动也动不了。只見天阴森森的，风刮到身上冷得发抖，心里想起好多事儿。我不明白为啥咱們穷人这般苦？为啥富人这样狠？为啥日本鬼子压迫咱？为啥穷人沒出路？記得小时候，大雪天給地主放牛，我光着脚，冻得受不了，只好把脚伸进新拉的牛粪里暖和暖和。我还想起和地主的斗争，想起从日本人手里逃跑的情景……。这許多往事都涌上我的心头。可就在这个时候，忽听得噗通一声响，鬼子把哥哥扔到河里去了。他們正要扔我的时候，幸好有一个熟人上来給鬼子求情，才救了我的命。

等我病稍好一点，我想怎么着也得逃出虎口，就暗暗琢磨怎样逃跑。这一次我搞得周密，沒有被鬼子发觉，終算是死里逃生了。

盼望解放

东北光复以后，来了国民党，可是換湯不換药，穷人的地

位还是沒变。

一天，我的舅舅来到我家，那时他已参加了八路军。他暗暗地給我講起共产党领导穷人鬧翻身的道理，說：“八路军来了，穷人能分田地、分房子和牲口。到那时候咱們就不会再給地主扛长活了。”他見我沒衣服穿，就把一套旧軍装給了我，还叮囑我說：“別人問你的时候，千万別說你舅舅当了八路军，就說这衣服是买来的。”从此我就天天盼着八路军。

不料我穿着这套旧軍装，讓国民党便衣特务看見了。一天夜晚，几个特务冲进我家，把我吊起来，硬說我是八路军，逼着問我：“八路军在哪儿？”我說：“我不是八路军，也不知道八路军在哪儿。”他們用皮带抽我，凶狠地說：“你不說就打死你。”我說：“你打死我也沒有說的。”他們又把皮带澆上水狠狠地打，我挺起腰，憤怒地望着这些狗东西，心想：“日本鬼子差一点把我送命，本来指望日本投降了，我們穷人能有个出头日，誰知你們这些王八蛋又来欺侮我們。你們打吧，老子总有一天和你們算賬的！”他們整整打了我一夜，直到第二天天明还是逼問不出什么东西，父亲又請人作了十家連保，这才把我放了。从此，我就更加想念八路军，天天盼着快一点获得解放。

奴隶翻身

一九四七年秋，我的家乡解放了。从此我們穷人才真正翻身了。共产党领导我們斗地主，分田地。我参加了农救会，作了民兵队长。为了解放全中国，保卫革命胜利果实，不久我

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一九五〇年，組織上調我到鞍鋼当工人。一九五八年調到石景山鋼鐵公司。給地主放牛时，我得了关节炎，多年沒治好。到北京后，党又給医治好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来了救星共产党啊！

想想过去，比比今天，我就觉得渾身是劲。我要永远記住过去的仇和恨，决不忘本！

雷克嘯 廖世平整理

张英伟插图

苦难重重的二十年

铸造厂 刘景瑞

凡是从旧社会熬过来的穷人，誰沒有一肚子苦水？我在那吃人的旧社会生活了整整二十年，肚里的苦水真是倒不淨。

打記事那时起，就听惯了爹和媽愁吃愁穿的叹息声。十二岁那年，河北井县一带鬧旱灾，我家背上了地主的高利債，欠了地主的租子，到了年关，爹东躲西藏，吓得不敢露面。第二年春天，为了維持一家人的生計，爹到宣化铁矿去当工人，沒干多久，带了一身重病回了家，不久就活活地餓死了。

爹死后，媽东托人西求情，替我在北京找到了一家鋪子当学徒。这是一家小小的首飾樓，老板是个刻薄鬼，老板娘是头母老虎，他們一唱一和，对学徒动手就打，张口就罵，管你受得了受不了，死呀活呀，反正白紙上写黑字，学徒的契約上明明写着，……三年为期，期中倘有疾病伤亡，各凭天命，与本主无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鬼子用武力侵占了北京，小鋪子关了門。我离开北京，到丰台附近去謀生，我在那一带当过馬夫，磨过玻璃，要过飯……，尝够了生活的磨难。

虎口余生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受了騙，被日本人招去当“华工”，来到石景山久保田鑄管厂。原想这一回在厂里干活，每月領工錢，日子总会好过些。誰知这家工厂是座活地獄，工人們的生活比牛馬还不如。当时厂里流传着这么几句话：“說起鑄管厂，两眼泪汪汪，住的席窝房，滿地湿又脏，吃的混合面，絞肚又刮腸。”

每天星星还在眨眼，我就起来上工。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領了工票、被搜过身，才能进厂。有一次，我上了班，肚子痛得像刀絞一样，两手捂着肚子，額上渗出豆粒般的汗珠。工友們为我着急，讓我歇一会，可又怕被工头看到，就把我藏进底芯窑里。

底芯窑是烧烤鑄鉄管用的芯子的地方。不到一間屋子那么大，周围用砖砌成，除了南面有道鉄門，什么出口也沒有。窑門一关，不見一綫光亮。窑門下面有火道，烟和热气便順着火壁送进窑里。

我战战慄慄地走进了底芯窑，忍着痛趴下来。肚子里像翻江倒海一样，痛得我直咬牙；心里怦怦地跳个不停，要是讓日本监工发现了，不打死我也得剝层皮。想到这里，我撑着腰，正要掙扎着爬起来，这时隱隱約約地听到“嘎嘎”的皮鞋声越来越近了，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觉得渾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两眼死瞅着从鉄門透进来的几縷白光。

只見一条黑影閃过，接着一付猙獰的面孔映入我的眼帘。

日本监工来了！他两手叉腰，看了一眼就骂了起来：“磨洋工的干活，死了死了的！……”滚圆的脑袋晃了几晃，只听得哗啦一声，窑门被拉上了。我浑身打了个寒颤，这还了得！要是监工在火道上点起了火，我还能活命吗？我使出吃奶的劲儿，拼命地向门口爬去……

果然，滚滚的浓烟夹带着炙人的热气，从火壁冲进窑来，我被黑烟呛得出不来气，两眼睁不开，急剧的咳嗽和抽搐使我痛得好像五脏六腑都翻腾起来了。豆大的汗珠，成串的眼泪，往下直淌……我拼命地用手抓紧砖缝，一次又一次地爬着，心里想：在窑里是死，出来也是死，反正是死，不如出来和人面兽心的日本鬼子拚个你死我活！

我摸到铁门，用拳头把门敲得山响。“狗杂种！你放老子出来，咱刘景瑞和你拚了。”我厉声地叫骂。

“偷懒的，憋死憋死的！”日本监工也在吼叫。他怕我拉开铁门，死死地揪住，一步也不离开。

突然一片嘈杂的人声从高处传来，声音越来越大了，多么熟悉的声音哟！这不正是我们车间的工人弟兄吗？

“中国人是人不是？”

“揍他狗娘养的！”

“老刘在里面呀！快拉开铁门，救老刘！”

“打呀！打呀！”

“……………”

这一片怒吼声，震撼着浓烟滚滚的底芯窑，偶尔也传来日本监工的几声尖叫。



我掙扎了半天，嗓子也喊啞了，只覺得腦袋像灌滿鉛塊一樣地沉重。濃烟一陣又一陣地熏來，噲得我搭拉着腦袋，昏厥過去了……

等我醒來時，睜眼一看，周圍都是我熟悉的面孔，我的身旁還有剛剛吐出一灘一灘的綠水。弟兄們七嘴八舌地告訴我，剛才監工給吓得狼狽不堪。我笑了，眼角噙着感激的淚花，吃力地說：“謝謝大伙，要是沒有弟兄們，我就沒有命了……”

在日本鬼子的眼里，中國人比牛馬還不如，鬼子們常常說：“三條腿的蛤蟆難找，兩條腿的中國人有的是。”他們認為，在底芯窑里熏死一個中國工人，只是開一個“小小的玩笑”罷了。

死里求生

日本人对工人们的安全压根儿不管，車間里根本談不上什么劳动保护。上吊車，沒有樓梯，必須爬鉄杆；机器旁边的上料孔周围，沒有扶手，也沒有栏杆，一不小心，摔下去，不是跌断胳膊就是摔断腿，甚至弄得粉身碎骨，死于非命；挂芯鉄的吊車在工人的头上运轉，吊車上，根本不按保險鈎，要是芯鉄从吊車上掉下来砸在人身上，不死也会成残废……

我成年累月守在热烘烘的立式鑄管机旁，前身烤得直冒烟；后面，鬼子像狼一般吆喝。只要监工在場，我連喘口气的功夫也沒有，稍一直腰，监工的皮鞭就劈头劈脑地打来。車間里烏烟瘴气，完全沒有通风設備。汗水伴着灰尘、油污，沾滿了全身。一放工，个个像泥菩薩似的，滿脸烏黑。想洗澡，哪里有水。

車間里开吊車的是日本人，他坐在吊車上，儼然像个“天皇”，气势汹汹地監視着工人们干活，嘴里还罵个不停。他們开吊車时，吊儿郎当，芯鉄乱吊乱放，全不管下面的工人。我們恨透了这些坏家伙，真想揍他一頓，可是人家“高高在上”，咱有拳头也打不着呀！大伙一时还没有想到好办法，日本鬼子可先就找到咱們头上来了。

有一次，在浇鑄鉄管时，紅通通的鉄水溅了出来，冷不防溅到我的左腿，我只觉得火辣辣地痛，赶紧向旁边跨了一步，弯下腰一看，只見沾滿油污的褲子已烧了个大窟窿，青烟直冒。我吐了几口吐沫，用手去扑灭火苗。猛地，我听到洋洋得

意的笑声，抬头一看，只見日本鬼子手托腮巴，在吊車上咧嘴大笑，笑得滿嘴金牙閃閃发光。

这不是拿咱們中国工人开玩笑嗎？我賭着气，弯下腰去察看燙伤的地方，心里想：“狗娘养的，总有一天，叫你們知道老子的厉害！”

鬼子只顧狂笑，把吊車控制器的手柄推到上升位置，只听得机器轟轟直响……

忽然，一根芯鉄脫了鈎倒下来，正砸在我的腰上，我哎哟一声就栽倒了，半截身子挂在沒有栏杆的上料孔上，机器还在轟隆轟隆地运转。这一下可把我痛得五脏六腑都好像裂开了，只觉得天旋地轉，馬上就昏厥过去了……

我在一陣呼唤声中清醒过来，两眼直冒金花，眼前黑一陣亮一陣。这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席窩房里了。事后我才知道，原来当时一个工友見我快要从上料孔掉下去，猛地扔掉手里的工具，赶上来一把扯住我的腿，才算挽救了我这条命。大伙七手八脚地把我送回席窩房。我想，燙伤一个工人，日本鬼子咧嘴大笑；这回砸昏了一个工人，那就更讓这些魔鬼笑破肚皮了。

敌人幸灾乐祸的时候，正是我痛苦呻吟的日子！

我躺在破席上，一点动弹不得，渾身上下痛得鑽心。我咬住牙齿，还忍不住要低声呻吟。我觉察到这呻吟声撕裂着工友們的心！工人都是亲兄弟，更何况我們都是在日本帝国主义鉄蹄下的受苦人。沒錢請医生，大伙出主意，终于請来了一位懂得推拿的理发匠。

理发匠来到席棚，大伙围得水泄不通。他看了我的伤势，老是摇头。二百多斤重的芯铁砸在腰上，就是铁人也受不了呀！眼看着他不敢下手捏骨头，我就对他露：“只管治，你放心，咱刘景瑞只有恨，没有泪。”他挽起袖子就担起来，我虽然痛得钻心，还是咬紧牙关，一声也不哼。

幸亏咱们工人的筋骨硬，我才活了下来！工人弟兄们虽然自己吃不饱，每天上班前还省下点窝窝头，放在我头边，下了班又带回点窝窝头给我吃。过了两个多月，我竟然能走动了。

是阶级友爱，把我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

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有时候假惺惺地打着慈善的金字招牌，说什么工人受伤有百分之三十的工伤费，还给治疗。可我受了伤，躺了两个多月，去领工伤费的时候不光是一个子儿没拿到，还挨了两记耳光。这真是“挂羊头，卖狗肉。”劊子手怎么也装不成“佛爷爷”。久保田铸管厂简直是一座人间地狱，工人的生活连牛马也不如啊！

九死一生

在久保田铸管厂，除了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还有像吸血虫一样剥削工人的把头。就说那个姓汪的把头吧，我们受他的气，挨他的打，真是一言难尽！

这个家伙肥头肥脑，长得满脸横肉，整天木棍不离手，稍不称心就打人，活像个喝满鲜血的大臭虫。他喝干了工人的血，还要节外生枝，敲骨吸髓。工人的工钱每月五十三元，可

是每月的伙食費却要五十五元，工錢從來不到工人手里，全塞進了把頭的腰包。把頭們一天三餐，吃的是白面、大米、鮮魚肥肉，老是喝得醉醺醺的。工人們頓頓吃的是長着毛的混合面窩窩頭，半飢半飽，碰巧了，才能喝上一點又苦又澀的蒸鍋水。把頭們還挖空心思地找發財的竅門，姓汪的傢伙在工廠西邊種了二十多亩老玉米，哼，這可不是他小子想吃窩窩頭，是他的算盤打得精。反正有的是工人，地里的活不怕沒人干。每逢星期天，他揚起皮鞭，吆喝幾聲，就把大伙趕到地里干上一天。那年頭，糧食很貴，收來的老玉米賣到市場上，可叫那小子賺夠了錢！

我們早就看透了汪把頭的勾當，大伙只是“騎着驢看唱本——走着瞧”。

一九四二年鬧飢荒，大伙連混合面窩窩頭也吃不上了。工人們用汗水澆出來的玉米棒子，長得個個粒滿籽飽，遠遠望去，一片金黃。咱們辛辛苦苦種出來的糧食，咱們就有份吃，不能睜着兩眼挨餓呀！大伙抽空就去地里掰棒子。這下子，可捅了汪把頭的馬蜂窩，他連忙派警備隊日夜巡查。這些“黑狗子”遇見工人們去掰棒子，把槍栓一拉就喊：“偷棒子的干活！”——真是跟他們的主人日本鬼子一個腔調。

工人連混合面窩窩頭都吃不上，去掰自己辛辛苦苦種出來的棒子，竟算成“偷”，這是什麼世道呀！

“干脆把它掰個乾淨！”

大伙齊了心，不幾天就把二十亩棒子掰得寥寥無幾了，這可氣炸了汪把頭。警備隊逮不住人，挨了幾頓毒罵。總得抓

个人来搪塞呀！

碰巧有一天，我下了工走过玉米地。四周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隐约听到嘈杂的喊叫声，来得近了才知道是几个掰棒子的工人弟兄被警备队逮住了。“黑狗子”们碰见了我，就不分青红皂白，硬把我抓了去。不一会，我就被带到审讯室里。

一股血腥味儿冲入我的鼻子，我往四下一看，只见杠子、绳子等刑具都血迹斑斑地堆在地上，几个凶神般的特务站在桌旁，一个头儿背靠着椅子，一只脚翘在桌上……

“偷玉米吃的还有谁，说！说！”特务厉声嚎叫。

“……”

我站着，一声也不吭。

“啪！啪！”一连打了我几个耳光。鲜血顺着我的嘴角往下淌。

“说！还有谁？”

“不知道！”我倔强地回答。

看样子，狗腿子们气得七窍都要生烟了，特务头子的眼珠像玉米粒一样绽出来，煞是难看，他拍桌大叫：“杠子拿来，给我上刑！”

几个如狼似虎的特务一拥而上，把我两手朝后地捆绑起来，他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我的双膝按在砖块上，碗口粗的杠子压着我的小腿，两个特务踩在两端，只听得“卡卡”作响，我的腿好像裂开了一样……

“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汉奸……”我厉声大骂。杠子压得

我昏了过去。

一桶凉水把我泼醒，紧接着就是一阵拷打。

“說！还有誰偷！”

我紧咬着牙，一句話也不說。不能牽連階級弟兄呀！是弟兄們把我从底芯窑里救出来，讓我死里逃生。鬼子砸折我的腰，又是弟兄們救了我，請理发匠給我担骨，省下自己还飽不了肚子的窝窝头給我吃，讓我恢复健康！

今天就是打死我，也不能說！

这些“野兽”把我折磨了足足四个多小时，逼不出口供，没办法，只得把我放了出来。

“血債要用血来还！”我坚信，这一天总会来到的！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躲在峨嵋山上的蔣介石，看到抗战胜利，連忙下山摘桃子。什么国民党、中央軍、日伪队搖身一变，自称为接收人員。沒想到“想国軍，盼国軍，国軍来了更伤心。”劫收，劫收！工厂被一扫而光。青年工人給拉去当兵，老年工人被撵出工厂。我輾轉流徙，回到家乡，还是替地主扛长活过日子，直到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我又回到工厂。盼望了多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永远听党的話

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我才真正明白：为什么过去我到处奔走，始終找不到一条活路？咱們工人階級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推倒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才能找到光明大道，永远結束挨打受罵的屈辱生活，成为国家的主人。

回忆过去苦,更知今日甜。解放后我和所有的工人一样,彻底翻了身。不愁吃,不愁穿,住的是整齐的工人宿舍。我的三个孩子不再像我小时候那样,过着要饭、流浪的生活,个个都上了学。在车间里干活,领导上对劳动保护抓得比什么都紧,大热天有降温设备,党委的负责同志还亲自给工人送汽水端盐汤。要是擦破点皮,背着红十字药箱的保健医生就给上药。病了,有公费治疗。至于政治上,党还不断地培养我,让我从一个要饭的娃娃教育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党多次送我到市委党校学习,又给了我莫大的荣誉。我曾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优秀师傅。现在我又是车间工长……,想到这些,我浑身是劲!但是,我觉得自己为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离党对我的要求差得很远很远。今后,我一定要永远听党的话,好好工作,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党交给我的生产和工作任务,为祖国的钢铁事业贡献毕生的精力!

郑先进 白彦华 王亚良整理

魏继明插图

苦 与 恨

运输部 李 怀

同志，别看我現在只有三十五岁，在石景山鋼鉄厂干活，可也称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鬼子时代的苦，我受过；国民党反动派时代的苦，也受过，这些，至今談起来，还令人不寒而栗。直到解放，我們工人才熬出了头。

在旧社会，資本家管我們叫“臭做工的”，在他們眼里，我們仅仅是会张口說話的牲口。解放了，工人阶级才揚眉吐气，連吸口气都感到香甜。現在党又提升我为运输部机械动力科科长。党越信任我，我越觉得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够，越发使我回想起往事……

上 工 难

我家在石景山鋼鉄厂附近的北辛安村，家里田无一壟、房无一間，只有一头小毛驴。全家八口人，靠父亲一人赶着毛驴在門头沟馱煤过活。父亲一边赶驴，一边自己也背着煤，起早食黑地干，就这样，掙的錢还不够糊口。

一九三七年，日本鬼子进了村，搶走了我家的毛驴，父亲

只好到城里賃了輛洋車賣苦力，收入少，而且極不穩定，我家的生活就更沒保障。我們幾個大孩子在外面拾糞，掙點錢幫補家用，但仍免不了挨餓。姐姐就是在這樣窮困的日子被折磨死的。

一九四〇年，我十二歲了。母親縫了個小干糧袋，忍痛送我去做工，臨走時，她含着眼淚再三囑咐：“懷兒，你年歲小，干活千萬小心，日本人不是好惹的，進廠後處處要學得靈利點……懷兒，娘實在沒法，只好把你送進……”話沒說完，她抱着我就痛哭起來。

那時我們這個廠被鬼子占領着，廠名也改了，叫什麼“北支那制鐵株式會社”，規模很小，只有一個小高爐生產，工人卻很多，常常肩膀擦着肩膀，一齊涌進廠門。工人中一部分是比較固定的正式工人叫做“內工”（或“里工”），絕大部分是臨時工；叫做“票工”或“外工”。我當時就是“票工”。當“票工”的每天要過“三關”：

第一關是“愛護會”，它是帶有保甲性質的漢奸組織。我每天夜里兩點就得起床，到北辛安村的“愛護會”去排隊，一直等到五點開始發竹牌。能領到竹牌，算是過了第一關，領不到的時候，這一天就沒有工做。人少時，大人小孩都發給竹牌，人多時，就要選擇了，這時“愛護會”的人往往照小孩的屁股一脚，罵道：“去你媽的！”

第二關是“表門”。“表門”就是一個憑牌換“表”的柵欄門。這種“表”的正式名稱叫做“苦力認受領票”（“票工”這個名稱，想來就是從這裡來的），是一張尺把長、三寸來寬的三

联单，沒有它就进不了工厂大門。“票工”們在“爱护会”領得竹牌后，生怕人多票少，領不到票，得赶忙朝“表門”奔去。离发“票”的窗口四、五米远，就得摘下帽子，鞠个九十度的大躬。換“表”时，日本宪兵端着刺刀在人群里走来走去，“維持秩序”。誰要是拥挤了点，日本鬼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揚起皮鞭，照脑袋、屁股使劲乱抽，有时还成心把“票工”的帽子扔到房頂上，不許去撿。

我人小，和大人在一起排队，个儿只到他們的胸部，日本人見了，往往不发票給我，把我从队伍中拉出去，后来我学得机灵了，縮着身体夹在大人之間，他們一挤就把我带进了工厂。

第三关是工头。“票工”領了三联单，还不定有活干，还得往工头那儿跑。工头像个土皇帝，他說要你就要你，說不要就不要，挑挑拣拣，往往只收下那些年輕力壯、和他有点私人关系的人，凑足了数扭头就走。排不上的人，怎么哀求他也不理。干活时，你稍不如工头的意，干完活，他不給你在“票”上盖章，这一天的活算是白干了。我人小、体力不行，和工头又沒交情，常常闖不过这第三关。

从起床到闖完三关，得花六个小时，人已經乏了，再干一整天活，真是累得趴倒了。这且不說，日本监工还常叫临时工“打加点”（加班加点），有时干到深夜二、三点还不放我們回家。一天，工人們和好了洋灰，順着大鉄板向前面的一个大坑推去，我站在坑沿最近的地方工作，因为又困又餓，一不小心便栽到坑里，摔成了个洋灰人儿，还不敢喘气，赶快爬上来，繼續干下去。

在旧社会里，我們工人竟連出卖劳动力的权利都沒有保障！

监工奸

那时候工厂就是奴隶場，工人挨打挨罵，成了家常便飯。連上毛房拉屎也是提心吊胆，远远望見日本监工来了，提起褲子就得干活。

可是鞭子是抽不服工人的心的。监工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們。我們也牢牢地盯着他。他来了，我們干一陣；他一走，我們就磨洋工。一进厂我便学会了几句順口溜：“学会磨洋工，拉屎三点鐘，看看不到点，回去再空空！”

后来，日本人也学“鬼”了，他們想出各种花样監視工人。鉄道系有个名叫本田的日本人，他白天监工时不到現場，而从旁边听工人干活的响声。一次我們在石景山上采石头，修日本鬼子用的警卫室，本田繞着道鑽到草窝里偷听我們用钎子冲石头的声音，听出哪个沒干活，就回去派人把他叫到他的办公室，迎头一頓臭打。

监工奸，工人也不傻。知道他这一手后，我們采取了新的办法对付他；大伙儿坐在山上，拿鉄鍬随便敲打着地上的石头，只听得山上面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本田蹲在远处分不清是什么响声，还以为我們真的在給鬼子干活呢。

作夜工的时候，除了工地上有一点点光，四周漆黑一片，啥也看不見，本田就蹲在黑地里，像只夜猫子似的两眼滴溜溜地監視我們，見我們不好好干活，不是半夜里把大伙叫去挨

揍，就是不讓收工，讓大伙連着干一整夜，第二天早晨再收拾。下雨天，本田打着雨傘，穿着雨衣，監督工人干活。那時工人根本沒有雨衣、膠鞋等勞動保護品，上邊淋着，下邊泡着，身上衣服濕透了，腳上皮肉泡白了，雨下得再大，也不能找個避雨的地方。

本田辦公室是個閻王殿，里面皮鞭、寬皮帶、小榔頭等等打人的工具，樣樣俱全。他打工人的嘴巴用一種所謂“反正擊法”：左邊先打一下，待被打的人臉剛往右一歪，他便乘勢由右向左猛起個反手，這一下自然更狠。最厲害的是“通天炮”，用拳頭打鼻子。他怕工友聯合在一起来反抗他，總是單個地叫去打。你進門，他就把打人的工具一件一件擺上桌子，先給你來個“下馬威”，然後走到跟前、惡狠狠地掄起手劈劈拍拍打得你臉上青一塊、紫一塊，鼻孔、嘴角滿是鮮血。

但是，中國工人的骨頭是鋼鑄鐵打的。

有一次，本田派我們去修“本三”鐵道。為了監視我們，他派來了一個日本人組成的工程小隊與我們一起修，他們修一段，我們修另一段。我們合計，這次再磨洋工，一定會吃虧，干脆不如加快干。打道釘時，他們三人一組用小錘砸，我們兩人一組用大錘捶。我們這一伙年青的楞頭小伙子，別着勁跟他們干，把他們越拉越遠。日本人因為攆不上我們，惱羞成怒，存心找我們的岔兒。一個領頭的日本鬼子來到我們跟前，檢查工程質量，口里不住地罵“八格呀路！”他東看看西摸摸，挑不出一點毛病，更加惱火，竟無緣無故拉住我們的一個工人就是一腳。這可把我們氣炸了，我向他大聲嚷道：“你憑什麼打



人！”几个人一齐扑上去揪住他，踢的踢，打的打，他瞋着一个空子，撒腿就跑；他跑我们就追，追上了又打，他再跑，我们又追，等打够了，才饶了他。这次把日本鬼子打得好痛快啊！

猪 狗 食

日本鬼子根本不拿我们当人看，我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上一个夜班，给一小铁罐“面”，论分量还不到一斤，论质量里面糠麸，豆皮、豆渣、玉米核、高粱秆等全有，外加还有大量半寸来长的头发、牲畜毛，因此我们又叫它“毛毛面”，做饭食时，必须先过一过筛，再用棉花球把里面的毛发粘出来，用这种面蒸出来的窝头毛扎扎的，难于下咽。吃到肚里，不喝水大便不出来，一喝水就拉稀。那时哪儿有什么茶炉房，工人渴了，就啣咚啣咚喝一肚子冷水，所以害“虎列拉”死

掉的人特別多。

就是這樣的豬狗食也常常吃不到口。一天寒風刺骨，我們帶的窩窩頭，凍得滿是冰渣了，幾個童工撿了一些碎木塊、干樹枝，點起一堆火，想把窩窩頭放在邊上烤。沒想到這時來了個日本監工，他看見我們烤的干糧，二話沒說，一脚將窩窩頭全踢到火堆上。踢完了，他還不滾開，又擡起屁股烤火；我們誰也不敢上前去撿出窩窩頭，心里直罵：“媽的！今天算是遇見了混蛋！”等他烤完火走了，窩窩頭也早燒成了灰。

我們工人吃不飽，可是日本強盜，一個個養得紅光滿面，廠里的糧倉里堆滿了大米白面。那全是我們的血汗換來的，我們有權利吃。有時我們心里感到不平，一伙幾個人商量好，就上糧倉去取糧食。每人帶一把小刀和一個小盒，由一人放哨，其余的人鑽進倉去，把糧食口袋割開一個小口，糧食便“嘩嘩”地流進我們的小盒。我們童工人小、眼尖、腿快，干起來很順當。不過，有時也有意外。一天上午，我們又去了。沒注意日本警衛三井從背后繞過來，發現了我們。躲是來不及了，我們拔腿就跑，他見我們跑，便邊追邊罵：“偷糧的有，偷糧的有！八格呀路！”他吃得又肥又胖，穿着一雙大皮靴，哪里追得上我們？追不過，他便盯住我們一個伙伴，記住了他的后身的模樣兒，趕忙回去報告監工本田。中午，本田把我們叫到他的辦公室。我們進門，照例脫帽鞠躬，站在一邊。本田叫三井認哪個孩子“偷”了他的糧食，三井眼珠滿溜溜地把我們每個人从上到下打量一番，又特別仔細地看了看我們的后身，半天也指不出是誰偷了糧食。因為他盯住追的那個伙伴是戴帽子的，現

在，在他面前的，一个个都是秃头，因此三井便認不出了。本田見三井瞪着两个大眼，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点不出一个人来，一生气啪啪就是两嘴巴。三井连忙立正，口中連声喊：“哈噢！哈噢！”这时我們心里甭提多开心，但誰也沒吭声。后来本田放我們出去，我們一迈出門檻，你一言、我一語压低声音說：

“真他媽的解气！”

“秃头保了駕。”

“开心，开心！”

“这真叫狗咬狗，叫咱們看了个不花錢的好熱鬧！”

无 衣 穿

吃的不是飯，穿的更談不上，不外是些紙洋灰袋、破麻包片，夏天只图能围着下身遮遮羞，冬天冷得瑟瑟縮縮，有的工人竟因烤火而被烧死。

一九四〇年修一号魚爐时，地基是用爐渣打的。刚倒下的爐渣还呼呼的冒热气，工人們常常蹲在爐渣上取暖。深秋的一个雨夜，古城村一个姓郝的工友值夜班，冷风鑽进他七洞八孔的破单衣，冷得他渾身发抖，他就撑把破紙伞，縮作一团，蹲在爐渣上。又困又餓，蹲着蹲着便睡着了。一会儿，小机車拉着两鍋爐渣开过来，也不管地基坑底下有人沒人，把烧得滚烫的爐渣照样倒了下來。“呼”的一下，升起一股火苗。那个工友惊醒后，拚命往上爬，身上无力，坡又滑，爬上来，掉下去，掉下去，爬上来……最后总算爬出了这火坑，拚着最后一口气爬到离地基坑七、八十米远的一根电綫杆子前，靠在那儿，再

也不动了。我們几个人赶过去，只見他身上的肉皮一块块一条条搭拉着，嘴里“哎哟，哎哟”直叫嚷。那时我还只有十二岁，看到这种惨景，又害怕，又气愤。日本法西斯强盗真是杀人不眨眼，怎么把人活活烫成这样！

我們几个工人商量一下，大家派我去叫日本人想办法。我拔腿跑到日本人的办公室，值班的三木在睡大觉。我大叫了几声“三木先生！三木先生！”他慢吞吞地坐起来，迷迷糊糊地说：“什么事？”我说明了来意，他才慢条斯理地穿上雨衣，跟着我向出事的地点走去。到了那儿，他随便看了看那工友，呲牙咧嘴地骂道：“八格呀路！混蛋！”扭头就走了。我心中愤愤不平地骂道：“你才八格呀路！没点人心的野兽！”只見他进了表門。半个多小时过去了，还不見他出来。我又追到那里。他正在和另一个日本人嘻嘻哈哈地閑聊天。我連礼也沒給他敬，直冲着他說：“人怎么办？”

他爱理不理地說：“呆会儿再說！”

我站在那儿不肯走。他們聊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他才瞪着两眼向我嚷道：“送医院！小八格呀路的！”我又急忙跑回去。这时那个工友連呻吟的力气都沒有了。我們几个人七手八脚很快把他抬进了医院，还没等到治疗，他就断气了。

无 民 主

日本鬼子投降后，工人們真感到解气！心想这回可翻身了，不当亡国奴了，可是誰想到国民党派出的“先遣軍”原来是一些伪軍，第一道命令就是：“不許动日本人！”

紧接着，美国飞机送来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員。他們一来，尽忙着盜卖机器，工人一批批被解雇，拖欠的工資长期不还，三四年当中，厂里只有一个爐子生产。他們只顧自己发财，哪管工人死活。当时工人們气愤地說：“国民党就是带着耙子来的，淨往自己腰包里搜。”又說：“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国民党来了不久就成立了伪工会，美其名曰工人自己的組織，有时也装着与厂方抗一抗的姿态，其实全是騙人的把戏。只要看看选举一件事，便知道它是什么貨色了。当时工会的理事們名义上是由选举产生的，实际上完全不是这回事，工人哪儿有半点民主权利！伪工会的一帮头儿在选举前威胁工人，指名点姓逼着工人一定要选誰，投票时你不选就不行。因此，工会被“七十二友”把持着，为所欲为。他們私下里和资本家、警察局勾結，監視工人的行动。

国民党为了制造假象，壮大声势，掩盖自己的实質，还用欺騙甚至强迫的手段要工人加入国民党。郭成云是我們的工头，也是“七十二友”之一。一天，他對我們說：“誰入国民党？”我們誰也沒吭声，他得意洋洋地說：“入了国民党，今后讓你吃不了亏！”說罢，他用灣溜溜的三角眼扫了我們一圈，見大家还是不言語，便釘住我問：“李怀！参加国民党嗎？”

我早就恨透了这家伙，便頂了一句：“什么是国民党？我不知道！”

这下他可变了臉色，脖子一歪，眼珠一瞪，气势汹汹地吆喝道：“甭管！你入不入吧？”

我心想：就看看你們這幫家伙，也知道國民黨不是好東西，便干脆回答他：“不入就是不入！”

郭成云見這般情景，眼一眯，嘴一咧，罵道：“小心點，你這般不識抬舉的窮小子！”

我知道他已經安上了壞心眼，以後必定會找我的麻煩，但是我不怕，硬就硬到底，說：“我不入就是不入！你要給我小鞋穿，咱們就算拚到底了。寧願死也不入！”

這種狗腿子，你別看他表面上耀武揚威，不可一世，骨子裡都是個松包蛋，欺軟怕硬。當時，他沒敢把我怎麼樣。

工會的“七十二友”橫行霸道。有一次，我下班回家吃午飯，路上碰上工會理事胡殿宸給他后母送葬。只見帶頭的盒子槍橫跨腰間，後面是一伙“七十二友”的成員，再後面是送葬的親戚、朋友和尼姑、和尚、老道，隊伍拉得很長很長，裡面土的、洋的，吹的打的，哭的叫的全有，真是窮威風。我看着看着，心裡挺生氣，見和尚們沒有吹打，就沖着和尚說了句：“和尚！吹一個讓大伙兒樂一樂！”話音未落，帶頭的那小子趕到我面前，瞪着眼問我：“你干什么！”我說：“叫和尚吹一個！”他右手從腰間拔出手槍，對準我胸口，凶神惡煞似地嚷道：“我看你是個八路軍的探子！”

我頂了他一句：“你別仗勢欺人！”

這時，“七十二友”那群混蛋，把我團團圍住，有個家伙用槍把子在我后腦瓜上“啪！”的敲了一下，嚷道：“帶走！”

他們把我帶到北辛安街上一個小鋪裡面，我氣極了，難道說一句“和尚，吹一個”就犯了王法？！我在那兒呆了好半天，他

們放了我。出來後才知道，是鄉親鄰里們托人情說了好話，才了結了這場事。事後，窮哥弟兄們都為我不平，有的說：“告他去！”有的說：“告他沒用處，他們有錢有勢，吃虧的還是咱這窮光蛋！”我只得把這口悶氣咽到肚裏了。

第二天上工，郭成雲見了我，便問：“你昨天在北辛安街干嗎？”我說：“我就說了一句：‘和尚，吹一個！’也犯法？不是說言論自由嗎？”

他不分青紅皂白地罵道：“媽的！你淨搗亂！”

大 抓 兵

國民黨為了發動內戰，到處抓兵，老百姓一天安定日子也沒過過。做父母的夜里不敢睡覺，聽到狗一叫，就叫醒兒子趕快跑。抓兵的风聲最緊的時候，我們夜里根本不敢回家過夜。家里抓不着人，他們白天在工廠里抽籤。抽上了要么去當兵，要么出糧拿錢找人頂替。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抓兵就更瘋狂了。一天，我偷偷回家去看看，剛進門，保長就叫我去南廟開會。到了那里，一個人都沒有，只聽見他們的隊長在裏面說：“抓來了！”我才恍然大悟，原來開會是名，抓我去當兵是實。接着又抓來了兩個工人。我們被關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夜里，他們又從村里抓來很多農民，準備將我們一起用汽車運走。

這消息馬上在廠里傳開了。陰險的偽工會理事胡殿宸來辦交涉，嚷道：“我的工人不能帶走！”表面上好像是為我們說話，其實不然。原來他按的是一條一箭雙鵰的奸計：一方面，

当时解放战争打得正紧，工厂生产少了工人对他自己不利；另一方面，国民党大势已去，应当为自己留一个退步，假惺惺地为工人说几句话，正好笼络工人，欺骗工人。

他们交涉了半天，后来就把我们临时关进了东屋。东屋里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三八枪的子弹。我心想：可恨这回叫你们抓着了，我卸了你们的弹药，叫你们打仗时个个等死！这时，外边乱哄哄，里边黑洞洞。我们三人抓住这个机会，狠劲咬开一个个子弹头，倒出里面的火药，再照原样将弹头按好。一会儿就倒出了一堆弹药。

约莫九点钟，匪徒开来了一辆卡车。家属群众躺在车前，哭着喊着不让开车，那情景真是绞人心弦。但赤手空拳的百姓又怎能拦住持刀提枪的宪警！终于一伙农民兄弟被运走了，我的表弟就是其中的一个。抓兵队拗不过胡殿宸，就把我们三个工人放了。

迎 八 路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解放军进逼平津，国民党匪徒一片慌乱，坐卧不安。厂里的国民党头头也吓得不敢露面了。我看见郭成云拿着国民党党证，东跑西跑，塞在这犄角不是，塞到那旮旯也不是，活像一只丧家犬，那狼狈样儿，真是又可气又可笑。我心里想：这些鬼崽子的日子长不了啦！你们过去欺压工人的臭威风到哪里去了呢？想着想着我便开心地說：“你塞什么？拿着它‘吃不了亏’！”他斜了斜眼，扭头就溜了。

不久，穿着灰布制服的八路军进厂了。他们给我们讲八

路軍是干什么的，共产党是怎么回事，国民党应当被彻底打倒，又講我們是工人階級，这回該当家作主了，工厂属于咱們了，并号召工人登記复工，还馬上打开倉庫发放小米，首先解决了工人的吃飯問題。

大道理一时我还鬧不清，可总觉得共产党可信可亲，是和穷人一条心的，八路軍是咱穷人的軍隊。他們来了，我們才翻身。很快我什么都敢說了。我揭发了厂里的汉奸、特务、“七十二友”的成員。那时有人跟我說：“老李，有人注意你了。”我說：“注意就注意，难道还怕他們把我扔到北大河去不成？”我知道有坏人搗鬼，但共产党来了，有八路軍撑腰，还怕他什么邪魔怪道。

就这样，劳苦大众見了晴天，我們工人当了国家的主人。解放后不久正赶上一九四九年的“五一”节，工人們組織起来在厂子里游行，“十一”我們又进城参加国庆游行。一九五〇年党又安排我去学习社会发展史，帮助我提高階級觉悟。一九五〇年四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我进一步明白，我的苦，是階級的苦，中国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在旧社会里，和我有共同的經歷。只有在新社会里劳苦大众在政治地位上，在工作条件、物質生活等各方面，才能翻身。今天，我們生活在幸福之中，千万不能忘記过去的痛苦，一定要鼓足干劲、奋发图强，用我們的双手創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何晓夏 蔡振生 何海通整理

刘永凱插图

鋼人鐵馬

運輸部 戴振祥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了。临走的时候，一个鬼子咬牙切齿地說：“十年以后我們再回来！”当时我說：“別作夢了，你們再也回不来了！”怎么样？現在是一九六三年了，十八年过来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但赶走了日本鬼子，还赶走了美国佬，推翻了蔣介石，打倒了地主、資本家。这些吃人肉、喝人血的畜牲，他們永远不可能回来。为什么？人民不准他們回来！就拿我說吧，旧社会那罪我受够了，誰想再叫我回到旧社会，豁出命去我也要跟他拚啊！我講不出太深的理論来，可是在旧社会熬磨了几十年，階級敌人、民族敌人怎么欺压咱穷人，我知道。提起旧社会，我就恨得牙根痒痒。正因为这样，我便从心底里热爱新社会，懂得一心一意跟着咱毛主席和共产党，革命到底。

提起旧社会的生活，那真是黃連树上挂苦胆——全是苦啊！

我的老家就在离石景山不远的三家店。从我記事起，就是租地主的地种，不管有收成沒收成，一亩地每年要繳一担五

斗租子。我从很小就給我爹做帮手，种地，当短工，到石灰窑上背灰石，什么苦活都干过。我們全家人拚死拚活一年干到头，还是要吃沒吃的，要穿沒穿的。我小弟弟，生下来不久，养活不起，給了人家。我家借了地主的錢，一年二担麦利，利滾利，滾来滾去，还也还不清。我十九岁那年，地主逼債活活地逼死了我爹。抛下了一大家人，全靠我来养活。我到煤井去背煤，那真是四块石头夹着块肉，說不上什么时候成了肉餅呢！一到夏天下連阴雨，淹了窑，沒有活干，家里就擱不开鍋了，急得我像热鍋上的螞蟻。那年永定河发大水，滾滾黄浪从上游卷着些木头流下来，我跳到水里去捞木头，換些錢买米下鍋。常言說“水火无情”，要是送了命，撇下老娘幼弟，誰养活呀！

听說石景山制鉄所有活干，我就来到了石景山。托人求情，請車房的工头許朝生吃了酒席，又送給他三十块現大洋，才在一九三九年下半年进車房当了火車司爐。

那时正是日本鬼子統治的年头，制鉄所是活地獄，远远近近誰都知道。可是穷人沒有別的路可走，明知道是老虎洞也得鑽啊！

現在咱們工人穿得整整齐齐、干干淨淨，吃得滿面紅光，走起路来滿精神；学時事，講政治，提建議，鬧革新，真是当家做主了。那时候可不能提了，工人們一个个餓得皮包骨头，面色发青，脸上滓泥老厚，头发老长，活像囚犯；走起路来晃晃悠悠，提着个黑乎乎的小桶，要是再挂上根棍儿，就成了要飯的了。

我一天干十二个鐘头活，才掙两角七分錢，每天只能喝一頓棒子面粥。我們“里工”^①，每人上班提着个小桶，到厂里往火上一座，添滿水，水开了，捏一把棒子面放上，攪和攪和，端下来晾凉了就喝。穿的就更不用提，能遮盖身体就很不错了。暖和天好混，一到冬天可遭了罪了。寒冬腊月，风吹得电线呼呼地叫喚，雪沒到膝盖，車头停在有点水的地方，一会儿就冻住了，再开就得用別的車头撞一下。我穿着一身单衣裳上班，冻得上下牙一个劲地打架。我老婆到厂里当临时工，每天回来冻得嘴唇都紫黑紫黑的。她搬了三个月砖，攢了点錢，給我买了条旧棉褲。看着挺厚实，穿上就是不挡寒。等穿破了一看，里边全是葷子毛。奸商又坑了我，有錢人哪有一个好东西！我們開車的还能假着鍋爐暖和暖和，那些募集工就更可怜，他們都是从外地被騙来的，沒家沒业，肚子里食少，身上衣薄，冻得渾身乱顫。找个地方暖和一下吧，工头看見了，上去就是一頓打。冻死的，餓死的，被鬼子、特务和工头活活打死的，数也数不清。

不久鬼子实行了个毒办法：工人上班干活，才发給点粮食。发的都是霉棒子面、豆餅面、混合面。混合面那东西，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吃了不是拉不出屎来，就是拉稀鬧肚子。我有两个孩子吃了混合面拉肚子，眼看着一天天瘦下去，沒有錢請大夫看，連病带餓，沒过五天就死了。他們是同一天死的。当父母的，眼看着孩子活活地病死了，真比撕扯心肝肺还疼

^① 正式工人。

啊。我們夫婦倆面對面哭了一夜。第二天我開車時，手把着風閘，瞪着眼看着旗工，可是他給了紅旗我都没看見，結果撞了車，挨了一頓打。我想孩子都想呆了。

沒過幾天，我也鬧肚子了。這可把我吓坏了。因為鬼子一見工人拉稀就說這是“虎列拉”，生怕傳染了他們，就把病人“隔離”、“消毒”。過去我開車路過隔離的大窩棚，從車上居高臨下看了看，嚯！那裡面許多工人，下半截身子用石灰埋着，燒也燒死了。我想，進了隔離區，就等於向閻王殿報到了，趕緊溜吧。常言說，好漢子架不住三泡稀。我拉得頭暈眼花，腿上沒勁，一路上繞小路走僻徑，躲躲藏藏，走走爬爬，加上边走边拉，從石景山到我老家十二里地，整整走了一天一夜。那裡也是見到拉肚子的就抓。我又趕緊躲到山里，在草帽坡的一個看青的棚子裡住了三個多月。我媽給我送飯，領大夫來看病，都得先圍着山繞來繞去，瞅四下沒人才敢走進棚子。鬼子的“隔離”比病本身還要人的命啊！

在我躲起來的第七天，我老婆來看我，一見面她就哭。我說：“別哭，你快說說，咱那小孩怎麼樣了？就剩這麼一個了，可得好好養着他，你上這裡來，把他交給誰看着了？”

她一聽，哭得更凶了，抽抽咽咽地說：“交給誰了？交給閻王老爺了。你沒上班，家裡沒吃的，他就……”

這幾句話真剜我的心啊！我責罵自己，怪自己沒有本事，養不起家；爹被逼死了，弟弟給了人家，三個孩子，連病帶餓，一個跟着一個死了。我想來想去，又覺得不能怪自己，我從小就干活，什麼累沒受過？跑折了腿，累彎了腰，可是種地、扛

活，肥了財主；背煤、燒灰，壯了老板；燒火、開車，富了鬼子。自己只落得家破人亡。這是什麼世道啊？哪輩子能換個好年頭啊？

鬼子的心真毒。不上班，不給糧；上班，有時也不給糧。有次一連三個月一粒糧食也不發，可把人們餓壞了。一開頭東挪西借混幾天，賣點當點也混幾天，賒點欠點再混幾天。可是日子一長，挪借無門，典賣無物，賒欠無保。最後家里只剩下二斤來黑面。我真想好好吃一頓，不然真干不動活了。可是一看老婆餓得那樣，我又勒了勒腰帶，把面給她留下，自己想到車房去找點東西吃。到了車房，我們幾個工人都弄不到吃的，就往地下一躺，不干活了。工頭許朝生急了，出去轉了一趟，弄來六張黑面餅，說是他賒來的，叫大家吃了干活。我們邊吃邊說：“吃孫喝孫不謝孫，以後就這麼搞，不給吃的不干。”心里还挺高興。

我回到家里，老婆問我：“給你帶去的餅吃着了嗎？”

“誰帶的？”

“你們許頭。他說你叫我做點飯給帶去，我知道你餓壞了，把剩下的黑面全和上了，烙了六張餅……”

“他媽的，叫他騙了！這小子什麼缺德事都干，早晚不得好死。”我往炕上一躺，不上班了。許朝生來叫了好幾次，都叫我把他罵回去了。半夜三更，鬼子親自來硬逼着到車房去。我們六個工人，都餓得夠受的，心里想：“餓死也是死，我不干活，你打死也是死，反正一個樣。”我們往車房里一躺，來叫，不答理，來打，不動彈。鬼子沒辦法，從日本食堂弄來了些飯團，

我們吃了，才去開車。

第二天我們下班，鬼子不讓，叫等接班的來了再走。哪里還有接班的？別人都餓跑了，就剩我們六個人，剛够開那三個破車頭。我們走了，現我的工人不會開車；從鐵路上調來的司機，一看道岔子這麼複雜，也不敢開。廠子就出不了鐵了。因此，鬼子高低不放我們走。

我們說：“沒飯吃，干不了。”

鬼子拍着胸脯說：“飯團大大的給，米西的隨便。”

“我們吃了，家里老婆孩子還沒有吃的。”

“嘿嘿 各位放心，我早叫人送糧食去了，”許朝生偷偷看了看鬼子的臉色，皮笑肉不笑地搭腔說。

我們還想說什麼，鬼子臉一沉，說：“統統的留住！好好的，大大的有賞；跑的干活，嘶拉嘶拉的有！”

周圍十幾個鬼子看守着我們，動也動不了。一連頂了七天七夜。這七晝夜，真難熬啊！白天黑夜干活，兩小時倒一次鍋，哪得睡個整覺。實在餓急了，鬼子才給點吃的，將就湊和着餓不死。

七天以後我回到家，進門一看，老婆頭朝里躺在炕上。問她，不言語。仔細一瞧，她眼皮一眨一眨，扑簌扑簌掉眼淚；嘴張了張，說不出話來。我一看不好，忙去喊房東老大媽。大媽過來一看，說：“這是餓壞了。怪不得她好幾天沒出屋呢，‘陰七陽八’，再過一天就完了，”說着，她去端了碗熱米湯來，灌下去，過了半天才漸漸醒過來。一問，什麼糧食也沒送來，她餓了七天。氣得我眼都紅了，什麼也不管了，跑到車房找工頭

鬧騰。这次坑得人太苦，不拿粮食来，死也不干活。鬼子这下子害了怕，赶紧给每人发了十五斤棒子面。

鬼子不光逼咱干活，还随便打人。看着谁不顺眼，上去就是几镐把。动不动还往警备队送。到了那里，抽鞭子，打板子，灌辣椒水，压杠子，不死也得掉层皮。有一次我们移车，撞了一节放错地方的车皮，鬼子把我们司机、司炉、旗工、钩工、扳道工都叫去，五个人排成一横排。他卷起袖子，恶狠狠地骂：“八格牙路！什么的干活？”抡起右臂，挨个打嘴巴，打到头，又抡起左臂挨个打回来。谁要是躲闪没打上，再从头打起。直打得我们血顺着嘴角往外淌，腮帮子肿得像发面馒头，眼里冒金星。直到现在，我这牙一上火就疼。我可忘不了日本鬼子的这笔仇恨。

日本鬼子欺压咱穷人，有钱人也欺压咱穷人，咱穷人该当几个死呀？泥人还有个土性子，人还能老老实实等死？起先，我见了他们就怕，后来叫他们逼急了，心里想，老老实实的也少挨不了治，挨饿受冻也是死，挨打受累也是死，和他们斗，大不了是个死，还有什么可怕的！所以我就想办法和他们斗。上班时间得空就睡觉，车皮到处乱甩，开起车来磨磨蹭蹭。有一次我从大东门往这里开车，五公里走了半天，比人走还慢呢！撞了车本来是要挨揍的，可是后来我们摸出门道来了：要是看着躲不开，马上就要撞上了，便索性加大油门，狠劲撞一下，使车损坏得很厉害，一修就得半个月。工头光顾着急，当场顾不上打人。以后他要打，我们就拿不干了吓唬他，他找不着人开车，就不打了。抓住“鬼子离不开我们”这条小辫子，我

們見空子就鑽，治得鬼子无可奈何。

我还打过一个日本鬼子。

倒鍋的現場上有个日本工头，脑袋长得挺大，我們叫他“大头”，这小子真是蝎子的尾巴——毒啊！他看着咱中国工人总不順眼，揚手就打，抬脚就踢，总是拣致命的地方打；不是朝下体一脚，就是照鼻梁一拳，还說：“打死一个少一个敌人。”有一次他見了我，又要下手，我左臂一挡，掄起右臂，給了他个大嘴巴，轉身就跑了。我跑上山躲着，沒有人開車，出鉄倒不了鍋，鬼子着急了，派小仆役叫了我好几趟，保証不打我，我才回来。鬼子叫我去倒鍋，等我倒完鍋开着車回来，老远看見“大头”拿着鎊把来了。他从左边来，我从右边跳下車，他繞过来就追，追着追着，撒手把鎊把扔过来，我一躲，当的一声打到車輪上了。他冲到跟前，来了个黑虎掏心，当胸一拳，我連忙一閃，趁势拽他的胳膊，順手牵羊，摔了他个狗吃屎。我騎上他，心里想：“撕了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一不作二不休，掄起拳头，拣着肉厚的地方，着着实实打了一頓，打得“大头”像杀猪一样叫喚，把地啃了个坑。工友們看着心里实在痛快，捂着嘴偷偷地笑。打完了，我就到車房日本工头那里去，他爬起来追到屋里，我朝他一瞪眼：“你敢，再过来試試！”他吓得一倒退。我对工头說：“我不干了，他見了我就打，你看他总沒个完。”工头怕我走了沒人開車，他自己为难，就劝我，說什么我也不听，非走不可。工头最后說：“戴，他的不敢打你，再打，太君的說話。”从那以后，“大头”見了我就說：“你的，朋友的一样，大大的好！”我心里說：“你別来这一套，我提防着你呢！”后

来又有一个司机打了他，厂子里的工友都知道“大头”专怕开车的。

国际公司的工头崔凤翔，也叫我教训了两次。这小子长得尖嘴猴腮，一坐下就打盹，外号叫“困崔”。你看他表面上在打盹，实际上不知想什么坏主意呢！他和我是街坊，成天和我称兄道弟，闹得挺亲热，背后尽给我小鞋穿。有一次我当班，他到车房对我说：“老戴兄弟，有几辆车离货位远，你去给顶顶车，穷哥们多卸几个车，多挣几个窝窝头钱。”我二话没说，开着车给顶了。等开支的时候，他扣了工人每人五角钱，说是给开车的。后来我知道了，气得肺都要炸了！一人五角，五百多人，这笔钱不少啊，他真是捞钱没有够。我找到他问：“你什么时候给过我钱？”

“兄弟，这话从哪里说起呢？”

“别装胡涂了，你为什么扣大伙的钱，还说是给了开车的？”

“这……这……”他张口结舌说不出来，啪！我一巴掌搥了他个满脸花。

“你赶紧把钱退回去，要不咱俩没完。”

他捂着嘴连忙说：“我退，这就退！”

有些日子，实在没有吃的。我白天开车，晚上到国际公司去卸车，一夜两个人卸四十吨焦炭，挣二斤四两棒子面。有次我去领粮，“困崔”说：“这次给你点好粮食吃，乔面。”明知道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肠，可也猜不透他搞的是个什么鬼，我一边走，一边想。迎面碰到一个装卸工人，他说：“戴大哥，

这次发的乔面吃了就拉稀，你也别做去了，尝尝我这个吧。”我吃了半块乔面卷子，第二天果然闹肚子。我闖到国际公司磨房里一看，那里放着八麻袋喇叭花籽，正往粮食里掺呢。我问磨倌：“这是誰的主意？”磨倌說：“还有誰？崔头呗。”

我把牙咬得格崩格崩响：“好啊，姓崔的，你的心真狠啊！喇叭花籽是泻药，吃了准拉稀，鬼子知道又說是‘虎列拉’，拖去埋在石灰里。为了几个臭錢，你要坑害多少人啊？”我回到家，拿着发給我的乔面，站在天井里喊道：“崔头，你出来一下。”

“怎么了，兄弟，今天怎么叫‘头’了？”

我托着乔面質問他：“这是什么粮食？”

“好乔面啊，老街旧邻的了，我能給你亏吃嗎？”

“呸！”我举起乔面往他脸上一摔，左右开弓打了他两嘴巴，指着他鼻子罵：“你黑了心了，往乔麦里掺喇叭花籽，你們家洋面垛起来頂到房頂，全是这么賺的呀？”

“兄弟，你別喊了，我給你換点白面，別发这么大的火，乡里乡亲的，有事好商量。”

“你休想收买我，快叫磨倌別掺了，以后再掺，我查出来，告訴装卸的哥們，你看大伙不敢用鉄鍬拍扁了你！”

第二天他老婆趁我沒在家，送来了半袋白面。我对老婆說：“吃了他的嘴軟，拿了他的手短，給他送回去！”后来他又托人說在天福樓請我，我沒去，咱們穷人可不能跟他們坐在一条板凳上。

工人們牛馬一般干活，掙的不够吃，逼得沒法，就拿厂里

的东西出去变卖,我也拿。资本家说东西是他们的,胡说!究竟是誰的?咱工人大伙的!资本家手不抬足不迈,連吃的穿的还是工人劳动給創造的呢!

鬼子管得真严,出厂門口要搜身。鑽鉄絲网,常常有人被电死。特务們滿厂轉,抓住拿东西的就打个半死,要是被送到“取締系”去,那就有死无生了。还有些特务化了装,在街上收破烂,查訪“偷”东西的工人。

有一次我去挑水,看到一个募集工正在卖釘子。我一看那个收釘子的人,吓了一跳:那是个特务!虽然脸上抹了点灰,身上穿件破衣裳,也瞞不过我的眼睛。眼看那个工人要倒霉了,我便湊了上去。特务称完釘子——一共是五斤四两,往腰里一摸,掏出手枪来:“走,到取締系去!”那工人吓得直哆嗦。

我近前說:“算了吧,都是中国人,可別胳膊肘往外撇呀,遮盖遮盖就过去了。”又对那工人說:“你还不快跑!”

“敢跑!跑,我拿枪敲了他!”

我把身子往特务身前一橫,用胳膊肘一頂那工人,他撒腿就跑。特务要开枪,我說:“算了吧,何必这么認真,就算他白給你拿出来了。”

“这还得上繳呢。”

“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們那一套?頂多上繳四两,那五斤你白撿,还不合算!”

这时人越围越多,我特意提高了嗓音說:“那小子倒霉,上了你的当,要是我,才不卖給你呢,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

特务怕当着这么些人揭他的底，便說：“少說一句吧，看你的面子，饒了他。”說完就匆匆忙忙走了。

特务們把我們車房里的人叫做“飞賊”，因為我們可以开着車把东西帶出去。他們特意在西直門車站安插下人，我們在那儿一下車就要受检查。可是，你的招高，我的招更高。我拿了东西用草包好，藏在車上帶出去，半路上往草地里一扔，歇班的时候背上筐去拾草，再把东西移到个僻靜地方埋上。什么时候沒錢了，就挖出来卖掉；有时哪个工友沒錢了，我也告訴他去挖了卖錢。穷帮穷嘛，穷哥們才是一条船上的人。

我这“飞賊”不光往外运东西，还运过一次人呢。

厂子里有个叫任鎮荣的工人，在五里屯看到汽車撞了一头毛驴和一个小姑娘，“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把押車的狗特务打了两拳，打掉他四个門牙。鬼子派人到家里抄他，沒找着，只翻出了相片，于是在厂子四門挂上像片，悬赏捉拿他。工人們知道老任教訓了狗特务，給咱工人出了气，心里真痛快，听說鬼子要捉拿他，又为他捏了把汗；要是鬼子捉住他，那是准死无疑了。一天，两天，三天，风声越来越紧，我們的心也越悬越高。第三天夜里我值夜班，刚要上車，驀地站出一个人来，說：“戴师傅，救我出厂吧，我是任鎮荣。”

“啊，老任，可把我們急坏了。这几天你在哪里藏着呀？”

“到处乱鑽，再不出厂恐怕危險了。”

“怎么出去呢？这两天車出厂也要查。”

我正着急，忽然看見司爐来了。有了，我叫司爐把油衣服脫下来，回去睡覺去。

我赶紧把老任打扮了一番，又教他怎么添煤，訓練了半天，觉得可以了，便开动了机車。到厂門，車刚一停，立刻跳上来两个特务，端着枪，拿着像片。瞪着眼問：“車上几个人？”

“两个，我和烧火的。”

“两个？不能吧？”

“不信你就搜。”

特务拿着像片，对了我，又去对老任。他們左看右看，端詳了半天。我这顆心快打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临了，一个特务說：“他媽的，一个也不是。”我这才放了放心，往外一看，好几支手电筒东照西照，还有人在煤車上用刺刀到处乱戳。最后，特务說：“滾吧。”我拉响汽笛，慢慢地把車开出厂子，开大汽門，火車轟轟隆隆飞跑起来。老任說：“他們真是笨蛋，沒認出来。”

我說：“你看，餓了几天，脸瘦了，眼大了，胡子长了，又穿上这油包衣服，抹了一脸黑油烟子，哪能認出来！”說着說着，車开到了永定河边。我减低了車速。这时天漆黑漆黑的，四周很靜，只听到嘩嘩的流水声。我說：“老任啊，下了車，趟过永定河，就是八路的地面了，鬼子是不敢到那边去的。”

“多亏了你，戴师傅。”

“提这个干什么，都是穷哥們。到了安全的地方，想法捎个信回来。”

“我都記住了。”

他刚要下車，我又叫住他：“老任，把这个窝头带上，吃飽了，好跑路。路上小心啊。”我觉得一滴热乎乎的东西掉在手

上,这时倒不愿意离开他了。我真糊涂,这是什么时候啊!我猛地一放蒸汽,车外蒙起了一层烟幕。

“快走!”

老任嗖地跳下火车,消失在黑夜中。我的心这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在回厂的路上,我的心像要飞似的那么美,听着火车的隆隆声像是战鼓,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伸头望望外边,东方露出了一条鱼肚白,眼看天就要亮了。



翟网绪整理

张英伟插图

我家三兄弟

炼铁厂 程德贵

我們一家和鋼鐵生产算是結了緣啦！兄弟三个都在炼鉄厂三高爐工作。我在热风爐，是七級工；三弟德惠在卷揚室；四弟德水在地沟，两个都是五級工。

三弟和四弟工作得很好。四弟是厂里的先进生产者，出席过北京市治安保卫先进工作者會議。我呐，虽然在厂里被評为十年安全生产标兵，还出席了全国和北京市的劳动模范大会，但我总觉得受之有愧，于心不安。

我們兄弟三个是怎样来到这同一个工厂的呢？是什么力量推动我們在工作上做出一点小小的成績呢？这我得从头說起……

故事的开头

我們的父亲程克明是在长辛店机車車輛厂干白鉄活的工人，老人家是个烈性子的人，遇到看不順眼的事，他总是挺身而出，主持公道。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长辛店工人举行大罢工，他也参加了斗争的行列。他辛苦了半輩子才勉强成了家，

生下四个孩子，一家六口全靠他一人作工养活。长期的劳累和有一顿无一顿的生活，拖垮了他的身体，一九三〇年，他五十一岁，得了重病，一口气上不来，撇下我们母子五人死去了。

父亲去世那年，我们弟兄几个都很小，大哥德魁才十二岁，四弟德水还不满周岁。家里除了几间破土房，一无所有。母亲受到这突然的打击，失去了维持全家生活的支柱，哭得死去活来。我们也跟着她哭。邻居看见了都替我们担心：“这一家以后怎么过下去啊！”一些大娘嫂子不由地洒下了同情的眼泪。有些好心人给母亲出了个主意，劝她带着孩子去找厂长“瞎老巨”，请求他收大哥进厂作工，好歹混碗饭吃。母亲三番五次带领我们到厂里去找厂长，说尽了好话，“瞎老巨”厂长一点也不动心，总是眯着双眼，昂着头说：“工厂出钱雇工，哪管你死不死人！我们要的是能干活的人，这么点大的孩子，瘦骨棱棱，顶什么用！”母亲再说，“瞎老巨”便不耐烦地吆喝道：“像你这样的人还多着呢！工厂哪里管得了那样多。趁早滚吧，省得我揍你！”母亲含着眼泪，带着我们四兄弟回到家中。

为了养活全家五口人，母亲无日无夜地拚命做针线活，眼也熬坏了。十二岁的大哥为了帮助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去扒火车拣煤核。大哥十四五岁的时候被日本鬼子抓劳工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从此，我们家就只剩下三兄弟了。

实在拉扯不下去了。为了不让孩子饿死，母亲心一横，决定把最小的四弟送给别人。他那时才三岁，看见来领他的人，紧紧抱着妈妈不放，哇哇直哭，哥哥们也站在旁边啼哭，不让妈妈把弟弟送给别人。母亲紧紧抱住四弟，眼里含着泪花

說：“有嘴的少養，有根的多栽，不是娘不心疼你，你離開娘总比在娘眼前餓死強。”大家哭成一團。最後，母親咬緊牙關，扒開四弟的手，把他交給了來帶他的人。四弟哭得更厲害，一聲聲刺着娘的心。

三年後，我和三弟德惠先後被送到城裏去當學徒。

我的遭遇

我進北京金魚池大街一家做茶葉盒的店鋪當學徒時，才十二歲多。在舊社會裏，做學徒等於當奴隸，做飯、掃地、刷鍋、挑水、抱孩子、洗尿布，給師兄拾掇床鋪，伺候師傅睡覺……什麼都得干，一不如意就要挨掌櫃的打。

有一次，我焊茶葉盒的底，焊得稍為有一點不正，掌櫃在後面看見了，開口就罵：“你瞎了眼嗎？只會吃飯，我這裏用不着你，趕快給我滾！”一脚把我踢翻在地，踩着脊背，抓過一個樣板，劈頭蓋腦一頓毒打，打得我滿身都是青傷，打完還罵着叫我滾。我怎麼能回家呢！按照入店時立的保單規定，中途離開是要賠償飯費的，我家里哪有錢賠呢？再說，回了家也只有等着挨餓，在這裏好歹還可以填填肚子，沒奈何，我給師傅求了半天情，才算完事。

不久，這家店鋪買賣不好，不要人了。我轉到一家油漆店做徒弟。一次晾漆件時，不小心撞倒了另外一件漆件，搞脏了一點漆面。掌櫃過來，抓起漆刷子往我頭上一砸。不多久我全身都腫了，頭腫得像一個大斗，眼皮腫得蓋住眼珠，什麼也看不見了，手脚起滿了水泡，流着黃水。原來這種油漆毒性很

大，砸在头上，被漆“咬了”（中了漆毒），就会出现这些现象。掌柜不但不给医治，还嫌病了不能做事是个累赘，不要我了。我只有带着病回到家中。

我在家里过了半年，拣煤核打柴禾，没法维持生活，十五岁又到前门“兴盛永”学铜匠。每天从早上六点干到深夜十一、二点。晚上在连窗户都没有一扇的“车间”里，在潮湿的地上铺张破草垫，胡乱睡去。日子久了，就得上关节炎。

按照规定，学徒本来是三年满期的，可是在我干了两年多的时候，掌柜为了多榨些血汗喂肥他自己，就千方百计延长剥削时间。有一次，掌柜故意刁难我，交给我一件拔铜丝的活儿，限我三天完工。这种活儿就是熟练的老师傅三天也根本干不完的。到了限期，掌柜见我没干完，骂道：“你这种手艺，喝凉水也没人给！休想三年出师！一天不出师，就得服我管一天。吃我的饭，得好好给我干活。”不由分说，拿起带棱角的铜条向我打来，我用手去挡，左手腕被砍开一条血口，至今干活手腕都不利落。

这样，他又强迫我给他干了一“节”（学徒期限是按节期计算的），才准我出师。

出师后，没有找到活儿。一九三九年到石景山“久保田制管厂”做工。我自己没鞋没袜，捡了一双底不连帮的破鞋，凑合着套在脚上。一次翻砂打底盘，红砂土流出来烫伤了脚。和学徒时的遭遇一样，谁管你的死活，不能干了就让你滚蛋。石景山没地呆了，只好拖着烫伤脚，一瘸一拐地回长辛店。

家里本来已经够苦了，加上我这个伤员，更加狠狠，常常

挨餓，我看這樣不行，養了一個多月，傷口還沒完全長好就掙扎着到天津去找工做了。

在天津总算找到了个活儿。到工厂后，我托人情向厂方预支了五个月的工钱，交给伴送我上天津的三弟带回家，让他和母亲买点粮食过日子。我带着病干活，吃的又差，体力自然不行，干了五个月，工厂就不要我了。

家里什么也没有。三弟去当学徒了，家里只有我和母亲。我们娘俩合计了一下，卖掉仅有的几件破衣服，凑了点路费，一起到张家口去谋生。哪知在那里也找不到活儿，娘俩终于走上了讨饭的道路。不久我病倒了，成天发烧口吐绿水，不省人事。母亲焦急万分：“宁当家乡鬼，不作异乡魂”，好歹不能让孩子死在外边。她卖了剩下来的唯一“财产”——一床破棉被，到收过庄稼的地里捡了几斤豆子卖了，又挨家挨户乞讨，才凑了点钱，带着我回到家乡。

三弟走过的路

这里来讲讲我的三弟。

三弟德惠，十三岁到北京一家做糕点盒子的店里当学徒，受的气挨的打不比我少。有一次，他端着一锅滚烫的菜汤，不小心撒了一点，三掌柜抓起一根铁搥条，狠狠地抽他的腿，当场就打得他不能动弹了。一边打还一边骂：“没用的东西，只会吃，给我滚！”

三弟受不了经常的毒打，不久，回到了长辛店，那时我正在铜匠铺当徒弟，没有收入，也帮不了他的忙。

这时日本法西斯强盗打到北京，鬼子兵到处抓兵、抢女人。为了躲避鬼子，母亲和三弟藏在一个有泉水的山洞里。三弟的双腿因为长时间泡在水里，都泡肿了，有些地方还溃烂了。躲在山洞里没有吃的，终非长久之计，三弟只好硬着头皮跑出来，到衙门口一家理发店学手艺。

在理发店学手艺时，每天从早上六点站到深夜，他那双被泉水泡烂了的腿坏得更厉害了，不住地淌黄水。不但不敢对师傅讲，更不敢要钱医治，痛得实在受不了，他就背着人在伤口上敷一层细泥土当药粉。破布、泥土和烂肉粘在一块，撕都撕不下来。

有一天，一位大夫去理发，看见三弟脸色苍白，不住发抖，就问他：“你怎么啦？是冷，还是病？”

“先生，我不是冷，是腿疼。”

那位好心肠的大夫叫他卷起裤腿来，一看：“哎呀！怎么伤得这样厉害？”大夫看了一会，说这是“连疮腿”，给他一些药敷了，才慢慢地好起来。

学徒期还没满，师傅死了，三弟又转到长辛店另外一家理发馆，从头当起学徒来。在这里日子更难受，师傅要打就打，要不给饭吃就得挨饿。每天从早到晚站在那里理发，吃的却是两顿混合面熬的稀粥，晚上又只能睡三四小时的觉。这样一来，他的身体一天天坏下去，结果得了一种“血汗病”，一天要流很多血。活儿干不了了，只好回家养病。家里又拿什么来“养”他这病呢！母亲眼看着他尽流血，常常晕过去，不但没钱替他治病，连充饥的食物也没有，心里像乱刀扎一样难受，

恨不得把自己的血倒进他身子里。偶尔弄到一小块豆餅，舍不得吃，全拿給他当“营养品”，自己宁可采点野菜度命。

这时湊巧四弟德水从外面回来了。

四弟的經歷

四弟德水三岁时被送給人家做儿子。別看他人小，心里倒挺有个数儿。人家要他叫爹，他說：“我爹死了。”要他叫娘，他說：“我娘在家里。”人家养了一陣，看出他是匹不馴服的野馬，不要了。回家住了几年，沒衣沒食，迫不得已，在他八岁时，又一次將他送給山里“西梨园”村一家財主。財主的老婆表面上一說一笑，心里却非常狠毒，人称为“笑面虎”。她把四弟当奴隶。八岁的孩子，天不亮就得起来去拾糞，早飯后，还要跟着大人下地种庄稼。常常因为拿不动鉄鍬，被打得暈倒在地。夜里，讓他睡在牲口棚里喂夜草。这活，本来是上了年岁的人干的，年青人貪睡，一倒下去，呼呼地睡到天亮，哪能行呢！

有一天夜里，四弟因为困极了，在驴棚里睡熟了，沒有听见驴刨槽的声音，就沒有起来加料。“笑面虎”却听见了，第二天一清早，她带着她的女儿，两人一齐下手，把德水按倒在地上，用打牲口的“懶驴愁”鞭子猛抽猛打，打得德水躺在地上不能动了。邻居們听见德水的惨叫声，跳墙过来，帮可怜的孩子求情，“笑面虎”才住了手。还悻悻地罵道：“懶东西，不打死留着有什么用！”

挨打挨罵姑且不去說它，最坑人的是不給飯吃。四弟在

财主家从来沒吃过一頓飽飯。有一次，德水餓得心里发慌，往地里送飯时扒了点花生吃，被“笑面虎”看見，眼一瞪、嘴巴一癟，一个阴笑掠过虎脸。四弟是个聪明孩子，知道这回又要挨揍，就跑到离我們家一里多地的土窑洞里藏起来。“笑面虎”东找西找，喊哑了嗓子也沒有找到他。从此，四弟就再沒有到“笑面虎”家里去。

九岁那年，四弟給一家地主放牲口。每天放牧三头毛驴、一只母猪和一群小猪。总是顧了毛驴顧不上猪群。牲口吃了主人家的庄稼，地主要打他，吃了別家的庄稼，別人也要打他。牲口也好像故意跟他过不去似的，好几次被毛驴撞倒在地上，跌得青一块紫一块。四弟沒有鞋穿，一天到晚光着脚丫子，漫山遍野地放牲口，被蒺藜扎得鮮血淋漓，甚至中毒肿烂。干了半年，他实在受不了这份活罪，想要几个工錢回家，地主不但不給，反而叫德水賠飯錢。他只好偷偷地跑掉了。

“旧社会里人吃人，走遍天涯难逃生。”德水离开地主家后，走上了乞討的道路。討遍了长辛店、白菜湾、楊村、西盆子坑等十几个村子。穷人想給給不起，富人不但不給，还常常放出恶狗来咬，嘴里不干不淨地罵着：“小懶杂种，不去找活儿干，只会要东西，滾！”

后来，德水跑到北京城里，一边討飯一边跟別人学“数来宝”。这样混了两年，他又回到家里来了。

一进门，他看到母亲餓得不像人了，三哥德惠又得了“血汗病”。他們已經好几天沒有吃飯了。母亲見他回来，痛哭流涕：“儿呀，我們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

德水当天夜里就奔到石景山，好容易找到了个临时工，他一口气干了五天五夜，挣到了五斤棒子面和三块钱。德水拖着又饿又乏的身子，带着面和钱，晃晃悠悠地往家里赶。走到蘆沟桥北边的回龙庙，身子一歪，滚到路沟里，竟迷迷糊糊睡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被骆驼的铃声惊醒，才爬起来继续赶路。他这一次给家里帮了个大忙。德惠的病渐渐好起来了。

异途同归

一九四二年，我们兄弟三个先后来到石景山钢铁厂做工，当的是“票工”。开始时，没有地方住，我们便在高炉旁、烟道、防空壕里过夜。后来三弟在衙门口找到一家理发店，白天人家营业，晚上我们去搭个铺住宿。有时上夜班，需要白天睡觉，怎么办呢？我们只好餐风露宿，睡在院子里。没有衣服穿，就把纸洋灰袋剪去四只角，打上个洞，套在身上，或者把草绳缠在身上，抵御寒冷。每天干十二小时以上的活，只能挣七、八角钱和一斤三两棒子面或者豆饼面。

生活苦不去说它，还常常受到各式各样的压迫。

有一次，我得罪了一个日本特务，被抓到“取締系”（日本强盗的特务组织），一进门就用锤把毒打，打得我皮开肉绽，鬼子还不罢休，竟诬赖我偷了两桶机油，我不承认，他们就将我的两个大拇指套住吊起来，继续打我。

四弟德水在小高炉上装料，有一次放的焦炭块大了些，日本鬼子川里看见了，开口就骂：“八格牙路，死了死了的！”动手就抱住四弟的脑袋往火车皮上死劲地撞，把他的头撞得鲜血

涌流，很長時間都沒法上工。

日本鬼子管我們中國工人叫“苦力”，以為可以當牛馬一樣欺凌。可是他們打錯了算盤！我們工人階級不是軟骨頭，我們同鬼子展開了鬥爭。“磨洋工，拉屎三點鐘”就是我們工人當時同鬼子鬥爭的一種最常用的方式。

工人張廣善和守表門管入勤戳子的老嚴講好，領了許多蓋好入勤戳子的工票，另外一些人趁着替日本監工打掃屋子的方便，把出勤戳子悄悄拿出來，我們就把整本整本的工票蓋上這種戳子，然後不再上工，卻同樣去領糧食和工錢。儘管這樣做只能奪回我們被剝削去了的血汗錢的極小一部分，但畢竟也是一種鬥爭。

日本人為了用中國出產的鐵打中國人，搞過一次“高產”活動，並且要大家獻銅、獻鐵。說什麼：“煉鐵大大的多，金票大大的有，紅旗大大的掛！”

鬼子走了，和我一班的胡建山嘀咕開了：“去你媽的紅旗、金票，多給鬼子出鐵，那不是自己把刀刃擱在自己脖子上！”

我接口問他：“他們要高產，咱們就給他來個低產，怎麼樣？建山？”

“好啊！怎麼動手呢？”

“咱們給爐子送冷風，黑板上記三百五十度，實際只給它送二百度！”

“好，就這麼辦！等會鬼子來了咱們就往黑板上記，他會以為咱們剛看完呢。”

正說着，鬼子啪嗒啪嗒踏着大皮鞋來了。

“程的，風溫的看了？”

“統統看了。”

狡猾的敵人不信，伸手試測鐵管的溫度，罵道：“你們統統的看了？心的壞了，腦袋砍了砍了的！”說完就朝建山和我一頓好揍。臨走還說：“下次的再犯，統統的殺頭。”

我們兩人挨了揍，並不氣餒，就想辦法不讓他抓住把柄，和他繼續干。我們把裝溫度計的鐵管放在試眼孔（取爐內溶鐵以觀察火候的小孔）里燒熱，照舊往爐子里送冷風。鬼子好幾次來問：“風溫的看完沒有？”我們都理直氣壯地說：“統統看完了。”敵人伸手試測，鐵管的溫度很高，還稱贊：“頂好的干活！”我們心里暗暗好笑。

當時，工人勞動強度很大，一個人看幾個爐子，要是出鐵正常，就更忙得不可開交。大家一商量，不如干脆把爐子破壞了，哪部分工人都可以省點事，少受一點壓榨。熱風爐工人與裝料工人，卷揚工人串連好了，大家一齊動手。

卷揚工人從破壞風壓表開始，首先破壞了六號爐的風壓表。敵人追問，大家都說不知道，敵人也沒有辦法。以後，幾天一個 不到一個月，風壓表都給破壞了。

四弟是裝料工人，他們也想出了許多辦法破壞小高爐。小高爐本來是由日本人配好料看着上料的。可是，鬼子人少，照顧不過來，到了晚上，他們回小樓去睡覺後，工人們就像俗話說的，“半夜上茶館，有啥吃啥，”把爐子附近的爐渣、磚頭……一古腦兒往高爐里塞。起初還能生產幾百斤鐵的小高爐，這樣搞了幾次就完全不能生產了。敵人看不出破綻，料又

是他們自己配好，看着上的，追究起來，也是他們自己的責任，因此連屁都不敢放一個。就這樣，十個小高爐破壞了九個。工人們心里的樂勁兒就甭提了。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主義者投降，國民黨反動派卷土重來，他們繼承法西斯的衣鉢，繼續奴役我們工人。繁重的勞動有增無減，飢餓更加嚴重，社會秩序紊亂，物價飛漲，到處抓兵，弄得民不聊生，烏煙瘴氣。

三弟就在這時被抓去當了兵，四弟和我因為維持不了生活，不得不在下工後，再到門頭溝中英煤礦去背煤。四弟當時正在拉血，病得厲害，也只好硬著頭皮下煤窰。

工人的工資本來就低，廠方到了該發工資的時候還扣著不發，把工人的血汗錢拿去做投機倒把的生意。等錢發到工人手里，物價早翻了幾番。沒有固定工作的“票工”，境況就更加慘了。

為了活命，工人們展開了要求按時發工資和隨着物價的上漲增加工資的鬥爭。有一次，我們五百多工人聚集在辦公廳前面等待廠方的答復。勞政科長張華峰看到情形不妙，溜出來想乘小汽車逃跑，我們一齊涌上去，團團圍住汽車。張華峰拚命催司機按喇叭想繼續開車。大伙更火了，一聲“砸呀”，磚頭石塊一齊向汽車飛去，只聽見“嘩啦啦”一陣響，砸碎了車窗玻璃和車頭燈，車身也給砸得大坑小洼，噴漆一片片脫落下來。張華峰見我們不放他走，才老實一點，從汽車里鑽出來，答應下星期一發工資，增加工人時先盡着“票工”補，至於增加



工資的事，“兄弟一定向上級請示，一定替大家效勞”。我們警告他，要是不照我們的話辦，下回決沒有這麼便宜，才放他走了。

在这次斗争中，四弟和曹洪森他們還寫了許多標語，到處張貼。

这次斗争不但贏得了預期的勝利，更重要的是使我們懂得了團結就是力量的真理。

新的起點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石景山上紅旗飄揚。工人們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飢寒交迫的牛馬生活從此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做了國家的主人！

三弟回來了。我家兄弟三個又同去一個工廠里工作了。三兄弟先後加入了共產黨，還都學了文化，成了家，有了孩子。我們的孩子不再像我們小時那樣缺衣少食，我們的老母親失明的雙眼也治好了。我們三個家庭十五口人，團聚一起，日子過得挺順當。過去，我們為資本家賣命，圖的是活命，現在，工廠是我們自己的，國家是我們自己的，干活不光是為了養家活口，而是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這叫我們的心又怎能平靜，我們又怎能不感到渾身是勁呢！

這就是我們兄弟三個在黨的領導下做出了一點小成績的全部秘密！

凌國清 楊福華 張尙來 張忠整理

劉永凱插圖